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刘少东 及其战友 与延安时期青年运动



陕西人民出版社

88341

A34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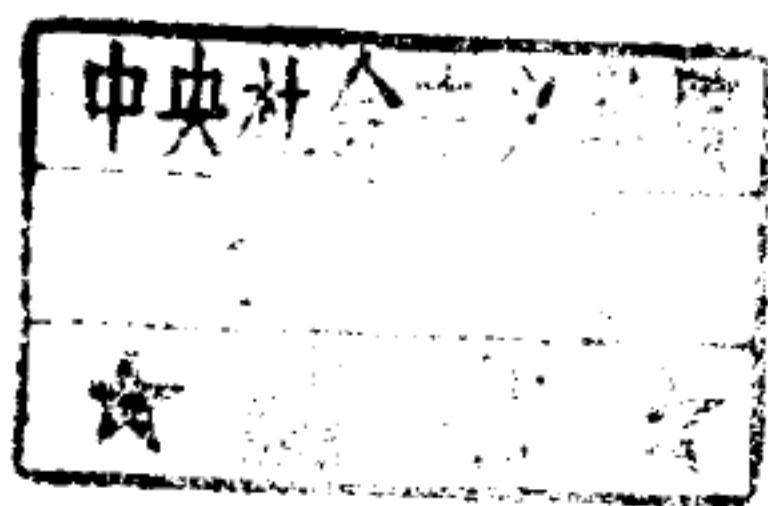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DE 68/100

毛泽东及其战友 与延安时期青年运动

主 编 郑 洸

副主编 罗成全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 新登字004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毛泽东及其战友
与延安时期青年运动

主 编 郑 洸

副主编 罗成全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0插页 169 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5087—4/G·4377

定 价：11.00元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 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小八路亲切谈话



1946年，
毛泽东同延安
军民一起欢度
春节。这是毛
泽东和群众秧
歌队合影。



1939年，
毛泽东在抗大
成立三周年纪
念大会上讲话。



毛泽东在抗大二期开学典礼讲话。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中写《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

如力不弱，即失其力，不
如好不放，即失其力
只有变化无穷也

如东
先生同志

1938年，毛泽东为艾生题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毛泽东

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为抗大四期开学题

努力打敗
日本侵略
者
毛澤東

1938年11月，毛泽东为西北青年救国
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题

司刻制中國青年
的惟一任務就
是打勝日本軍
國主義者
毛澤東

1940年，毛澤東為“五四”青年節題

肯吃苦耐勞，又是革命同志，是革命同志，是革命同志，是革命同志。

1941年春节，为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王仲方等几位青年题

总序

DF69/04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点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的错误领导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不能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驾驭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

走向胜利。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的干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人民群众的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内不良的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汲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工作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年7月1日

前 言

毛泽东同志从 1935 年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到 1948 年指挥延安保卫战后进入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西柏坡，在延安地区共住了 13 年。这也就是人们通称的“延安时期”。在这 13 年中，中国革命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的前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艰苦、最光荣、最伟大，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上令人向往、极有意义、又十分光辉的一章。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及其战友十分关怀和重视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和青年的成长。他们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发展，及时地代表中共中央对青年工作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决策，指引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运动，走上健康发展和向胜利前进的道路。

为了建立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和克服青年运动中关门主义的倾向，1936 年 11 月 1 日，毛泽东及其战友代表中共中央作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去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决定，实行了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及时改造。随之，便有了青年救国会、青年救国团等各种青年抗日救国团体的产生，从而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爱国青年，投入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领导的青年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但自共青团改造，党中央便没有一个统一领导青年工作的独立机构。为了进一步发展全国的青年运动与集中统一党领导各青年团体，1938年5月，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青年工作委员会（即中共中央青委），使全国青年运动又开始有了统一的领导。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战，但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抗日救国运动则处处限制迫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更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他们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从各方面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更以刚建立不久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来控制全国的青年运动，疯狂发动反共高潮，从而使我们党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青年的抗日救国运动，倍受摧残，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6月，中共中央又及时作出决定，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工作实行转变，并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了《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规定了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的根本方针和具体原则，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作了详细周到的安排和部署，使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领导的学生工作，实现了迅速而顺利的转变，既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扩大了我们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又为后来学生运动的高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青年救国会，做为抗日战争时期青年运动主要的组织形式，它在抗日根据地青年中，进行了许多工作：向青年进行抗战的宣传与鼓动；动员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武装，组织青年开展拥军支前活动；协助党和政府开展国民教育和群众文化活动；发动广大青年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工作，取得了优良的成绩。但以后有些地方的青救会组织，“因为不善于使

青年运动和整个党所领导的人民运动相结合，过分地强调了青年的特殊性，因而产生一种单独去搞青年自己一套的闹独立性的偏向”（任弼时语），为了纠正这个偏向，1941年6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不但帮助青年工作者总结了经验教训，而且还为正确开展青年工作，指出了方向，使以后的青年运动更好地同人民运动相结合。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和策动下，背信弃义地公开撕毁同我们党签订的一切协议，并于1946年6月挑起了全面内战。当时我们党中央考虑到，在即将展开的规模巨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在解放区土地改革和生产建设中，特别是战后的各项建设事业中，需要中国青年更有组织地有领导地发挥作用，而原有的青年救国会等青年组织和活动，已经不能满足经过长期锻炼、提高了思想觉悟的先进青年和客观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在人民解放战争刚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便于1946年8月26日和9月13日两次讨论建立青年团的问题。最后，在1946年11月5日正式发出了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要求建立新的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这个组织应比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更群众化、青年化，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上解放区党政军民工作的忠实助手，组织上实行民主集中制，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吸收一切坚决拥护民主，并愿为民主事业积极奋斗的15到23岁的男女青年参加。中共中央希望各中央局、各分局择地试验建立青年团。从而使青年运动又进入了一个建立自己核心组织的新阶段，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增添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有生力量。

我们略举毛泽东及其战友在延安时期代表中共中央，对青年

工作所作出的这几个重要决策，足以说明，没有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关怀和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运动的胜利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对在延安的青年无比关怀和爱护，寄予殷切的期望。他们积极参加青年们的一些重要会议和组织的活动，亲自向青年们作报告、讲演，撰写文章和题词，热情地与青年交往。就以毛泽东同志来说，他出席过1937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向代表论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抗日的新政策、新口号，号召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同全国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当年5月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他又亲切接见了北方青年的代表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等，并发表了北方青年应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作斗争的谈话。他多次给抗大、陕北公学讲课、题词，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他撰写了纪念文章《五四运动》，又出席延安各界青年举行的纪念大会，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演。他还参加了延安模范青年的授奖大会并讲了话，要求模范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一生代表中国老百姓。他支持安吴青训班扩大培训规模，并为安吴青训班创办二周年纪念题词。指出，“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自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在1939年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又热情洋溢地发表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重要讲演，总结了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指出知识青年要与共

产党结合、要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与革命武装队伍结合的正确道路。1940年2月19日，还参加了延安青年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并在讲话中，要求“青年不但做事而且应该打头”，做“宪政运动的先锋”。1947年5月当国民党统治区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时，毛泽东立即为新华社撰写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高度评价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称它是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毛泽东同志对青年一代的爱心和真挚的革命情谊，真是一言难尽呵！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及其战友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风范，令在延安的抗日青年钦佩、敬仰和感动，也使大家深受熏陶和感染。他们的谆谆教诲，不但给当年的延安青年们以智慧、信心和力量，激励和鼓舞着大家努力学习，加强锻炼，认真改造自己，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而且也给中国青年运动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毛泽东及其战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均已作古。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编写了这本小册子，以表示我们对他们崇敬和缅怀之情，同时，也愿以此书，献给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成长的新一代青年。

我们相信，这些当年的往事，不会成为烟云，它将永传人间，并给人们以激励、启迪、信心和力量。

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郑 洸

目 录

前 言	(1)
领导青年运动转向抗日民族解放斗争	
——中共中央决定改造中国共青团	(1)
宣传解释共产党的新政策新口号	
——毛泽东等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 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10)
对北方青年的希望	
——毛泽东对白区青年代表的谈话	(17)
广泛的组织青年	
——刘少奇谈白区青年工作	(26)
引导爱国青年走向革命	
——创办安吴青训班和泽东青干校	(34)
从组织上加强对全国青年工作的领导	
——延安时期青年工作的领导机构	(48)
促进全国青年运动的团结和统一	
——毛泽东等关于三青团的电文	(60)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朱德赠给青年的“礼物”和“宝贝”	(72)

隆重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

- 毛泽东等论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发表 (81)

对一二九运动的回顾和总结

- 毛泽东等谈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基本经验 (98)

转变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工作

-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 (111)

青年运动根本经验的科学总结

- 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 (118)

在重建青年团的日子里

- 毛泽东等亲自领导建团工作 (128)

推动学生运动新高涨

- 中共中央对第二条战线斗争的领导 (145)

青年运动胜利发展的指针

-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对青年与青年运动的论述及其后来的丰富与发展 (159)

附 录：

一、毛泽东及其战友与延安时期青年运动纪事

- (1935. 10—1948. 3) (179)

二、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关于青年运动的重要文献

(一) 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

- (1936年11月1日) (211)

(二) 中央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 (1938年5月5日) (214)

（三）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	
（1940 年 6 月 3 日）	（215）
（四）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	
（1941 年 6 月 4 日）	（217）
（五）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	
（1946 年 11 月 5 日）	（219）
后 记	（223）

领导青年运动转向抗日民族解放斗争

——中共中央决定改造中国共青团

(一)

1935年1月，从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后，中国革命开始转危为安。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于10月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在这里安下了革命大本营，陕北和延安即成为全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中国共青团和青年运动也开始在党中央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的关怀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九一八”事变使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中国青年和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在国民党对日节节退让，对内残酷镇压的情况下逐步高涨。受到中共《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感召和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鼓舞的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共领导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伟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这个运动很快超出了学生运动的范围，全国各地各界迅速行动起来，支持学生运动，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中国新的一次革命运动高潮又开始了。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者、领导者的重担。接着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学生运动要持久的发展和冲破反动势力的破坏、屠杀,必须和工农兵斗争配合起来,团中央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中,也发出号召,要求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把抗日救亡运动扩大起来,实现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此后,更多的青年学生冲破国民党的控制和镇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重新团结和组织起来。在一二九运动中平津爱国学生首先在中共领导下建立了青年抗日救国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并迅速发展到了全国近 20 个地方和海外留学生中。与此同时,在全国 20 多个大中城市学生救国会的努力下,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中国学联”),1936 年 5 月在上海宣告成立,重新开始了全国学生有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

国际上的法西斯反动势力在 30 年代初期出现以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逐步走上了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各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积极领导本国人民和青年广泛开展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不少国家共青团已与第二国际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反法西斯的组织联盟。1935 年 7 月共产国际“七大”制定了广泛发动群众,制止侵略战争,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切实地转变组织,采取有效办法肃清关门主义。同年 9 月青年共产国际召开“六大”,中国共青团代表宋一平等出席了大会。大会决定建立世界青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把模仿共产党组织结构和工作方法的第二党式的共青团根本改造成成为新式的非党的各个党派青年都能加入的青年团,要求中国共青团“建立全体青年的群众运动的组织”。

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都要求中国共青团和青年运动团结千百

万抗日青年，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青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来，实现从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向民族解放青年运动的伟大转变。但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在林立的青年社团中选择和建立的，党在幼年尚且薄弱的时期需要团组织以更大的帮助和支持，从党的法规上给团规定了青年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第二党式的性质。共青团也确实不负党的重托，与党同舟共济，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在没有党组织的地方起了党的作用。遵义会议党走向成熟以后，已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而共青团再作为第二党式的无产阶级青年组织就不利于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了。从当时共青团的现状来看，共青团在国民党统治区屡遭国民党压迫和破坏，共青团员与共产党员同样遭到捕捉杀害，许多地方已没有团的组织，少数地方秘密保存下来的团组织也无法公开活动。在当时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西北苏区，虽然党中央在瓦窑堡恢复了团中央，团组织在西北苏区有了较大发展，但工作范围仍局限于青年积极分子，工作青年化、群众化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共青团的组织状况已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和青年抗日救亡的要求，很难担负起团结各阶层爱国青年参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

（二）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领导中国革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中，时刻关心着共青团的建设和发展，极为重视中国青年的成长和积极作用的发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不断探索新形势下中国青年运动核心组织的性质和形式。首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和青年共产国际“六大”的精神，以共青团中央的名义，于1935年12月20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

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公开宣告共青团愿与一切抗日救国组织合作，欢迎一切赞成抗日救国的青年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接着，193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团的工作。当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指出，共青团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关门主义和第二党工作方式，共青团应该去掉一切框框，在抗日口号下吸收青年入团，应该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在青年中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会后，团中央根据党的要求，立即发出《目前形势与团的任务》的指示，要求全团根据目前形势的变化改变团的组织政策，大批地发展团的组织。

1936年春夏之间，中共中央陆续收到共产国际“七大”有关文件，便开始了改造共青团的试验。7月30日，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在中共中央讨论白区工作的会议上汇报团的工作时，谈到团的组织还很狭隘，还是第二党的性质，希望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特别注意帮助团的工作和扩大团的组织。张闻天当即明确指示共青团应该用民族解放先锋队或民族解放青年团等名义公开活动。紧接着，中共中央书记处在8月5日《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就初步提出共青团的改造问题，要求党组织要帮助团成立单独的组织，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实现CY是青年群众的组织的任务；要指导团参加到各界各党派的各种青年组织中去发展团的组织，但不用团的名字而用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名字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存在。张闻天又于8月9日致信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明确指出根据国际的意见及我们的经验，必须变秘密的狭隘的第二党式的共青团为各种各样的公开的青年群众组织，以便在抗日口号下团结最广大的青年群众。

于是北方局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于9月20日作出《关于青年团的决定》，指示所辖各地党团组织，为进行更广大的青年群众运

动，取消秘密的无产阶级青年先锋队的共青团，介绍全部团员入党，在各城市各工厂学校和农村用公开半公开的方式建立各种新的青年群众团体，组织青年党员个别地加入社会上原有的青年团体并努力取得领导地位，建立省委市委的青年部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于是北平、河北等地共青团组织相继停止了活动，而民先队则在国统区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中更广泛地发展了起来。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8月25日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9月1日又将“抗日反蒋”的策略改为“逼蒋抗日”。9月下旬，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先后三次收到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处发来的电报，电报重申了青年共产国际“六大”对中国共青团的指示，要求中国共青团组织形式必须适合中国各个区域的特殊条件，转变为广大青年的民族解放的群众的各种各样的青年团体，要把建立为发扬文化和民主的青年运动，团结中国青年参加全国救国斗争和人民阵线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中共中央收到电报之后，即正式筹划共青团的全面改造。10月12日中共中央讨论政治工作时，陆定一提议改变团在红军中的组织和工作，将红军中的团组织改为朱（德）毛（泽东）团或红军青年团。毛泽东立即表示赞成支持陆定一的意见，认为团在红军中的组织应当有根本的改变，但不必叫朱毛团，也暂不作具体结论，继续广泛征求意见，取得统一认识后再最后决定。10月18日，张闻天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果断提出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应该决然取消那些最少数的先进分子的秘密的群众组织，如共青团、赤色工会、左联等团体，应把他们的分子放到更广大的公开与半公开的群众团体中去，或根据各地具体环境，使他们创造能够公开的抗日救国团体；强调叠床架屋的狭

小的秘密组织，只能使党脱离群众和给敌人以无数破坏的机会。

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专门讨论共青团的改造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凯丰、林伯渠等领导人，团中央冯文彬、胡耀邦、刘英、赖大超和陆定一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听取了冯文彬关于共青团工作的汇报和共青团改造、今后青年工作方针的意见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把团改造为非党的广大青年群众的统一战线组织，但对要不要改变名称意见就不一致了。有的主张不改名字，应扩大组织；有的主张保留团组织，另建一青年群众组织；有的主张上层保留团的名称，下层用各种各样的名称；有的主张不取消苏区团组织，而只取消白区团组织。张闻天最后在总结讲话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党对共青团的不同要求，青年组织必须适应形势任务和阶级力量变化而改变组织形式的规律，强调指出在党已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和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用大的力量实行共青团由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到非党的群众的统一战线组织的转变；取消白区团组织，根据各地情形与条件建立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在党内设青年部，在青年群众组织中建立党团，吸收大部分团员入党；改变苏区团的名称与性质，总的名称叫青年救国会，下层组织叫俱乐部，自下而上建立新的组织后再逐级取消团组织。会后，中共中央根据张闻天总结讲话内容，作出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正式决定改造共青团。

（三）

改造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从中国国情和青年运动的实际出发，灵活借鉴国际共产主

义青年运动经验，解决中国青年运动组织形式的正确决策。“决定”发布后，在党内、团内一些暂时还未理解共青团改造目的意义的同志中产生了不同认识，有的怀疑“决定”的正确性，提出了“为什么要把这样有历史意义的团改造了”？改造团就是取消团，而取消团是不对的；有的认为团犯错误了，党不要团了。国民党方面也趁机煽动说，中共建立共青团就不对，现在“只好宣告死亡”。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帮助共青团在党内、团内进行了一系列宣传动员工作，组织各级党、团领导机关开展学习讨论，统一认识、增强信心，消除疑虑，指导团中央派出工作组进行改造的试点工作。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发表了专文介绍改造团的目的、意义、要求和方法，《红色中华》报也及时介绍改造团的动态、经验。12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领导人还专门出席了中央直属机关团组织改造后建立的青年俱乐部的开幕典礼，讲话勉励青年要认识青年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要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推广新文字，消灭文盲，积极主动锻炼身体，努力参加军事训练，抗战时拿起枪来就能干；要把俱乐部真正建设成为青年抗日救国的基层组织，西北苏区的青年在各方面要做全国青年的模范。

共青团中央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精神，立即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颁布了《西北青救会组织法草案》，把中央团校改名为鲁迅青年学校，为团改造后的青年组织训练新的青年干部，并通过各种方式把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国统区和游击区。西北苏区的各级团组织自下而上地建立了乡青年俱乐部和区、县、特区、省的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红军各部队的团组织相继改为青年队。到1937年4月上旬，共青团在西北苏区（除神府特区正进行游击战争、5月后开始改造外）胜利地实现了改造，组

织人数由改造开始时的2万团员扩大到16万青救会员，少年先锋队、学生救国会、学生自治会、儿童团（均归青救会领导）等组织也有了较大发展。于是共青团在苏区团结教育青少年，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历史使命便由青救会继承起来。

在国统区，除北方局所辖地区的团组织先行改造外，所剩无几的团组织多在1937年下半年后停止了活动。但在一二九运动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除民先队、学联之外，各地地下组织根据中央改造团的决定精神迅速创建了许多公开和半公开的青年救亡团体。南方游击区的团组织因与中央失掉联系，仍继续秘密坚持活动和发展基层组织，直到1937年底才按照中央的决定开始进行改造。

（四）

改造共青团，使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青年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各地根据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决定的要求，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除平津地区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外，还有武汉青年抗日救国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在革命根据地和边区，主要建立了青年救国会（即青救会）。这些组织积极带领广大爱国青年参加各种抗日工作，支援抗日武装斗争，努力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抗日救国与文化体育的活动，不断地推动青年运动按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正确迅速地前进，从而使党领导的青年运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又深入的发展，以崭新的面貌，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列。

共青团的改造，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一次成功改革，是中国青年运动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次重大转机与再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

实现了先进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向非党的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青年的统一战线组织的转变，实现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向民族解放的抗日青年运动的转变，实现了“非法”的组织、秘密的活动向公开合法的转变，促进了青年工作方式方法和作风的转变，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更广泛的青年组织和青年运动，使得抗日战争初期的青年运动出现了崭新局面，更广大的抗日爱国青年被团结和组织起来，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充分说明我们党的决定是正确的，它不是否定团和青年组织的作用，更不是不要青年组织，而是根据新的形势，建立更多更广泛的适合各地具体环境的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更好发挥青年和青年组织的作用。同时它也充分说明既要以进步力量为核心，又不能局限于狭小的圈子，必须广泛团结各界青年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要巩固和发展青年运动的核心组织，又要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而变更其组织形式，以适合青年的特点和需要，更大聚集青年的战斗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担负起团结教育青年一代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历史使命。

（赵有奇）

宣传解释共产党的新政策新口号

——毛泽东等在西北青年 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同志们，今天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开会，将号召西北及全国青年群众与各界联合，走上团结抗敌的道路，我就来说一点关于共产党的团结抗敌的政策。共产党过去的政策是国内战争与土地革命，现在的政策是和平团结，对日抗战。这是什么原故呢？为什么我们过去和现在有这样不同的政策呢？……”毛泽东以其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语调，豁达大度的胸怀，抗战必胜的信念开始了他的演讲，被点燃政治激情的青年代表们在台下不时报以阵阵掌声。这就是1937年4月12日在延安举行的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镜头。

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把共青团改造成为非党的青年群众的抗日救亡组织，11月上旬共青团中央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公布了《西北青救会组织法（草案）》，西北苏区省级以下的共青团组织自下而上地陆续建立了各级青救会。与此同时，西安学生为逼蒋抗日，于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举行万人游行和请愿斗争，随即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并

在中共代表团调解下，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当时西安和全国绝大多数青年学生主张杀蒋，对中共的国共合作、联蒋抗日的新政策在感情上暂时还难以接受。西安青年学生在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耐心说服和解释下，很快消除了疑虑和灰心的情绪，率先通过各种形式深入民间和全国各大城市，宣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和国共合作、联蒋抗日的政治主张。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为了总结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经验教训，帮助全国青年统一思想认识和担负起民族解放的任务，于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直接领导召开了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

延安，自从中共中央1937年1月13日进驻以后，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就成为指引中国人民抗日的灯塔和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作为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之后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大会，倍受党中央及其领导人的关怀、重视和陕北青少年的支持。会前，中央各党、政、军机关纷纷慷慨捐助会议经费和代表们的生活用品，陕西省青救会发动少先队员打猎帮助代表改善伙食，延安青少年开展了卫生运动周。焕然一新的延安城里，大街小巷布满了拥护代表大会的标语口号，东门内临时用作中央大礼堂的天主教堂被布置得庄严辉煌、灿烂缤纷，会场门外红布白字的会标从高耸在礼堂顶上的钟楼垂直而下，会场四周挂满了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领导人和中央各机关、全国学联等单位赠言、题词的条幅，以及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大幅图表。

4月12日中午，来自苏区、国统区、沦陷区20多个省区和红军的312名青年代表，同赶来旁听大会的六七十名陕北青年干部，

以及中外记者，挤满了整个会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徐特立等领导人，满怀殷切期望地坐在主席台上。1点正，大会开幕的钟声震撼云霄，红军小号手吹奏的欢迎曲响彻会场，团中央书记、西北青救会筹委会主任冯文彬宣布大会开始并致开幕词。他说，“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为团结全国青年起来抗日，我们发起组织青救会，得到了有血气的铁的救国意志与热情的爱国青年的热烈拥护，会员迅速发展到20万人，今天在这里举行代表大会，总结青年运动的经验，研究青年运动的方针，对于唤起全国青年抗日、推动青年救亡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在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给我们讲话。”

一阵热烈的掌声首先把毛泽东迎到讲台，充满敬仰之情和渴求真理的数百双眼睛一下子凝聚到这个具有非凡魅力的伟人身上，洗耳聆听着他的教诲。毛泽东针对青年们对国共合作、联蒋抗日新政策尚不理解和认识，着重向代表们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国内战争、土地革命转入国共合作、和平民主、团结抗日的新政策的根本原因及重大意义。他说，过去若干年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屠杀革命人民，我们唯一的办法和出路就是进行两个阶级、两个政权的武装斗争，而到了华北事变以后，在国家处于危亡面前，国内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内部都发生了分化，于是我们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党先后通过《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致国民党书》、1936年9月会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等等，都表示了我们号召全国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坚强意志，这方面才开始走上了第一步，以后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接着，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没有民主自由与和平统一，抗日只是一句空话，现在全国除了苏区以外，仍没有民主，爱国有罪，反日示威被捉，报

刊讲爱国话被封，所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是实现抗日的必要条件，是今天的中心任务。现在国民党开始转变到抗日方面来，我们就主张国共合作和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精神，红军改名，苏维埃改制，从戴红帽子变为戴三民主义帽子，都是为了团结抗日。最后毛泽东充满信任和期望地号召青年代表，向全国青年宣传解释共产党的新政策新口号，推动全国青年都团结起来，跟成年、幼年、老年一道结成几万万人的大团结，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紧接着是张闻天以简洁凝练的语言作了讲演，他希望苏区的青救会和青年运动成为全国的模范团体和模范救国运动，这次代表大会能够提出一个全国青年运动的共同纲领和目标，并且要求即将成立的西北青救会积极吸收各党派各阶层爱国青年加入各种抗日青年组织，发扬中国青年运动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加强青年文化教育工作，实现工作的青年化和民主化。周恩来在讲演中热切地期望代表们，想一想东北青年所过的奴隶生活及其进行的英勇反抗，想一想全国各地特别是华北青年的救亡运动，想一想上海青年工人的反日斗争，想一想绥远抗战中的青年军人，想一想西安事变中西安青年拥护和平的奋斗，然后定出全国青年的共同纲领。朱德语重心长地号召中国青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组织起来，在争取民主、自由和青年切身利益的斗争中组织起来，在巩固和平统一中组织起来。他希望各青年抗日团体在充实、普及、统一的基础上，加强与红军的密切联系，加强与日本劳动青年的合作。博古、林伯渠、徐特立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西北青年成为团结全国青年的核心。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号召、希望和鼓励，如春雷震撼着青年代表们的心灵，如灯塔照耀着大会的航向。会场的气氛更加热

烈和高涨起来，代表们更加团结一致的继续进行着大会的议程。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贺龙、蒋介石、宋庆龄、张学良、杨虎城、傅作义、邹韬奋、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等国共两党领导人和各界爱国领袖 27 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团；一致通过了《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致全国各青年团体电》、《致南京国民政府电》、《致世界青年电》，表示誓以热血和头颅忠实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切盼国共两党迅速完成一切合作工作，并颁布对日抗战、对内和平民主统一、改善民生的共同纲领；呼吁全国青年一致团结抗日救国，实现全国青年团体联合；要求南京政府给予青年抗日的一切民主自由，释放爱国六君子。

大会根据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在听取了冯文彬《目前形势与今后西北青年救国方针》的报告和两天半的热烈讨论之后，制定和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任务的决议》、《关于进行普及教育运动突击年决议》，提出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简章草案》。大会规定青救会“是各党派各界青年联合的群众团体”，它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而奋斗”，教育是各个青年团体的基本任务；要求各地青年团体在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基础上立即进行联合与合作，以民主的群众的合法的方式创立各种各样的青年救亡团体，取得公开与半公开的活动，告诫“千万不要幻想用一种组织形式去组织所有的青年”，强调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和克服一切不正确思想是完成各项任务的基本条件。大会号召全国青年：立即要求实现抗日的民主自由；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性别的在抗日救国目标下大联合；放弃派别成见和相互攻击，在民主原则下选举产生全国及各地的统一的青年组织；由多处青年互推代表，召

开全国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争取青年生活上经济上政治上的一切改善。

大会决定建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为西北青年运动的领导机关和全国青年救国会成立前现有各地青年团体的最高机关，民主选举 55 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在 18 日召开的第一届执行委员会议上，一致推选冯文彬、白治民、高朗山、李瑞山、黄庆熙、刘秀梅为常务委员，胡耀邦、刘西元为候补常务委员，冯文彬当选为主任。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不仅出席大会开幕式发表讲演，而且挤时间分别接见了部分代表团。4 月 18 日傍晚，毛泽东专门邀请陕西国统区青年代表团的 25 名代表，到凤凰山下他的住处进行座谈，对西安事变期间西安学生的爱国精神和正确方向给予了高度评价，再次阐述了中共抗战方针与国共合作问题，勉励陕西青年继续为推动国内和平、统一、团结而努力，还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单独宴请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恩来和罗荣桓、谭政、莫文骅、肖文玖等红军首长及冯文彬，在军委政治部大院里接见了红军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一块照了像。周恩来在讲话中谆谆教导红军青年要爱护身体，不要过早地恋爱结婚，要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要给全国青年起模范作用。17 日下午大会结束时，毛泽东、朱德又应邀参加了代表们的会餐和联欢晚会。

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关怀指导下，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各项任务，它促成了中国学生运动和工农青年运动两大巨流在全国范围的汇合，初步形成了中国青年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时期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大会之后，青救会便成为“青年组织的总形式”，共青团中央机关停止了工作，中共中央设立了青年部（1938年5月，则成立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青委），以指导全国的青年运动。

（赵有奇）



对北方青年的希望

——毛泽东对白区青年的谈话

1937年5月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北方青年的代表黄敬（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杨学诚（清华大学中共支部书记）、林一山（北平师范大学中共支部书记）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他们住在延安城内基督教堂附近的招待所里。有一天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起看望白区代表团，大家都坐在地铺上亲切地交谈，毛泽东还特别介绍了刘少奇是中央管白区工作的。由此，大家也就知道了，原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秘密油印的刊物《火线》上，发表了许多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指导作用的文章的“K·V”，就是刘少奇。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等，听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以后，由杨学诚和李昌作了大会发言。他们反映了革命学生的思想情绪，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意见和顾虑。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会议结论中，作了详细的解答。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并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首先充分肯定了北方青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突出作用。他指出，“北方青年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团结，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到底。”对于一些北方青年，由于时局的变动而产生的苦闷和困惑，毛泽东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时局的烦闷，这应在集体的运动中求得解决。这个运动就是为求民主与实现抗日的斗争。”为了提高北方青年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认识，毛泽东着重阐述了求民主与实现抗日的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他指出，“北方青年应该对争取民主自由增加兴趣，争取爱国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中心之一。如若只谈抗日，而不了解作实际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则抗日是不会有效果的。”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要检查和克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问题。他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他最后殷切地希望北方青年，“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

毛泽东这次重要谈话的摘录，后来被题为《对北方青年的希望》，而流传于世。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谈话中之所以特别强调北方青年要同改良主义者作斗争，要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事情的缘由的。

(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后，由于蒋介石

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抵抗，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断地发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残酷地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激起了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怒潮。广大青年，特别是北方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侵略者在蒋介石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怂恿下，1935年又加紧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企图不损一兵一卒得到华北五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压力，相继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正式同意成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这样，继东北三省沦陷后，华北又成了日本的天下，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了。北方青年学生们再也不能安下心来读书，他们深深地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的行径，深为厌恶和不满。

正当这时，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北方青年看到了希望和方向。不久（十月），又传来了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站在华北前线的北平青年学生，在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首先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运动。

北平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各地各界的热烈响应和声援，他们支持学生抗日救国的正义斗争，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改变卖国政策，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由北方青年学生点燃的抗日救国的烈火，很快成为燎原之势，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北方青年学生及其所发动的“一二九”运动。他认为“一二九”运动有伟大的功劳，它“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对北方青年学生的历史作用，正如毛泽东在这次同北方青年的谈话中所称赞的：“北方青年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

(二)

国民党政府对北方爱国学生掀起的抗日救国运动，又恼又恨，力图镇压和破坏。他们一面下令提前放假，强迫学生离校回家，玩弄釜底抽薪的诡计；一面下令学生派出代表去南京“聆训”，以图分化瓦解。这时，我们党领导的北平学联，立即决定利用寒假期间，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到农村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并决议不派代表到南京“聆训”。1936年1月初，由平津学生组成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沿着平汉铁路向广大的冀中平原进发了。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十分惧怕，下令沿途各县随时予以镇压、限制，并派出军警特务，到处堵截、阻拦，用武装押解，迫使宣传团在1月中旬，先后回到北平与天津。为继续坚持斗争，他们先后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1936年1月21日，两个组织正式合并，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后来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接着于2月1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从此，民先队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团结广大爱国青年，战斗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成为华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

下乡宣传的学生回来以后，国民党政府立即加紧了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他们先后发出“整饬学生的训令”和“维持

治安紧急办法”，于是爱国师生受到迫害，被逮捕、开除和解聘。与此相配合，一些国民党教授出来鼓吹“读书救国”，以引诱爱国学生离开抗日救国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学生产生恐惧心理，动摇彷徨起来，有的转而不闻政治，埋头读书，钻进课堂和实验室；一些积极分子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迫害镇压，仇恨满腔，而产生急躁情绪。3月9日被捕的北平十七中学的学生郭清惨死狱中，消息传出，震怒了北平学生。3月31日，北平学联领导学生积极分子在北大三院召开追悼会后，举行了抬棺游行，遭到军警血腥镇压，50多人被捕，大批受伤。“三三一”抬棺游行，不仅使各校的学生骨干和积极分子受到打击，暴露了身份，脱离了一般学生群众，而且使备受摧残的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更加艰难的困境。

在这个关键时刻，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从延安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当他知道“三三一”事件后，4月5日立即给北平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即《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批评了这次过“左”的行动，指出：“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来一次以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使汉奸法西斯蒂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窒息爱国运动。”接着，他又于4月10日在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上，发表《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文章，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总结了我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从理论上、思想上、政策上以及工作方法和作风上，系统地分析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提出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积蓄力量，保存骨干，团结群众。后来，又针对平津学生运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正确对待

教师和学校当局”、“正确对待 29 军和宋哲元”两个小心翼翼的策略。

北平学联遵照北方局刘少奇的指示，检查了自己的工作，立即号召各校复课，针对国民党政府的“读书救国论”，提出了“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争取了教师和家长的支持，并且进一步健全和巩固学生自治会（后改名为学生救国会）组织，设法营救被捕的师生，充分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形式和机会，团结和组织群众。同时，为了促进师生合作抗日救亡，又发表了《告各界人士及各校师长的公开信》，主动争取各界和师长的同情、指导；也改变了对 29 军的态度，提出了“拥护 29 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组织与 29 军士兵联欢，激发 29 军官兵的爱国热情，促使宋哲元转变了对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态度。各校学生救国会，在校内也办起“读书会”、“文艺社”、“歌咏团”、“话剧团”和为同学谋福利的“清寒食堂”等，学联还利用假期，组织同学到西山野营。这些活动，得到了师生的拥护和赞扬。总之，在中共北方局和刘少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克服了关门主义的倾向，渡过了难关。

（三）

但是，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时局的变动，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北平学生运动又遭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袭击，在某些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中，产生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偏向。

1936 年 8 月下旬，我党改变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开始了“逼蒋抗日”的新政策，并且首先和张学良、杨虎城合作，在陕西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逼蒋抗日的好局面。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极不放心，在 10 月下旬和 12 月初，先后

两次来陕西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为了深入发动民众逼蒋抗日，巩固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中共组织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发动了大、中、小学万余名师生，举行纪念和游行示威，并要去临潼向蒋介石当面请愿。蒋介石闻讯后，即在途中部署重兵，急令武力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为避免发生流血事件，特驱车赶到十里铺，劝说学生，并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学生的请愿要求。当晚，张学良便向蒋介石反映学生的请愿要求，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蒋介石态度顽固，逼迫张学良、杨虎城下了最后的决心，于12月12日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即史称“西安事变”。这个事变，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调解下，在蒋介石终于接受了“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的情况下，得到了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策，又由“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当时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国共合作开始形成，蒋介石被迫向抗日方面转变。在这种新形势下，社会上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大肆活跃起来，尤其是王芸生，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5月，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6篇《寄北方青年》的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提出“目前的路线是‘团结救国’，其方式是以国民党为中心”，“不允许有一个以上的政府，一个以上的军队”。这就是说，除了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之外，不允许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政权和红军的存在，妄图诱惑学生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把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从火热的前线拉回去。这时，在我们党内和民先队员中，少数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严重的人，立即出来呼应。曾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的清华学生徐芸书（原名徐高阮），接连在《国闻周报》和《学生与国家》上，发表《论

无条件统一》、《论共产党问题》、《北方青年的回响》等文章，提出要无条件统一，取消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等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诬蔑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就是“有党派的狭隘的色彩”，是“民众运动中间的宗派主义”。清华救国会出席学联的代表黄刊，也在《国闻周报》上写文章，鼓吹取消所谓“左派”和“右派”，要搞“统一的”救亡运动。和他们沆瀣一气的还有民先队员蒋弗华（蒋福华），不但发表了《呼吁统一》的文章，提出“无条件统一就是使抵抗有胜利的唯一保证”，而且还在《学生与国家》上发表《青年独立宣言》，公开鼓吹青年走第三条道路。这个宣言发表后，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青睐，纷纷予以转载。很显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所谓“无条件统一”，不可能统一于共产党，而只能统一于国民党；主张取消我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民先队、北平学联），这只能起到瓦解抗日与革命的力量的作用。其结果，只能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有利于国民党反动派。因此，不击退这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右倾投降的歪风，就不能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扩大；便不能维护已经团结在我党周围的广大爱国学生；更不可能壮大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运动。

针对这股逆流，刘少奇先后发表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论左派》、《“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等文章，对党内外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进行了有力批驳。他指出，“如果在这里否认左派团结的必要，取消左派的团体，那就等于毁坏统一战线的中坚和支柱，也就等于毁坏统一战线。所以先进的、觉悟的团体和个人，一方面，要坚决地和各党各派、各种不觉悟的落后的群众进行统一战线，但另一方面决不要将自己溶解于统一战线中，取消自己的独立，而必须使自己更加团结，更

加强大，更加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刘少奇的文章和北方局的教育引导，大大武装了党员和民先队员，以及广大爱国青年，使他们认识了徐芸书、蒋弗华等人主张的实质，与他们划清了界限。随之，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北方青年中，也更加深入人心。

北方青年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引起了毛泽东的关切和重视，便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全国党的代表会议期间，接见了北方青年的代表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等人，对他们发表了题为《对北方青年的希望》的谈话，指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危害，号召北方青年要继续与之进行斗争，并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倾向和影响。

（郑 洸）

广泛的组织青年

——刘少奇谈白区的青年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党的代表会议。这次会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了“广泛的组织青年”的问题，并把它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方面，加以研究和部署，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这样，就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广泛争取与组织青年投入抗日民族的解放斗争，起了积极的准备作用。

(一)

现在，还是让我们先从会议对白区党的群众工作的基本要求谈起吧！

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所作的报告^①中，明确地提出了“为了争取与组织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入民族革命的战场，我们必须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正确组织公开工作和

^① 《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载《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秘密工作的联系，学习在各种环境下领导群众的艺术。”他还特别强调，“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是我们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

如何去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如何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这是当时摆在白区党组织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分别清楚领导党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党内工作方法和群众工作方法也是根本不同的。正如刘少奇说的，“如果我们的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没有清楚的实际的了解，那我们就不要去幻想组织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可见，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实现党的团结抗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十分迫切和紧要的。

那么，究竟党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怎样去建立？应该怎样去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到我们的群众工作中去呢？刘少奇在报告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极为精辟和全面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的基本观点：

1. 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但我们在群众中的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不是他自己认定自己是群众的领袖，而是群众认定他是他们的领袖），那完全不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是由于党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

同时，又必须知道，要使群众认定我们党、我们的同志是他们的领袖，并自愿地跟随我们去进行决死的斗争，这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期艰苦和正确地争取群众的工作过程。

2. 我们不是在组织上直接要求群众服从党的指挥，要求群众团体接受党的命令，而是要使群众自愿地接受党的政治主张。

3. 我们要求群众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同时，我们也要尊重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意见。

4. 当着我们的主张只有少数人赞成时，我们在行动上要服从群众的多数，在主张上则保留我们的意见。当我们的主张是多数人赞成时，方能要求反对我们的少数人服从我们的意见。

5. 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也才会尊重我们，信任我们。

6. 我们是以群众中一员的资格，在群众中出现，提出主张和办法，使群众自愿地接受，自动地跟着我们行动，而不是以共产党员或者自命为领袖的资格去命令和指挥群众。

以上这些，就是党员和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

刘少奇指出，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却对此不甚了解或不愿意了解，因而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有些同志，他只要求群众服从他，而他可以不服从群众，不尊重群众；他自以为群众领袖是可以自称的，是可以由党的决议任命的；他甚至强迫群众，命令群众，包办一切，取消群众团体的独立性，破坏群众团体的民主原则。刘少奇强调，“这种错误，大大地妨害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在我们党的周围。”

另一错误，是作群众的尾巴。刘少奇说，有些同志当着群众拒绝我们的正确意见时，他们就悲观失望，表示没有办法，不去耐心地进行说服工作，解释我们的主张，启发群众的觉悟，反而接受群众的错误思想，作群众的尾巴。

我们党的青年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次会议提出的党的群众工作的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以及要防止和克服的两种错误，对我们青年工作来说，无疑地不仅完全适用，而且必须予以坚决贯彻和解决。

(二)

这次会议对党的青年群众工作，予以了特别的关注，要求更广泛的把青年组织起来。刘少奇在向会议作的报告的第九部分“广泛的组织青年”^①，着重讲了这个问题。

首先，他充分肯定和评价了过去的青年群众运动和青年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刘少奇说：“一年多来中国青年学生进行了极光荣的民族革命运动，并在这个运动中建立了一些地方的学生会，并形成了全国学生会组织。北方的青年学生还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运动在全国是已有了不坏的基础。”

但他也指出了过去工作的不足，主要是：（1）对学生本身利益的工作还太少，有的甚至完全没有；（2）学生本身的组织还很弱，许多还很狭小；（3）他们内部的分裂现象还没有克服，这虽然要由国民党青年来负责，但左派青年中过左的关门主义也加深了这种裂痕。他希望我们的同志应该帮助他们来克服，并强烈地要求我们的同志，今后“应该参加与帮助青年学生运动，扩大它的群众基础，加强他们的组织，并为青年学生的切身利益而斗争。”

接着，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青年群众工作，发表了全面具体的原则性意见：

在学生工作方面，刘少奇特别提出了这样的要求：（1）组织学生会的自由，思想自由，救国自由；（2）多给学生以实习教育，取消或减少一些对学生无益的课程；（3）保障学生在毕业后的职业；（4）减少并改善中学的课程；（5）津贴穷苦的青年学生。很显然，刘少奇这里所提出的几个要求，都是属于维护学生切身利

^① 《六大以来》（下）第119—120页。

益方面的，而这一切，正是过去学生工作所忽视和所缺乏的。

对北方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刘少奇指出，现在基本上还是民族解放运动中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它在纲领和组织上，还欠缺广泛；在工作中还残留一些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残余。他强调地指出，民先队应该成为广泛的愿意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青年群众组织。他热切地要求民族解放先锋队“应该以抗日救国、争取救国自由、进行救国教育为它的纲领，在组织上也不应拒绝各派青年及某些愿意服从纲领纪律的青年团体加入。”

对青年的文化、娱乐、教育和体育工作，刘少奇指出：“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必须在青年中有系统的经常的来进行这些工作和组织。”

对各地的基督教青年会和童子军，刘少奇指出，各地基督教青年会“我们必须去加入”，“进行救国的宣传组织并便利青年的救国工作”；童子军的工作，“我们要努力去进行”。

对各种青年团体，刘少奇指出，应“在抗日救国目标下联合起来”，他认为这种联合“是必要的，我们应设法促成”。

对各地热情的抗日救国青年，刘少奇表示，“应该组织他们自己的团体”，但“它的名称，它的组织形式，不必一样”。关于工农青年，刘少奇强调“特别应该组织起来”。

关于儿童工作，刘少奇要求“各地应给以注意，应该促成儿童幸福促进会等组织，为儿童的幸福与教育而斗争，并应吸引儿童来参加抗日宣传运动。”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这一系列指示，为白区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进一步从思想上武装了白区的党组织和党员，为更广泛地争取和团结千百万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三)

这次白区党的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在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利用一切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展抗日群众运动，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迅速把广大热情的抗日青年，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建立和发展了各种青年抗日救亡团体。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抗战前建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它在1937年10月18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民先队工作的决定》^①后，有了极大的发展。中央决定：（1）凡民先队有群众基础的地方，不应解散民先队，而应使之发展成为广大青年抗日群众团体，并力争公开。（2）凡散布到各地去的个别民先队员，即应参加到当地各种青年群众团体中去，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并可依照各地情况，组织各种名义与各种性质的公开的青年群众团体。如有可能时，亦可组织民先队这类团体。（3）平津流亡学生中的民先队员，首先即应在各地平津流亡学生会中努力工作，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4）散到各地的共产党员的民先队员，应编入地方党内，并受地方党领导。如没有地方党时，即应负责建立地方党。（5）优秀的民先队员应吸收入党。（6）尽量使各地区内各种形式各种性质的青年团体互相联络合作，逐渐形成一个地区以至全国的青年救国联合会。由于各地对中央决定的贯彻执行，到1938年6月，全国民先队员总数已达5万多人，湖

^①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5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二月出版。

北、河南、江苏、安徽、湖南、江西、四川、广东、广西等地，以及海外巴黎、里昂等都有民先队分队部。他们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帮助建立救亡团体，把抗日救亡的种子撒向各地，动员和团结了广大青年。

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团”）。它是1937年12月在武汉正式成立的，是抗战初期中共领导下的一个青年抗日救亡团体。青救团建立以后，发展很快，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江西、四川等省，都有它的组织和成员，人数也曾达到5万人，仅武汉一地就有1万多名团员。青救团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各界青年，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做了许多扎实工作。他们派遣团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办事处举办的抗日游击战训练班，学习政治和军事，还成立了三个军队服务部，介绍200多青年到部队去，组织600多人的“八路军学兵队”奔赴延安等。它和民先队一样，是当时全国比较有影响的青年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抗战初期，全国各地出现了成百上千的学生抗日救国组织，各地学生纷纷要求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于是1938年3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出席人数123人，代表了广东、广西、四川、湖北、湖南、浙江、河南、陕西、上海、香港等73个团体单位。周恩来出席了大会，并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会议号召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到抗战斗争的行列中去——到军队去杀敌，到前线去服务，到工厂去为抗战而生产。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使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学生中具体化为全国学生的奋斗目标。会后，进步抗日学生的力量得到了

较大规模的发展。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1938年1月1日，中共为了加强对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更好地发挥青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发动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平津同学会、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中大附中抗日先锋队、青年抗日先锋团等8个主要青年抗日团体，联合建立起广东统一的青年抗日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它建立后，就组织队员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抗战的前线去，发动群众，引导青年学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广州沦陷后，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撤到了农村，从抗日救亡宣传走向抗日武装斗争，大批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加入了各种抗日武装，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几个青年抗日救亡组织外，还有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蚁社、中国回教青年抗敌协会、抗敌后援会、学生战时服务团、学生义勇军、学生救国会等青年抗日团体，他们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对于动员、组织各界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推动全国各地的抗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郑 洸）

引导爱国青年走向革命

——创办安吴青训班和 泽东青干校

在古都西安附近的嵯峨山南麓，有一处大地主庄园。这里是慈禧干女儿吴家寡妇的庄园——泾阳县安吴堡。抗日战争初期，根据毛泽东“来者不拒”的指示，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这里举办了战时青年训练班（通称安吴青训班）。它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产物。1940年4月，根据形势的变化，青训班撤离安吴堡，中央青委在延安创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泽东青干校）。青训班从诞生到最后撤离安吴堡的两年半时间里，培训了1.2万名信仰不同、出身各异的男女青年，使他们接受革命人生观和抗战建国本领的培训，进而成长为具有民族觉悟、抗日军政知识、拥护共产党领导和国共合作的抗日战士。他们象种子一样被撒向抗日前线、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友军、爱国青年团体以及自己的家乡，参加和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组织推动抗日青年统一战线；有的被输送到延安深造与工作。这所“青年之家”，为

中国革命立下了丰功，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一）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敏感的青年学生，从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抗日主张和坚决行动中，观察并相信它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他们决心去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

1937年秋冬，在各条能够到达陕北的铁路运输线上，在平坦的公路或是崎岖的山道上，许多从沦陷区、敌占区，从国民党统治区逃身的男女青年，他们离别学校、故乡乃至舒适温暖的家庭，成群结伙的，仨俩作伴的，不畏艰难险阻，潮水似的向西安云集。设在西安市七贤庄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庭若市，人群熙熙攘攘，从早到晚，有增无减。办事处处长伍云甫，中共驻陕代表林伯渠以及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耐心地听取他们的要求，了解他们的愿望，回答他们的提问。后来实在接应不暇，便在七贤庄毗邻的革命公园增设了接待站。一时间，革命公园的亭阁阶台挤满了着装西服革履、旗袍大褂和粗衣单衫的出身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的热血青年。尽管这时西安的气温很低，雪花漫飘，寒风飕飕，但他们的心在沸腾，不时响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义勇军进行曲》，此时格外激奋人心。青年们是在用歌声表示着决心，期待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意送他们去延安的回音。

（二）

当时的延安，无论是抗大^①还是陕公^②，有限的窑洞和物质条

① 抗日军政大学。

② 陕北公学。

件，一下子要容纳这么多人，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林伯渠、伍云甫一面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西安情况；一面筹划着安排这些爱国青年。

这时，中共中央青年工作部部长、西北青救会主任冯文彬和乔木(胡乔木)在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和中共陕西省委驻地——国民党统治的泾阳县云阳镇正举办战时青年短期的训练班。早在1937年9月下旬，冯文彬受张闻天委派，从延安到云阳镇参加接收安置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同志，他赶到云阳后，这项工作已接近尾声了，陕西省委的贾拓夫、欧阳钦等负责同志向冯文彬提出，陕西有一批西安事变前后青年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能否帮助训练一下，使之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抗战军事、政治知识方面得到提高。冯文彬请示中央同意后，便借用三原县斗口镇于右任先生的农场，于10月11日开办了第一期，学员是陕西省委组织的。经过半月的训练结业以后，反映很好。省委要求继续办，就又办了第二期，时间延长为三星期，地址也迁至云阳镇，就在这期结业前后，局势发生变化，大批流亡学生涌向西安，“八办”压力很大，林伯渠希望在云阳镇的青训班能够接收这些要去延安的青年。1937年岁末，毛泽东从延安打电话，要冯文彬回中央汇报青训班创办情况，冯文彬迅即赶回延安。毛泽东听了此汇报后，以政治家的战略目光充分肯定了“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的创办与作法，并称赞说：你们办得好，还要大办。我们的革命需要知识分子，我们要取得抗战胜利，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将来建设新中国，更需要千百万知识青年，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不能成功。青训班应该是来多少收多少，来者不拒嘛！接着，毛泽东又问冯文彬还有什么困难？冯文彬回答说需要讲授抗日游击战争课的教员。毛泽东点点头，表示赞同，便给负责抗大工作的

罗瑞卿写了个条子，让冯文彬拿去找罗瑞卿帮助解决。这样，青训班最早的军事教员——老红军黄春霖、李东潮便从延安来到了云阳镇。之后，中央又从抗大、中央党校等单位抽调了刘瑞龙、张琴秋、朱致平、屈志统、史洛文、董昕、陈宇、史固、李云新、杨诚、田夫、孙敬文等一批懂军事，懂教育，有一定理论水平，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到青训班，组成了青训班教学与管理的骨干队伍。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从第三期起，即从训练陕西青年积极分子转向训练全国广大爱国青年，学员由开学时 300 人左右到临结业时总数超过 500 人。云阳镇的破庙再也容纳不下了，1938 年 1 月便迁至安吴堡。从第四期起，青训班进入了大规模发展时期。青训班敞开大门，充分利用西安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区域，能够广泛接触各地各类要求抗战的青年这一地理优势，不仅大批接收西安“八办”介绍来的想去延安的爱国青年，而且 1938 年 2 月还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刊登招生简章，并派西北青救会组织部长黄华驻西青救西安办事处，负责青训班的招生和结业学员的分配。此间，由于日寇进袭晋南，同蒲铁路全线被占，从全国四面八方流亡到西安的学生越来越多，除中学生外，还有从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泰国、印尼、缅甸等海外回来的华侨青年和留学生；有从同蒲铁路组织撤退下来的产业工人；也有国民党的军官士兵、党部委员……青训班不论出身和信仰，一概欢迎，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爱国要求。第四、五、六期（第五期开始办两月班），学员均在千人以上。为适应需要，三月份起，青训班专门设立了职工连，四月扩大为职工大队，中共中央派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张浩来青训班任职工大队大队长。职工大队共办两期，第一期 5 月份结业，第二期 7 月份

结业，有 450 余名工人经过青训班的学习，成为抗战时期工人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

1938 年 4 月 29 日，中共中央讨论了青年工作，根据抗战形势需要更多的青年干部这一实际，决定进一步扩大青训班规模。当时中央青委书记陈云指出，青训班不只是对青年进行战时军事、政治常识和抗战本领训练的学校，还应该是“青年运动的大本营”，是“基地”，要担负起“向全国撒种子”的重任，以推动全国的青年运动。为此，中央青委和西北青救会的机关也由延安搬到了安吴堡，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伟大而神圣的事业中。这个时期的青训班，不但班名去掉“短期”二字，而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各种教材、教学形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按照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效仿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法，在实践中结合青训班的实际与需要，摸索总结出来的。

安吴青训班积极正确地贯彻党的全民抗战路线和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及策略原则，根据当时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推行战时教育”的方针，力求“在最短期间授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战时军事政治知识”，使之能“依据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精神，开展抗敌救亡工作。”依据这一方针和目的，在抗战基本理论方面，通过开设社会学课程，授予青年政治常识与政治学，使学员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讲授三民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孙中山先生为中国革命奋斗的历史及其伟大人格与模范作风，使之了解三民主义的真义；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政策和抗日的民众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职工运动、妇女运动）的基本原

则与怎样领导民众，使学员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政策及其工作方法。设置的军事课程，主要是传授应用的战斗动作及武器使用、步兵战术、游击战术、实战经验研究和组织军事演习等，以便具备实际参加战斗和指挥战斗的技能。

青训班灵活地运用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班部下设的生活指导处，是一般学校里所不曾有过的组织。它运用全新的教育方法，从日常生活上做起，启发、帮助学员提高自觉性和主动性，“以造就千万个真正英勇又有才能的民族解放干部”。学员按连（队）编制，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以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风作为青训班培养班风的标准。凡是要求学员做到的，青训班的干部，无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自觉地身体力行，既把自己作为学员中的一份子，又处处作为学员的榜样。学员中谁有思想问题，连长、指导员就会亲热地走到身边，促膝谈心，推心置腹；新同学一踏进校门，立即就会感到生活在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大家会热情地跑来迎接，帮着拿行李，铺卧具；定期的民主生活会上，学员和干部之间可以毫无顾忌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地运用自我教育的武器来扫除思想上的灰尘。那些刚刚从日寇铁蹄下逃亡出来的，从国民党顽固势力统治下挣脱出来寻求光明的青年，走进青训班，犹如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一切都是紧张活泼的，带着浓厚的青年色彩；一切都是民主的，有着尽你自由呼吸的民主空气。”^①正因为如此，青年们心甘情愿到安吴青训班来吃苦。陕西国民党当局，玩弄假合作真反共的两面派伎俩，变着戏法故意给青训班制造困难，青训班经费及物资供应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工作人员和学员都是打地铺席地而卧，上

^① 青救丛书之五《西青救与青训班》第9页。

大课在树林中席地而坐或砖石作凳，双膝为桌；吃的糙米青菜豆腐汤；墨水、纸张也都难以为继，可谁也不愿去上国民党办的有高额津贴的训练班，宁愿自己出饭费，甚至不惜抛下丈夫（妻子）和刚生下的孩子，冲破国民党的道道关卡到安吴堡来接受革命锻炼。

青训班认真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青训班的学员中虽然学生占主要成份，但学生中又有出身和经历的不同。如何正确看待出身官僚地主、资本家、社会人士以及国民党要员家庭中的知识青年；怎样认识他们的弱点，发现他们身上宝贵的品质；如何在短时期内准确地认识一个人，并给予公正评价与应有信任，不仅需要高度的革命热情 and 责任感，而且要有胆识。在国共合作复杂的环境里，青训班的党组织，牢记毛泽东对冯文彬所讲的：我们的革命需要知识分子这一重要论点，开办第三期时就注意在学员中培养积极分子并开始少量地发展党员。1938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积极稳妥地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决定后，便比较放手地、大胆稳妥地在青年学生和工人、农民出身的学员中接收优秀分子入党。两年多的时间里，有2000多名青年入党，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对此大加赞扬，称赞青训班为党输送了一批新鲜血液。

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对安吴青训班也非常关心，1938年7月从前线回延安途经西安时专程来到安吴堡视察。一天傍晚时分，朱总司令穿着同士兵一样的粗布军装，和蔼可亲的走到人群之中，在热烈地欢迎声中，朱总司令检阅了学员队伍，赞扬全体师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在青训班的干部会上和全体学员大会上讲了话，介绍前线情况，分析抗战局势，要求青年们“学好本领上前线”，还以此内容为青训班题词，鼓励青年一定

要肩负起民族的希望，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领土。大家请求总司令担任青训班名誉主任，得到同意，师生们欢欣鼓舞。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青委为贯彻会议精神，适应抗日形势，发展青年运动，在战争中训练青年干部，经中央批准，决定在安吴青训班组织六个战地工作团，分赴晋东南和晋察冀两个敌后根据地，帮助开展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从11月下旬起青训班就着手从各连干部和学员中选调战工团干部，陆续组成六个团，名称叫“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对外称西北青救会战地工作团。1939年1月10日，第一、二两个团先出发了，2月以后又有四个团先后离开了安吴堡。赴晋东南的团从西安乘火车沿陇海路东去，在河南渑池渡黄河到达目的地。赴晋察冀的团，经过延安，北上绥德、佳县渡黄河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第三、四、六三个团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邓发等中央领导亲切地接见了大家。毛泽东用他那风趣幽默的语言，象是谈心，也象是讲故事一样给大家讲抗战形势，勉励青年同志上前线去，到军队中去，到农村去，和工农兵相结合。叮嘱大家要善于学习，说话和行动都要大众化，搞宣传时，不要把“工”写成“王”，“人”写成“心”。接着，张闻天、陈云也讲了许多勉励的话。先出发的一、二两个团春节前夕到达了太行区八路军总部，康克清象迎接亲人似的端来开水，招待战工团员们。青训班名誉主任朱德更是关怀备至，向全体战工团员详细地介绍敌后斗争形势，交待需要开展的工作。第六团从晋西北去晋察冀要通过同蒲路封锁线，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指挥部队进行护送，在安全、生活等各方面要求下属部队给予方便和照顾。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一次行军途中同返回总部的23名奉命留在战区坚持反“扫荡”斗争的战工团员相遇，彭总立即下马，亲切地同带队同志一

一握手，告诫大家要提高警惕，以防国民党顽固派袭击，还亲自制定行军路线，要求急速行军，并让秘书拿来二百元钱给大家做路费。领导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如阵阵暖流，浸润着每颗年轻而滚烫的心，激励着大家勇往直前。

六个战工团的 200 多名安吴青训班学员，到达战区后，被分散在若干个县、区的地方政府中协助开展民众运动，组织青救会，建立儿童团。在沁县的同志，仿效自己母校的作法，举办战时青年短训班，培训抗日团体基层干部；协助晋城县青救会工作的同志，从当时紧急备战需要出发，把办战时短期青训班与备战工作密切结合，300 余名接受训练的区、村青年干部和积极分子回去后，发展了大批青救会员，组织青年参加民兵担架队，开创了战区青年工作新局面。

青训班从创办到 1940 年 4 月奉命撤离安吴堡，把最后的 300 余名学员和工作人员送入“泽东青干校”，历时两年六个月，共办了 14 期，组编到 127 个连（队），设置有干部连（以培养青年工作干部为对象）、艺术连、研究班、儿童连、女生连、农民连、军事连、佛教连等，把一万多名青年培养成有理想、有纪律、有专长、能战斗的抗日战士。输送到“鲁西、皖北、晋南、晋西、晋东、冀中各正规军和游击队有八千以上学员，他们在华中、华南的群众工作中，在若干高级的军事政治学校和若干地方政府里，表现出任劳任怨视死如归的奋斗精神，博得上下一致赞许。”^① 派往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教导队的学员和该教导队输送到青训班学习的青年军官，都能忠诚、机智、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宣传与组织工作。大规模内战开始后，这支爱国武装能够奋勇起义，是与青训

^① 青救丛书之五《西青救与青训班》第 24 页。

班和它的学员所作的贡献分不开的。派往许多民众团体和回到自己家乡的学员，亦发挥了“种子”作用，主动协助地方政府组织抗战力量，建立青救团、青抗先、青救会等青年组织，使青年运动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推动全国的青年运动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1939年10月5日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中写道：“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需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①这既是对青训班的充分肯定，又是对青年的厚望与勉励。青训班正是在毛泽东伟大思想指导下，把在黑夜中寻求光明的爱国青年引上革命的道路，并为其一生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在延安举行的全国党的青年工作人员会议上，进一步作出了加强青年干部训练的决定，一致主张将安吴青训班改为“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担负起训练中、高级青年工作干部的任务，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9年，当青训班正要转入专门训练青年工作干部的正规化新阶段时，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陕西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蓄谋已久的妄图挤垮安吴青训班的步骤。他们不断地派特务分子化装进入安吴堡村散布谣言，甚至进行挑衅，给前来安吴堡的青年设置重重障碍，威

^① 《安吴古堡的钟声》第1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胁人身安全；加之潼关以东铁路被敌控制，交通阻隔，因此，从1939年春季以后，青训班学员的来源大大减少。青训班班务委员会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不再按期招生，以现有人员组编成几个大队，分预科和本科，将1938年10月组成的干部一连编为本科一队，学期一年，实现训练青年工作干部的计划。1939年下半年，形势愈来愈险恶，青训班不得不中断它正规化训练青年工作干部的计划，做好迎接战争对付国民党突然袭击的准备。

关心青年运动，重视发挥青年在抗战建国中的作用，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贯思想。鉴于安吴青训班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共中央于1940年初便着手筹备在延安创办一所真正的青年干部学校，以培养有坚定意志、艰苦传统、虚心学习、民主作风、互助精神、活泼生动的，有青年工作技能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青年工作干部。这既是坚持长期抗战的需要，也是巩固现有的青年组织，进一步扩展青年运动的需要。2月中旬，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校址临时设在延安市北门外中组部组训班旧址，学校名称定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共中央决定用毛泽东的名字作为这所青年干部学校的名称，“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同时也是中国青年解放的旗帜，中国青年在这一旗帜的指导之下，将得到光明的自由和幸福。”^①就是要求全体学生要努力学习毛泽东的革命理论、革命方法及伟大精神。中央确定陈云同志任校长，冯文彬任副校长，黄华任教育长，具体主持学校工作。在筹备期间入校的安吴青训班部分学员和从四川撤回的青年党员和积极分子，约200余人，暂时住在北门外破旧的窑洞里。这些学生，边上课边参加建校劳动，校址建在文化沟的南山坡上，在有

^① 《新中华报》1940年2月14日第三版。

经验的陕北老乡指导下，学生们自己动手打窑洞。5月3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邓发、吴玉章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祝贺，王明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话。

泽东青干校学期为一年。首届学员主要是原安吴青训班最后留下的学员和从敌后根据地撤回青训班的战工团员，以及边区青救会干部，总计300余人。学校根据中央制定的教育方针，按学生文化程度、政治理论水平和青年工作实践经验等情况，分编为六个班：第一班是高级班，学生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理论水平较高，有相当的工作经验。学习任务，主要是比较深入地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与方法，总结研究青年工作的经验教训，探讨青年工作理论。第二班和第三班为普通班，学习一般的政治理论知识和青年工作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第四班是陕北地方青年干部班，注重提高其文化水平，同时学习政治及青年工作基本理论与方法。第五班是军事班，培养地方武装和军队的青年干部。第六班是儿童班，主要是接受文化教育。1941年1月底，泽东青干校实行正规化学制，学期为两年，分高级、中级、初级、艺术、军事五部。高级班的课程和中央马列学院相同，上大课时，青干校高级班与马列学院学生在一块儿。在举行新学制开学典礼上，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到会讲话，向青年干部提出了“学习多方面，从多方面学习”的要求。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泽东青干校、女子大学、陕北公学合并为延安大学。泽东青干校的部分学员被派往青年工作岗位，一部分在延安大学继续深造。

毛泽东非常关心青干校，经常向干部询问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情况。有段时间，学校一部分炊事人员嫌炊事工作太平凡，闹思想毛病，有的想调动干其他工作，有的闹着要上前线，威威武武

干一番，不安心工作，直接影响了全校人员的吃饭问题。这个情况被毛泽东知道了，一天下午，他利用晚饭后的时间亲自到青干校召开炊事人员会，直接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他用许多比喻耐心地阐述炊事工作的重要性，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从事的炊事工作比什么都伟大。离了你们，学生就不能学习，干部就不能工作，战士就不能打仗。在场的干部和炊事员都被领袖深入实际，关心群众，爱护青年，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作风所感动。一位当年亲聆教诲的刘安全同志回忆说：“我听了毛泽东同志讲的道理之后，当下思想就通了，安心做服务工作了。后来，组织上叫我和其他同志到老山烧木炭，我二话没讲，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我一个人用一辆牛车坚持拉柴烧木炭直到第二年春天。当年延安的青年，都把自己能够经常聆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诲，看作是最光荣、最荣幸、最得意的事，自觉刻苦学习，克服生活和学习上的各种困难。生活虽清苦，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高昂，要是学校让那个同志回大后方去，那谁也不愿意。

1941年春节期间，青干校派几位青年代表全校师生去杨家岭给毛泽东和朱德拜年。他们带着红枣和花生，踏着轻快的步子，兴奋异常地朝着毛泽东的窑洞走去。毛泽东连忙招呼让坐，亲切地询问青年干部的学习情况，还欣然为这几位青年题写了“肯学肯干，又是革命的，必定是有益的，必定是有前途的”的条幅。这幅题词成为青干校师生激励自己生活、奋斗的铭言。

当年成百成千的爱国青年，在安吴青训班、泽东青干校这所青年干部的摇篮里，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武装，亲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而成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许多岗位的领导骨干。他们的成长，给予当代青年最有益的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

党走，老老实实在地“学习毛泽东”。

（柳清群）

从组织上加强对全国青年工作的领导

——延安时期青年工作的领导机构

自从共青团实现改造以后，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如何对全国青年工作实行领导呢？在延安时期，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机构，及时地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加强了对全国青年工作的领导。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和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部

在共青团实行改造的过程中，各地根据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决定的精神，相继建立了各种各样抗日救国的青年群众团体，青年抗日救亡活动更加活跃起来。

1937年4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的新形势下，为了总结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经验，进一步团结全国青年担负起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领导召开了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提出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的决议》，决定正式建立“西北青

年救国联合会”，作为在全国青年救国会成立之前，各地已有的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大会选举产生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青救）执行委员会。

这次大会闭幕后，5月18日，西青救执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西青救执委会的常务办事机构。冯文彬、白治民、高朗山、刘秀梅、黄庆熙、徐克仁、李瑞山为常务委员，胡耀邦、刘西元为候补常委。前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当选为西北青救会主任。至此，共青团改造后，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就成为中共领导的全国各地青年抗日救国团体的领导机关。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并切实加强对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又在党内设立了青年部，部长为冯文彬。这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之前，在延安，全国青年工作的领导机构在中共党内和党外都初步建立起来了，从组织上保证了更好地指导全国青年运动，推动青年抗日救国运动广泛深入的发展。

党内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建立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很不平衡，并且非常复杂，各个地区极不一致，青年团体的种类各式各样，五花八门。有中共直接领导的青年组织，如青救会、民先队和其他青年团体；有中共影响下的青年组织，如学联、牺牲救国同盟、决死队等；有蒋介石国民党在战区和国统区的青年组织，如CC、复兴社以及稍后时间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等；还有其他党派和地方派系的青年组织。由于这种情况，全国青年运动的统一和青年统一战线的形成都受到阻碍，各党派青年团体之间的统一不可能很快形成。

单就中共领导的青年运动来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地

域上，有抗日根据地、战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占领区的不同；在性质上，已由阶级革命，转向为非党的、广大群众的、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各种各样抗日的青年群众组织，代替了共青团单一的组织形式。

尽管在1937年初，建立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和中共中央青年部，但是由于共青团实行改造前，团的基础比较薄弱，在一个时期内，很难建立起青年工作的各级领导机构，加上干部的变动和分散于各地等原因，所以抗战开始后，仍然没有建立起真正健全的全国青年领导机关。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各地青年抗日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客观上就要求建立一个健全的全国青年工作的领导机构。为了适应以上种种变化了的环境，保障和加强中共对青年运动有系统有计划的领导，以争取广大青年群众及其组织团结于中共周围，1938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了青年工作问题。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①。该《决定》规定：中共的“县委以上地方党部直至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要求“各地党部应该把青年工作当作自己主要工作之一，实行经常的检查和推动。”《决定》还具体规定：青委内至少配备一名“不兼别的工作而专作青年工作的人”，“党委不应随便调走青年工作干部”；要吸收原来共青团中的负责党员参加青委；“上级青委对下级青委应给以经常的指导，下级青委应对上级党委及青委做工作报告”。

中央作出这个《决定》后，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即中

^①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5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央青委)随即建立,原来的青年部停止工作。中央青委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长陈云兼任书记,原共青团中央书记、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冯文彬任副书记,委员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李昌、前在白区文委工作的胡乔木、出席少共国际六大中国共青团代表团团长宋一平、前共青团负责干部刘光梯和陕甘宁边区青救会负责人高朗山。

随后,中共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县委都先后设置了青年工作委员会,配备了专职青年工作干部。县以下的区委配备青年委员,支部有青年干事。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全国党内系统的青年工作领导机构就建立起来了,从组织上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得到了保证。

1938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①,进一步强调地指出:“加强青年工作是全党的责任,因此各级党须加强青年工作的领导”。中央要求区党委及其以下的各级青委均转入青救中去工作,取消原有党团,合并于青委,青委书记应参加常委,如原有青委书记不适合参加常委资格者,应暂由党委的一名常委兼青委书记,上级青委与下级青委有工作上的联系。中央的这一指示,进一步明确了青委的工作方式和党的青委同公开的青年团体——青救会之间的关系,取消了青救会中原有的党团,合并于青委,这样就减少了党对青救会领导的层次,有利于党加强对青年运动的统一领导。

陈云关于青年工作组织机构的意见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

^①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61页至46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中全会。这次会议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青委书记陈云做了《关于青年问题》的结论^①，对青年工作今后的重要任务、工作方针、组织机构、干部思想作风等问题讲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关于青年工作组织机构问题，陈云讲了两方面的意见。

一、青年工作统一组织的形式。陈云指出：“我们党所领导的青年工作，要有统一的组织，现在可以采取联络的形式。如果现在建立统一的青年组织，就可能同国民党的青年组织发生对抗。所以要暂时迁就一点。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可以组织各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各个青年团体要有组织上的联系，队员不分散。联合办事处可设理事。”“这样，既可以加强联络，又不至于太突出。”

陈云关于成立各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的意见，既是我党加强青年工作领导的需要，又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因为，一是抗战初期，全国青年抗日运动不断高涨，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各种青年抗日团体大量发展，各种青年团体需要有组织上的联系。青委是党内领导青年工作的体系，不能直接出面充当各种青年团体在组织上的公开联络者。二是这时蒋介石国民党正积极筹建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他们想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公开的全国性的青年组织，以“团结抗战，联合全国抗日青年”为标榜，从而控制全国青年运动，和共产党争夺青年。鉴于这种情况，陈云要求我党领导的青年工作，一是要有统一组织，二是现在不急

^①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64—46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于建立统一组织，而采取建立各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的形式。从表面上看，我党迁就一点，但在实际上减少了同三青团的对抗，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二、进一步明确了青委作为党委一个部门的特点。陈云指出：“各级党委要成立青委或青工部。青委是党委的一个部门，比其他部门要独立些，但不要成为第二党。下级青委可向上级青委报告工作，也可经过支部向下发文件。”他还说：“青年工作干部党委可以调动，但应考虑到青年工作要相当稳定，不要流动太大。”

陈云的讲话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引起了全党对于青年工作的重视，在抗日统一战线条件下如何建立健全青年工作组织机构思想更加明确。

中华青年救国团体 联合办事处的成立

1938年10月10日至11月21日，西北青救会在延安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的除西北青年救国会的代表外，还有华北、华南、西南、福建及南洋等地的青年团体和青年工作者的代表；不仅有中共领导的青年组织的代表，而且还有国民党的青年组织的代表。这次会议虽然名为西北青救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但实际上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抗日青年的一次大会师。中共中央青委书记陈云对大会提出了四项重要意见：“第一，希望大会除了检讨一年来青年运动的成绩外，并且还要与华北、华南、东南各省代表，互相交换工作的经验，使大会成为一个实际的学校。第二，驱逐日寇出中国并不是一句空话，全中国青年应该要参加到军队中去，并且要动员大批工农参加军队。第三，现在中国大多数青年还没有组织起来，希望本届大会讨论如何组织无组织的中国青年

问题。第四，更重要的，要把各党各派的青年统一起来，去除其中的成见。”^①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成立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简称中华青联办事处）。大会决定，为了促进各青年团体的友谊，建立互相间的联系，便利交换工作经验和意见，共同促成青年运动的统一和全国青年的团结，特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大会通过的办事处简章规定，办事处的工作为：搜集、介绍和交换各地青运材料；解答工作问题，提供工作意见；列席各团体的会议（必要时）；协助干部之供给及调整；领导通讯处工作；促进各青年团体的联络与合作；出版刊物及青运材料；与国际的青年团体建立经常的联系，有系统地搜集介绍和交换国际青运材料。

大会选出办事处执委 55 人，其中常委 7 人，候补常委 4 人。办事处主任为冯文彬，副主任兼组织部长为李昌，组织部副部长为黄华（北平学运干部），宣传部正副部长为胡乔木、刘光梯，军事部正副部长为冯文彬（兼）、刘玉堂（原江西少先队队长、湘鄂赣团省委书记）。联合办事处的机关工作人员，也从几个人扩大到了 30 多人。

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在组织上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青年运动的领导机构。大会以后，中共中央青委、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和西北青救会三个机构合署办公。对内是青委系统，保证了党对青年运动的直接领导。对外，在与国际青年组织的联系中，在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等不同地区、范围活动中，灵活地选择合适的组织名称。这样，三块牌子，一套

^① 《新中华报》1938 年 10 月 15 日。

人马，机构精干，又最大限度地发挥领导、指导青年工作的作用，促进青年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展。

青委机构和人事的调整

抗日战争发展到1941年，青委经过三年的工作实践，根据新的情况，中共中央对其地方组织机构作了变动，对中央青委的人事作了调整。

1941年6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①。在这个决议中，对青委的组织机构作了重要规定，主要内容是：

第一，同1938年的决定一样，在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仍然设立青委，并且进一步明确规定这几级青委的工作职责是：“掌管青运政策，总结青运经验，协同党委组织部调节青运干部。”

第二，明确规定：“区党委之青委工作人员应全部加入当地青救会领导机关工作，使青委与青救党团的实际工作合一，但尚有保存青委名义以便指导之必要”。

第三，同1938年的决定相比有一个很大变动，这次决定“区党委以下不设青委，原来青委的工作人员加入青救会领导机关，各级党部的工作人员加入青救会领导机关，各级党部经过青救会的党团去领导青运。”这就是说，1938年决定地委、县委设立的青委不再设立。因为这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青年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青年已被组织起来，党的政治影响和威望日益提高，因此党有条件直接通过青年团体中的党团和广大党员去保证党对青

^①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546—54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

年运动的领导。地、县青委取消，领导层次减少，既能克服忽视青年工作的现象，又能克服过分强调独立性的现象，使党委更能直接和便于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在青年工作尚未很好地开展的地委，如冀东平北，青委仍可保留。

第四，这次决议还明确规定：“各级青委，对下级之青委或青救党团，经过各级党委同意，指导和检查青年工作。遇必要时可召集青年工作者的会议。各级党委遇必要时应尽可能地吸收青委或青救党团负责人参加党的经常会议。”

1941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发出第二号通知^①，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中央青委人事。这是因为，1938年中央青委的成员工作有了变化，为了使中央青委成为实际的工作机关，每个青委委员都能直接参加青委工作，所以对人事作了重新的调整。陈云因中央领导工作繁忙，不再兼任中央青委书记。原青委成员胡乔木全力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李昌调华北工作，刘光梯在重庆西南局工作，他们都不再担任青委委员。中央重新决定的中央青委由凯丰（何克全，1932年以后担任过团中央书记，这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冯文彬、宋一平、蒋南翔（一二九运动的领导骨干、南方局青委书记）、高朗山五人组成，凯丰为书记，冯文彬为副书记。

193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青委的建立，对于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推动青年抗日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些地方建立青委机构的过程中，认识不尽一致，作法也不相同，青委的领导关系和青委的工作任务也不

^①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文件选编》第56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十分明确。为此，1942年初，人事调整后的中央青委提出了《关于根据地各级青委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①，2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并下发各地党委。这个条例根据几年来青委的实践，进一步提出了设立青委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如何建立青委机构和区党委以下的同级青年团组织统一的党团，明确了青委的领导关系和青委的任务与工作。条例规定，青委为同级党委下所属部门，需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同时，经过同级党委同意，青委可发出决定指示，可派巡视员指导检查下级青年工作，可召集青年工作者会议，可协助党委组织部配备和调动青年工作干部。条例规定，各级青委总的任务是研究和了解青年运动的情况，掌握青年运动的方针和政策，调剂青年运动干部，不断学习提高自己。青委工作的范围，在于组织和教育青年一代，积极参加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这个暂行条例的发出，统一了各地党委的青委机关的设立，使各级党委和青委进一步明确了青委的领导关系和青委的工作任务，更有利于党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委会

1942年以后，根据地的青年运动面临新的形势。为了战胜严重的困难，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许多地方在“改造群众运动”的口号下，为实现统一政策和组织，青救会与工会、妇联、文协等团体相继合并，组成民众抗日联合会或抗敌后援会等组织。一些

^①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文件选编》第579—58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青救会干部调做其他工作或派往下层工作，不少地方缩减了甚至削弱了青年工作的组织机构。同时，战争频繁，动荡不定，也难保青年工作的持续开展。加上一些青年干部不安心工作，所以使青年工作陷于涣散状态。

随着抗日战争局部反攻的节节胜利，解放区迅速扩大，作为根据地青年运动的总组织形式的青救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不能满足青年的进步要求。为了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了加强对解放区青年运动的领导，促进全国青年的团结和统一，援助国统区青年民主运动，争取沦陷区青年参战，1945年3月28日，西北青救会、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和学联，联名致电解放区各青年团体，提议组织解放区青年联合会。

4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成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指示》^①。党中央指示：“为了目前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加强对解放区青年运动的领导，准备成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党中央要求各解放区党委，组织各青年团体，响应西青救等组织发起的通知，在青年干部和青年群众中展开讨论，并在报刊上宣传解释。

在中共“七大”期间，5月3日，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延安召开成立大会，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山东、冀南、太行、太岳、冀鲁豫、广东等地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筹委会委员24人，其中常委11人，他们是：冯文彬、胡乔木、宋一平、王治国、蒋南翔、黄庆熙、安平、史立言、张迅如、朱荣、（另一人未定）。主任冯文彬，秘书长蒋南翔。5月4日，《解放日报》发

^①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文件选编》第61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表社论，号召解放区青年努力迎接新的战斗和新的青年组织的诞生。

不久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区青年联合会也未能正式成立。这个期间，中央青委书记是冯文彬，副书记为廖承志、蒋南翔，作为党内青年工作的领导机构，一直领导着青年工作，直到 1949 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诞生。

（罗成全）

促进全国青年运动的团结和统一

——毛泽东等关于三青团的电文

西北青救会号召全国青年大联合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了。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9月，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一并发表，宣告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开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7月9日，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向全国青年发出号召，不分党派、阶级、信仰、性别，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全国青年大联合；放弃党派成见，放弃互相攻击，全国各地的青年组织互相合作，产生全国及各地的青年统一组织；召开全国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全国青年纷纷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各种青年抗日救亡团体进一步建立和发展，青年抗日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广大爱国青年为中国共产党所影响、

所吸引，表现了他们高度的爱国热情。

关于三青团问题中共中央的第一次电文

国共合作的另一个最大的政党——蒋介石国民党，抗战爆发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单纯的政府和军队抗战，反对人民大众的抗战，因此谈不上国民党领导和影响的青年抗日运动。

1937年9月，蒋介石召集亲信陈诚、刘健群、康泽等人，要他们研究建立组织的问题。蒋介石想通过建立一个公开的全国性的青年组织，一方面以“团结抗战，联合全国抗日青年”为标榜，从而控制全国青年运动，和共产党争夺青年，维护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另一方面通过青年组织给国民党输送所谓新鲜血液，“以求三民主义的具体实现”，消除国民党内派系之争，重振党威，从内部加强其反动统治。次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取消预备党员制。4月6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6月16日，蒋介石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团长名义发布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并公布了团章。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在武汉成立，设立中央临时干事会，陈诚任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

国民党蒋介石在筹建三青团之初，曾数次邀驻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与国民党要员陈诚、陈立夫商讨组织三青团问题。为此，中共中央长江局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关于三青团问题，于1938年5月6日，第一次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①。

由于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行

^① 《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关于三青团问题致中央书记处电》载《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55—45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全面的人民的抗战路线所作的努力，在全国人民和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陈绍禹等的电文首先谈道，蒋介石组织三青团的中心思想“虽然欲借此溶化我们及孤立我们”，但也希望得到共产党方面的赞助。他“不愿冒昧组织，致重树一类似复兴社之青年小组织，反而失去青年信仰，愈利我们发展。”

陈绍禹等认为对三青团问题，我们“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因此就三青团的性质、组织原则、与其他党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意见，希望中央复电，以便“用中央用恩来名义”送给蒋介石。关于三青团性质，电文提出应确定为：统一青运的青年组织；不分党派，容纳各党派参加领导，共同负责指导青运；依三民主义总方针决定青运统一纲领；在纲领下统一训练方针。关于三青团的组织原则，电文提出：青年个人或团体自愿原则加入；实行民主集中制；容纳各党派负责人共同领导。电文还提出三青团应保持独立的青年组织性质，但加入三青团的青年有信仰及加入其他政党之自由，各党派不在三青团内发展其组织，团员应有年龄限制。

5月12日，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复电陆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①。复电明确地指出，我们共产党首先应承认三青团为“国民党青年团”，是“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共产党承认它的目的，一是要使三青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二是“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毛泽东等的电文还提出中共中央对三青团的具体建议：

^①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文件选编》第454—45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一）宗旨：在三民主义、总理遗嘱、抗战建国纲领与蒋总裁领导之下，以教育与组织全国广大青年参加抗战建国的事业。（二）会员：凡接受本团宗旨的青年，不分性别、阶级、职业、民族、信仰皆得为本团团员，团体会员亦可加入，但各团体除推行青年团的各各种决议决定外，仍应保持其本身的组织。（三）组织：本团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从青年团中央、省委、县委直到支部。（四）同国民党的关系：本团除接受蒋总裁的领导外，各级国民党党部可经过其在青年团内工作的党员实现其政治领导，不妨碍本团组织上的独立性。”

关于三青团问题中共中央第二次电文

长江局收到毛泽东等的复电以后，经过考虑及各方面考察，于1938年5月23日，再次以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的名义致电洛（甫）、毛（泽东）、陈（云）、康（生），提出关于三青团的意见^①。他们不同意毛泽东等复电承认三青团“只是国民党的团体”，因为这正是“蓝衣社复兴社所想，既不能成为改造国民党之各阶级联盟，也不能成为统一青年运动的团体。”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想以青年团成为各党及非党的人在其领导下溶化各党派代替国民党”，不想以三青团“与各党对立及采取特务办法”。而“复兴社之政训、别动两系统则主张不要其他党派分子参加，否则需退出原党，且以青年团内与西外与共产党对立，其作法为特务的”。陈绍禹等在这次电文中主张：（一）要仍如我们建议的原则，说明三青团为统一青年运动或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以

^①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文件选编》第459—46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别于其为候补党员组织为国民党的附属团体；（二）三青团最好有年龄限制，如不可能，则就为统一战线的组织，而非青年团体的统一组织；（三）三青团如以年龄为限制，则各党派可去人为指导，如不指导，则各党派要求加入，不退原党；（四）如不准各党派在三青团内发展，则须有年龄限制，国民党须给同样限制。

6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复电给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①，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我们上次电报中就认为这是我们目的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我们还有经过它改造国民党的目的。”中央书记处要陈绍禹等向蒋介石提出关于三青团的最高要求，“即各党派的各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民主集中制的青年群众的独立的团体”，“在蒋不能做到我们所希望的最高要求时，我们仍应提出可能实现的具体办法，如象我们上次电报中所提出的。”

鉴于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积极组织三青团，中央复电要求长江局“利用这种机会与各种可能，动员进步的青年公开加入，动员一部分有能力的同志秘密加入，并设法取得某些地位。”建议国民党三青团方面“派人到华北去建立华北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尽量能使我们的人参加进去。”中央书记处还提出：“应注意即使在我们上次电报中所提出的办法还不能完全实现时，我们仍应利用一切可能加入进去积极活动”。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中央长江局的这两次往来电文，可以充分地说明，当时中共中央是本着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为了促进全国青年的团结和统一，赞成蒋介石

^①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文件选编》第458—45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国民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且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希望三青团成为各阶级各党派抗日青年的联合体。

蒋介石国民党也接受了中共的一些建议，在三青团建立初期，他们从联合全国各地抗日青年为标榜，做了一些为抗战和青年服务工作。在抗日前方，三青团成立过战时服务总队、中央团部宣传队，开展慰问宣传活动，协助军队参加运输、通讯、侦察等项工作。敌机轰炸后，进行救护工作。在后方开展为前方将士献金、募集书报、缝制慰问袋活动，建立青年招待所，接待安置流亡青年和学生，做了一些服务青年的工作。1939年3月，西北青救会建议以“五四”为中国青年节，“五一”至“五七”为青年参战周，三青团在4月间，也发起“五一”至“五七”为中国青年周，定“五四”为中国青年节（但后来它惧怕青年革命化，觉得这个规定很危险，又改为“三二九”黄花岗72烈士牺牲纪念日为中国青年节）。

全国青年团结统一的三条道路

全国青年运动的团结和统一，主要是国共两党的问题。为了促进国共两党青年组织的团结和统一，中共中央不仅在党内讨论，并同国民党进行高级商讨，而且通过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三青团创建之时，即电驰申贺，并在以后一再恳切表示愿意同三青团“亲密合作”。1938年10月，西北青救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动邀请国民党三青团派代表参加。为达到中国青年的统一，大会具体地提出了三条道路^①：

第一，在民主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把一切青年团体联络起来，

^① 《致三民主义青年团电》，载《中国青年》第一卷四、五期合刊第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39年7月1日发行。

召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产生全国统一的总的领导组织。

第二，由各团体规定一个共同遵守的纲领，或者再定期召开全国联席会议，首先在行动上统一起来。

第三，以某一适当组织作基础，别的团体加入，使它不断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

这次大会还认为，如果中国青年的统一，是第一条或第二条道路，则三青团可以做各种会议的召集人，如果是第三条道路，则三青团也可能成为大会所说的“适当组织”。

中国共产党人心怀坦白，为着全国青年的团结和统一，试图以三青团为基础建立青年统一战线，因而西青救大会也诚恳地指出三青团“还有很大的弱点”。三青团团章规定不允许团员信仰三民主义以外任何的革命主义，这是极端妨碍三青团去团结各党各派各阶层的青年的，在实际上拒绝了广大的无党无派的虚心追求真理的青年，拒绝了劳动青年和信仰马列主义的青年。三青团团章缺乏民主，规定了许多不适用于民众团体过于严厉的带威胁性的纪律，也妨碍着三青团的发展。三青团的各级领导机关未能真正吸收各党派各阶层中有真才实学和高尚人格的人才，未能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从团员中发现大量有朝气的青年人才。大会表示，坦率地指出三青团的这些弱点，完全不是为着和三青团分道扬镳，而只是为着使国共两党的青年组织的团结和全国青年的团结，由愿望变成活生生的事实，也为着使三青团的蓬勃发展和远大前程，由愿望变了活生生的事实。

致三民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书^①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蒋介石国民党虽然还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使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逆转。国民党政策的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各地的反共磨擦活动日趋严重，许多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都遭到破坏和取缔。全国学联、各地民先队、青年救国团等组织先后被迫解散，大批爱国青年被逮捕、被杀害。在西安，国民党三青团设立了迫害青年的西北青年劳动营，专门关押奔赴延安而被扣留的青年男女。

面对着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继续争取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维持国共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1939年5月4日，中共中央通过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发出《致三民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书》。

这封书信简要地介绍了西北青救会成立两年来的工作情况，陈述了对于青年运动团结与统一的意见。书信重申西青救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青年达到统一的三条道路，热忱希望三青团“放大胸怀，高瞻远瞩”，“决心进行必要的认真的改革”，“把强大的全中国青年统一战线树立起来”。这样三青团的名字“亦必将与中国青年抗战建国的历史同在世界历史上放出瑰奇不灭的光辉”。

^① 《中国青年》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第3—8页，中国青年社1939年7月1日发行。

这封书信最后呼吁：“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必须建立我们的青年统一战线”。“中国青年只应该趋向更广泛更民主的团结，决不应该倒向磨擦和分裂，而团结的成败，现在正系于诸君的一念。”“一切有爱国心的青年赶快团结起来，赶快建立真正的统一战线！”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青运方针：坚持青年统一战线，继续采取‘五四致三青团书’的态度，用以争取青年的多救，在继续抗战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之下。”^①

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光明磊落，忠诚全国青年团结统一的态度，不仅影响了广大青年救亡团体，就是蒋介石也不得不复电勸勉西北青救会“要盼全国青年一致努力工作，效忠党国，以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为要”。

十团体上书蒋介石^②

1939年冬至1940年春，蒋介石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在山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矛头指向八路军总部。在政治思想上，国民党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肆贩卖反共理论，叫骂“共产主义不适应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1939年10月，国民党中执委制定6项压制破坏青年抗日运动的反动措施，加强了对青年的专制统治。国民党三青团利用提供经费、扶植某些组织和派遣爪牙等方式，争夺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三青团势力加紧向学校渗透，以实现大中学校“党团化”，打击一切进步学生，严防共产党的活动。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第一次印刷。

② 《中国青年》第2卷第8期第2—8页，中国青年社1940年6月15日出刊。

中国共产党坚决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其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真分析了国内政治情况，明确地指出：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共产党的任务仍然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他们“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因为他们还愿望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是错误的。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所以我们又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继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晋察冀边区青年抗日救国会、冀中区青年抗日救国会、晋东南青年抗日救国总会，冀南青年救国总会、山东青年救国联合会等十团体，于1940年5月4日，借第二届中国青年节之际，上书蒋介石。

这封书信首先陈述了北方抗日根据地及北方青年的进步“简直是快极了”的情形，表明了北方青年对祖国前途和青年前途充满信心，决心“继续和加紧我们的战斗”。

书信接着揭露了顽固派破坏抗战团结，制造分裂磨擦，从政治上思想上压迫毒害青年的事实。对比国共两党青年组织发展的不同结果，尖锐地指出国民党三青团对于青年采取了“一套旧方针、旧办法，死抱住久已破产久已过时的一个党、一个主义的陈

腐骸骨不放，因此就自食其报，得了这种胜人不足、败己有余的结局”。十团体提出希望国民党三青团抛弃旧方针旧办法，实行新方针新办法。警告他们，如果继续采取屠杀摧残的方法，“结果必然要走到与他们预期恰恰相反的方向”。

书信最后向蒋介石提出三方面的建议：

“请您下个命令，叫那些磨擦分子，从今天起就完全停止这种磨擦，全国团结一致对外。”

“请您下个命令，叫那些负责的人们，立即恢复青年的思想、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确认学术自由，减免学生的学膳杂费，强制减低物价，改善各阶层青年的生活。”

“我们提议撤消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全部特务人员，厉行团内民主，加以自下而上的改造，使南方的青年和北方一样活跃，乃至比北方更加活跃。我们继续向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伸出诚挚友谊的手……请您出来，召开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北方青年团体的联席会议，交换工作的经验意见，共同商讨全国青年的团结大计和各项切身问题，共同听您的指教。”

7月，在抗战3周年和三青团成立两周年之际，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这个文件题目是告全国青年，但其内容只偏重于后方的青年。他表示了对于当时青年运动的见解，继续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方针，对于全国青年许多迫切的要求、全国青年运动和三青团根本症结所在却没有解决，对于西北青救会等十团体上书提议也置之不理。

此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更加嚣张，他先后又发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区域政治环境更加恶劣了。当初，中国共产党认为三青团是有可变性的，它在环境好转，国民党更进步的条件下，是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变的，有可能成为青年统一

战线组织，所以曾试图以三青团为基础来建立青年统一战线，并且作了极大的努力来促进全国青年运动的团结和统一。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不愿意有一个真正统一战线的青年团体。他要的统一是解散中共领导的团体成为在他控制之下的统一，是要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的统一，即所谓“思想集中，意志集中”。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逆流中，三青团压迫进步青年，反对共产党，不容许各党派加入与合作，成为蒋介石国民党的一个反共工具。三青团内部极为复杂，主要领导为反共的复兴社分子所把持，组织不统一，地方派别斗争很凶，成为了国民党内小组织争夺之处。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三青团已经不可能成为全国适合的青年统一战线的团体。

（罗成全）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朱德赠给青年的“礼物”和“宝贝”

毛泽东曾经向陕北公学青年赠送“两件礼物”，书写了“要造就一大批革命的先锋队”的长篇题词，并发表过“学习鲁迅精神”的讲话；朱德同志也曾赠送“三件宝贝”给延安的青年。还有他们其他一些教诲，当年都被延安的青年传为佳话，从延安传到敌后，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的斗争。

现在让我们分别加以记述，以期“温故知新”，得到新的启迪。

（一）

这里有必要首先简介一下陕北公学的情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寻求革命真理的渴望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纷纷成群结队，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奔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所抗日军政大学，已无法容纳，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培养这些青年成为抗战需要的人才，中共中央决定再创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陕北公学（简称“陕公”），并选派成仿吾担任校长和调一批红军干部参加建校。

陕公校内设有社会学系、师范学系、农民运动系、日本研究系、国防工程系等。除设专业课程外，还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中国问题、游击战争及军事常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公共课。1937年10月^①陕北公学正式开学，学员共约600人，有许多是参加过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有的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少数是在白区入党的新党员，也还有从南洋、越南等地归国的爱国青年华侨。他们在陕公学校领导和老红军、各级干部的带动下，自己动手，艰苦奋斗，挖窑洞、修操场，投入建校活动，为学习创造条件。到1938年，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陕公先后培训了3000多名学员。这时陕公的主要课程有三门：（1）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改为中国问题）；（3）抗日游击战争与群众运动。此外，还经常进行党的路线和时事政策学习，普遍进行军事训练。这一时期，在陕北公学学习结业的学员，大多数分配到敌后的抗日前线，极少数分别分配到大后方工作。当时学员毕业离校，大家都高唱成仿吾校长作词的“毕业上前线”的壮歌。歌中唱道：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牵，纵或有点留恋。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锻炼；国难已经迫到了眉尖，谁有心意长期钻研？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们的血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去同我们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这首半个多世纪前的歌曲，今天我们回味起来，还是那么令

^① 另有8月与9月之说，但毛泽东给陕北公学成立开学纪念题词是1937年10月23日。

人心情激荡！

陕北公学后来又有了多次变迁。先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封锁陕甘宁边区，肆意拦截、破坏、迫害到延安去的青年，加上生活供应上的困难，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区举办分校，那里靠近陇海铁路，距西安也比较近，青年入边区相对说比较容易。1938年7月7日，陕北公学分校正式开学，校址设在陕西旬邑县以看花宫为中心的附近几个村庄里。李维汉担任分校校长。随着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敌后根据地的扩大，培养和输送干部的任务也更加繁重与紧迫。1939年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北公学绝大部分干部学员，跟随成仿吾校长奔赴敌后，走上革命的新征途。为了满足各抗日根据地培训青年干部，充实各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需要，193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延安北郊继续筹办陕北公学。这样一直到了1941年9月，陕北公学才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从1937年到1941年，陕北公学为抗日和革命培训了7000多名干部，他们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教导，为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建立新中国而英勇不懈地奋斗。

（二）

陕北公学的成立与发展，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中共中央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规定政治局委员都要到陕公讲课。周恩来、张闻天、朱德、陈云、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凯丰等，都到陕公讲过课，并在各方面给予指示和支持。毛泽东则亲自带头，多次到陕公讲演，还参加学校的开学和毕业典礼。特别是在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

成立与开学纪念撰写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著名的题词：^①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这个题词距今也已逾半个多世纪了，中国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已 40 多年。现在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比抗日与革命来说，要更伟大光荣和艰巨。毫无疑问，我们仍然需要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去迎接新的挑战，完成党的新的战略目标。让我们继续以毛泽东这个题词的要求共勉吧！

（三）

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有正式记载的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报告和讲演有 4 次：1937 年 10 月 19 日在陕公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38 年 4 月 1 日在陕公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1938 年 5 月在陕公第二期学员毕业大会上关于抗日战争形势和持久战的理论与战略的讲话；1938 年 9 月在陕公高级研究班结业大会上关于哲学几个问题的讲话。由于本文主题和篇幅所限，下面仅着重介绍前两次讲话。

1937 年 10 月 19 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

^①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 3 页，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版。

话，一开始就指出，“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他说，“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他强调“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他说：“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又说：“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对这种先锋分子，毛泽东提出了4条要求，即他们“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毛泽东这里关于造就一大批革命先锋队的思想，后来，在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中，又作了进一步表述，本文已在上面介绍了这篇著名的题词。

接着，毛泽东论述了鲁迅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所占的地位。他指出，鲁迅“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个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毛泽东称赞鲁迅有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毛泽东说，“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和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

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毛泽同志指出，“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他要求大家。“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紧紧围绕“造就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队”这个主题，提出希望和要求，他号召青年学习鲁迅精神，做革命的先锋，并期盼陕北公学造就出这样的革命先锋分子。历史已经证明，当年聆听过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绝大多数陕公青年，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期望，始终站在革命先锋队的行列中，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到底。

1938年4月1日，毛泽东参加了陕北公学第二期的开学典礼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①毛泽东说，“你们从全国各地，从战区，从后方，从南洋群岛，从几千里、几万里的地方来了。”“你们这样的一千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我想是由于你们对共产党的信仰，如果不是中共中央在这里，你们不会来的。”

接着，毛泽东说，“共产党为什么会被你们信仰，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因为他有他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在这里，毛泽东讲了共产党的两大特点：“第一，他有一个方向，政治的方向。”“那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并说，“共产党，从他生下来的那天起，就决定了这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它可以给人民最大的幸福。你不能够走完民主的路就不往前走了，要走的，那就是社会

^① 《党史研究》1981年4期。

主义的路。可是，你要到社会主义去，就必须先走现在的路，按照现在的方向走。”他还说，“为什么全国人民特别喜欢共产党呢？因为他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坚持了这个方向。”第二，“他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就是：艰苦奋斗！”“这种艰苦奋斗，在全党成了一种传统的风气。”毛泽东说，“有这两个好处，大家就都觉得共产党好了。”

也就是在这个讲话的最后，毛泽东向陕北公学的青年，赠送了“两件礼物”。他说，“今天陕公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送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又说“我的礼物就是这两件，好不好，你们再想一想。我想是有用处的。只要我们有一个一致的政治方向，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而且坚持这一方向和作风，就可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当年听到毛泽东讲话的陕北公学的青年，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他们在讨论中，纷纷表示，毛泽东赠给的这两件礼物极为宝贵，一定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和中国革命事业中，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怕一切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持到底，直至最后胜利。他们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努力去做。

（四）

朱德对来到延安的青年们也无比关怀，给以许多教诲。他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1937年4月）和第二次代表大会（1938年10月）的开幕典礼，并讲了话。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他希望中国青年在抗日中组织

起来，实现西北青年与全国青年的大联合。他说，“迅速地把全国青年民众吸收到抗日组织中来！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和平统一，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是我们的真理。”“我们要认清这个真理”，“为这个真理而奋斗”。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朱德作了《青年把抗战建国事业的担当起来》的讲演。他强调，要重视青年在抗战救国中的作用，要“用尽一切方法，帮助他们开展抗战工作”，要“时刻帮助青年学习”，要“培养青年，尽量使他们发展才能，使他们成为国家民族的主人翁”，朱德希望青年“都以抗日救国为前提，在战斗的环境中团结起来。”

朱德还亲自担任安吴青训班的名誉主任。安吴青训班，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战需要和满足广大爱国青年抗日救国要求，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一所战时青年干部学校。最初叫“战时青年短训班”，后来改为“战时青年训练班”，最后定名为“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通称“安吴青训班”。安吴青训班以“遵照抗战建国纲领，训练青年工作干部，服务战区、军队、农村，开展青年运动，组织动员青年参加抗战，达到统一青运，完成中华民族彻底解放为宗旨”，以“坚定刻苦，勇敢活泼，民主团结，虚心切实”为校训，按照名誉主任朱德同志“学好本领上前线”的要求，以“青年的位置在前线”这样的口号互相勉励。从1937年10月11日创办，到1940年5月撤离延安，共办14期，培训了一万二千多爱国青年。

朱德对陕北公学也亲自题词：“把陕公艰苦奋斗的作风传到一切抗日民众中去。”

最使延安青年难忘的是，朱德曾代表中共中央向他们赠送“三件宝贝”：镢头、枪和笔。他勉励延安的青年们，拿起镢头开

荒种地，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建设好边区；拿起枪来打击敌人，学会武装斗争，保卫好边区；拿起笔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文化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他说，温室里长大的花草，经不住风霜吹打，不进火热的炼钢炉，就炼不出顶好的钢来，青年应该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去锻炼成长。

1940年5月五四运动二十一周年时，朱德发表了《五四运动与青年》的纪念文章。他充分肯定了青年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并欣慰地说，“在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新一代的青年，更多的、更英勇、更具有牺牲精神的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抗战事业。”他告诉青年说，“共产主义的道路是走向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道路，代表着全体人类的利益。在目前中国，共产主义的道路首先是要驱逐日寇建立新中国，这符合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国青年想前进而不想后退，如果中国青年想在长期斗争中不作时代落伍者，那么他就必须走上这独一无二的道路——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还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中国青年的大路。”

当年在政治上不断追求进步的广大抗日青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老一代革命家的指引下，纷纷走上了信仰共产主义这条康庄大道，成为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朱德的关怀与教诲，极大地鼓舞了延安的抗日青年。他们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积极掌握各种军事知识和本领，在火热的抗日斗争和生产劳动中锻炼思想，磨炼意志，努力改造自己，成为革命的先锋。

（郑 洸）

隆重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

——毛泽东等论五四运动和 《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发表

1939 年 5 月 4 日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20 周年的日子，而且也是把 5 月 4 日第一次作为中国青年节的时候。因此，更增添了节日的热列气氛。说起规定 5 月 4 日为中国青年节，那还是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当年 3 月间向全国提议的；4 月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也决定 5 月 4 日为中国青年节。不过，国民党的政府由于惧怕青年的革命化，随之又改为 3 月 29 日（黄花岗 72 烈士牺牲纪念日）为青年节了。

对延安各界青年开展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的活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重视和关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都撰写纪念文章，回忆五四运动的亲身经历，阐述五四运动的历史和意义，并对抗日青年寄以殷切期望，毛泽东还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演，把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

这次纪念活动是延安时期青年运动的一件大事，它留给了中国青年运动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这次隆重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的活动，是在抗日战争进行了近两年，党内又一次战胜王明错误路线，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革命青年运动已有 20 年历史情况下热烈进行的。

经过近两年的抗日战争，全国抗战形势有着很大的变化：

首先，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了两种不同抗战路线与方针，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大溃退，一个大发展。国民党实行限制和压迫人民群众抗日，对敌妥协退让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结果损兵折将，丢城失地。从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到 1938 年 10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国民党军队从华北、华东、华中一直退到了四川，大半个中国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而共产党实行的是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许多抗日根据地，到 1938 年 10 月，就已经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拥有数千万人口，八路军、新四军从几万人迅速发展到了 15 万多人。

其次，抗日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解放区战场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1938 年 10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之前，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用主要的军事力量向国民党战场进攻，对国民党采取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但是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严重威胁着他们的后方，所以在他们占领武汉以后，就不得不停止其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而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对国

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将其侵华的主力大部分用来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扫荡和进攻。这样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就担负了主要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任务，领导抗日的重担，也就实际上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再次，这时，在英、美帝国主义者劝降和日本侵略者的诱降的压力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加紧了反共和投降活动。英、美帝国主义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为了引诱日本北攻苏联，在1938年到1939年间曾几次阴谋在东方牺牲中国以取得和日本妥协，他们不断地劝说国民党向日本投降。而日本侵略者也加紧了国民党进行诱降活动。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日派汪精卫集团，已在1938年底公开投降了日本。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蒋介石集团，则更加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们一方面保存实力，避战观战，同时，不断与日本侵略者勾勾搭搭，进行密谋投降的活动；另一方面加紧反共，为投降日本侵略者作准备。特别是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文件，加强了法西斯特务统治。当时形势的特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摆在全国人民和青年面前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反对投降和分裂，以使中国革命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这次纪念活动，也正是我们党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党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树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胜利地完成了

长征，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由于日本侵略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存亡，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国内各阶级、政党、集团的关系也随着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集中反映在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也就是国共两党又实行了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种变化和发展，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反映到共产党内，就是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王明这时从极左跳到极右，认为抗战只能依靠国民党才能取得胜利。他相信国民党而不相信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抹煞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区别，反对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什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这两个“一切”实质就是一切服从国民党。他根本不敢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斗争，不敢放手发动抗日群众，不敢发展抗日武装，不敢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运动。王明这一套完全适应了蒋介石反共政策的需要，对抗日战争和我党的事业有严重的危害。

为了纠正王明的错误，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驳斥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谬论，坚持了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规定了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的路线和政策，确定了我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战区和敌后等等，从而取得了全党在指导思想和工作上的一致。

对于这次会议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意义，毛泽东后来曾

经指出：“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①

再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青年运动的情况看，这20年中国革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这期间经过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中国青年积极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他们不仅为动员全民族团结抗日起了推动作用，而且踊跃参加抗日武装，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他们有的不畏艰险，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爬山涉水，奔向中共中央所在地、革命和抗日的中心——延安，接受革命教育，并深入敌后，参加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走与工农群众与革命武装队伍相结合的道路；有的在国民党统治区与日本占领区，坚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总之，广大青年是抗日战争的一支英勇而积极的力量。

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广大青年的抗日爱国行动，在政治上乱加罪名，恣意迫害。开始是限制，后来转为取消青年抗日活动，对青年抗日团体公开取缔，对抗日青年大肆逮捕、监禁，甚至予以杀害。在思想上加紧法西斯教育和控制。他们封闭进步书店和报馆，禁止青年宣传抗日和阅读进步的抗日书刊。在组织上，国民党于1938年7月正式建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强迫和欺骗青年加入，妄图以三民主义青年团来控制全国的青年运动。这样，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运动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局面。而共产党领导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的边区和抗日根据地青年的境况则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国共两党对抗日青年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态度的结果，也是国共两党对抗战所实行的两条不同的路线在青年运动中的反映。

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变旧中国为新中国，担负重大责任的中国青年应当怎么办？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政治方向？应当怎样更好地为抗日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这就是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时，人们所要探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及其战友作了中肯精辟的阐述，并寄抗日青年以殷切的期望。

（二）

毛泽东及其战友十分重视这次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的活动，他们带头撰写纪念文章，谈对五四运动的回忆和感想，为此，在延安重新出版不久的《中国青年》杂志，在第 1 卷第 2 期上编发了五四特辑。现摘引了一部分以飨读者。

毛泽东在纪念文章^①中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级。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命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与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得了一支生力军，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而在五四时候，英勇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是数十万的青年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之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毛泽东总结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和依靠的根本的革命力量后，特别强调地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558—560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

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这里毛泽东史无前例地作出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的论断，为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成长的途径。毛泽东最后希望全国青年和知识分子“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与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刘少奇在文章^①中回忆说：“在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正是我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在毕业考试之前，爆发了五四学生的反帝大浪潮。这个浪潮波及到长沙以后，长沙的学生也罢课了。并由各校学生的各班派出代表举行了全市学生的多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响应北京学生运动及抵制日货，组织学生联合会，并加入全国学生大联合。长沙学生又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派遣宣传队在城市及附近乡村宣传民众，抵制日货等。当时我们毕业考试提早了（各校均提早毕业考试），但学校教员也同情学生运动，所以考试的成绩并不算很坏。”“我在毕业后两星期，没有等到毕业证书的发给，即同几个同学转到北京，并与北京大学（当时学生运动的中心）的同学取得联系。当时是暑假，天津的学生也有不少到了北京，曾在天安门举行了很大的示威，并在天安门露宿了几天。街上的群众运动从这次示威以后，即不多见。但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刘少奇在谈了这个新文化运动特点之后指出，“在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已占了这

^① 《对五四运动的回忆和感想》载《中国青年》第1卷第2期，1939年5月1日出版。

个运动的优势。在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传到了中国，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派别。”接着，刘少奇写道：“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马克思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马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雄伟的力量。并在这以后，马克思主义永远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着主要的地位。”刘少奇这里所描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不断开辟着自己前进的道路。

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组织部长和中共中央青委书记的陈云，在文章回忆^①说：“五四的时候我才十五岁，是一个高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那个学校是在上海附近的乡间，很快就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们由一个姓张的教员领导着罢课之后，还进行了宣传和演剧。我还记得我们演的剧叫做叶名琛，我也扮了一个脚色。有一次在茶馆里讲演，我演讲的时候手足似乎蛮有劲，把脚一顿，茶馆里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这个小镇也罢了市，人民反对日本和反对卖国贼的情绪，确是很高涨。”接着，陈云写道：“我觉得现在的青年比二十年前的青年实在幸福得多。……这二十年来中国青年运动已经积蓄了很多的经验教训，不用再在摸索中多走冤枉路。”最后，他“祝全中国的青年在纪念五四的时候，能够团结一致，站在抗战的最前线，完成五四运动所未完成的战斗任务！”

当年中共中央重要的负责人洛甫(张闻天)写道^①：“我们应该纪念‘五四’，因为‘五四’是中国青年的民族觉悟与自我觉醒的开

^① 《中国青年》第1卷第2期，1939年5月1日出版。

始，而青年是当时伟大的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我们今天特别应该纪念‘五四’，因为今天中国青年正为着‘五四’所开始的伟大的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的事业而奋斗。”洛甫指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中国青年的解放是不能分开的，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也即是为了中国青年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最后，他热情地欢呼：“‘五四’是中华民族的！‘五四’是中国青年的！”

李富春也深情地回忆着五四运动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①。他写道：“二十年前的此时，我正在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读书，北京学生打卖国贼曹、章、陆的消息传到保定后，我们当晚即开会推选了四个代表到北京联络，当时我也是代表之一，参加了天安门请愿回校后即在保定组织了学生联合会，做了许多响应北京学生的宣传、募捐等工作。经过曹锟的命令（当时曹锟是直鲁豫皖四省经略使驻保定）以提早放假为名，实际把学生驱散以后，我同一些湖南同学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并准备到法国作工求学，因而在北京西山的杨怀忠先生家认识了毛泽东、蔡和森二同志，那时他俩正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五四运动以后，留法勤工俭学的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准备新的运动的初期的组织工作之重要的一部分。”他认为，“历史不是重演的，‘一二九’的平津学生运动比五四运动更激昂，更加推动了全民族。‘一二九’前后的新启蒙运动是来得更明确更进步，更能领导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迈步前进了，”他郑重地要求“现代的青年们请记住：当你们纪念二十年前的‘五四’时，你们是比较二十年前的青年更幸运，更进步，负着更重大的责任的！”他最后写道：“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坚持的过程，现代青年要抱着

^① ^② 《中国青年》第1卷第2期，1939年5月1日出版。

为民族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决心，要有不怕任何艰难的百折不挠的勇敢，要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伟大民族气节，才能完成黄帝子孙的历史任务。”

我们党内著名的五老之一，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这样写道^①“‘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化上起了启蒙作用，提起‘五四’大家都会想起这个运动在思想文化上所掀起的伟大波浪，它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及后来大革命产生的影响，然而不可抹煞的却是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中的光辉地位，没有当时青年的热烈参加与广大同情，这个运动就不能够有这样的广泛的开展与伟大的成绩。”林老深情地写道：“一切是属于青年的，青年永远是时代的骄子，是社会中最生动珍贵的力量。他们承继着过去光荣的传统，担负起目前艰巨的任务，为实现未来的辉煌远大的理想事业，而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他表示“对于中国青年我是抱着无限的期望，同时更相信他们的伟大力量。”他说：“看到正在长成起来的英勇活泼的新的年轻的一代，我不仅相信他们能够在苦难中锻炼成坚强的战士，而且相信他们会改造世界，紧紧地把辉煌的明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引述的上面这些纪念文字，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了，而我们今天重温它，还是那么令人感到亲切、真挚与富有启迪。

（三）

1939年5月4日下午，一列列年轻的队伍，浪潮似地涌到延安城北门外的大砭沟（曾被称为文化沟）的广场上。他们喜气洋洋地来到这里参加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暨庆祝首

^① 《中国青年》第1卷第2期第10页，1939年5月1日出版。

届青年节大会。

6 时整，随着鞭炮和号声，国旗和青年救国联合会的会旗缓缓地升上了旗杆，大会开始了。在大会主席讲话完毕以后，毛泽东健步走上主席台，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① 的著名讲演。在讲演中，毛泽东发展了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任务和前途，肯定了中国青年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五四”以来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青年运动指引了胜利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在讲演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指出了讲演的主题，是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问题。

毛泽东十分重视青年的政治方向问题，除了这次讲演全面系统地论述以外，还多次教导青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在这次讲演后的一个月，他在延安模范青年授奖大会的讲话中，又指出：“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模范青年是代表中国老百姓，要一生代表他们。……自己代表还不够，并且还要教训儿子，中国革命没有成功，要长期斗争，永远奋斗。”

青年运动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应该怎么办？毛泽东接着就非常具体而实际地讲了 6 个问题，概括地说就是：

（一）要正确地认识五四运动，坚持五四运动的革命的大方向。毛泽东充分肯定五四运动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指出：“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而蒋介石国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61—569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

党又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呢？当时他们害怕中国青年革命化，大肆叫喊说：“中国青年从五四以后走入歧途”，“国家未负青年，而青年负了国家”等等，要青年不要走五四运动的革命道路。

（二）要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为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而努力。在中国社会的状况下，究竟怎样革命？毛泽东向青年们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任务和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并要求青年为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而努力。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指针。中共党内一些“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主张，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把中国革命引错了方向，受到挫折和失败。中国青年运动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应该懂得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也就是要懂得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制定的总路线总任务，并为它的实现而努力。对青年运动来讲，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是首要任务，根本方向。毛泽东在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青年们的任务，可以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一般任务……这是中国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的人民之共同的任务，没有什么分别的。有分别的，是其特殊的任务。中国青年们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就是争取自身的特殊利益。”这里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一般任务，首先就是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它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包括青年在内的共同任务。它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青年的根本利益。青年运动必须把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青年的特殊任务（局部利益）放在服从地位。这样青年运动就能更好地与整个人民革命运动保持一致的政治方向。但是在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中，又必须注意解决青年的特殊利益和要求。这样，也才能更好地激发青年的积极性，使青年运动在整个

人民革命运动中起更大的作用。总之，正确地处理一般任务和特殊任务的关系，才能保持青年运动正确的政治方向。

（三）研究革命的经验教训，唤起全国的工农大众。毛泽东在讲演中着重讲了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教育青年不但“要懂得”，而且还“应该好生研究”。他回顾了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从辛亥革命开始，这几十年来民主革命的过程，分析了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还没有达到目的原因，“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根本的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他要求“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

懂得革命的经验教训，对青年有更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曾经指出，“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他强调青年必须亲自参加革命实践以取得直接经验，这是很重要的。不过在《实践论》中，他又说过，“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因此，还要学习“古人、外人的直接经验”，对我们来讲是间接经验。特别是革命的历史经验，是革命前辈和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青年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当然应该学习和懂得这些宝贵的革命经验，以便将那些有益的经验加以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避免重犯错误。青年也只有在接受历史和现实的革命经验中，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才能逐步地更好地成熟和成长起来。所以，懂得革命的经验教训，对青年成长来讲是必不可少的。

（四）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在整个人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作用。他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又指出，青年“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方面军。”但“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没有主力军，单靠方面军，“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只有方面军和主力军“结合在一块”，“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才能攻破敌人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最后堡垒。”毛泽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毛泽东关于方面军必须与主力军相结合，知识青年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一句话，青年运动必须同党领导的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思想，是对“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胜利发展的规律，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

（五）坚持抗日战争中党的根本政策，实行青年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毛泽东在讲演中强调要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根本政策，青年运动要实行统一和团结的必要性。青年统一战线是整个民族、整个人民统一战线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毛泽东历来

把青年的统一问题、团结问题，看成是全国人民统一和团结的重要方面，看成是战胜敌人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实现青年运动的统一和团结，不仅是青年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还是一个带方向性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中，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的根本政策，为了适应这个需要也必须建立广泛的青年抗日统一战线。也就是说，青年运动要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来实行统一和团结。可是，当时青年运动是不统一和团结的，国民党蒋介石破坏统一和团结。他们顽固地坚持限制共产党发展的方针和妄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抗日团体的反动政策，坚持以它所领导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控制全国青年运动。所以，毛泽东在讲演中，向延安青年们指出，“你们应该继续要求统一，因为统一才有力量。你们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抗日到底。”

（六）延安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它的方向就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什么延安青年运动是模范？毛泽东指出，“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主要表现在：

1. 大家团结。延安青年不论是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不管男的、女的、做工或务农的，大家都一条心，都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国家、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解放出来。

2. 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当时聚集在延安的青年，“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毛泽东认为。“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根本反对学生、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不但不提倡，还要压制。

3. 学习革命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当时在延安的青年有充分学习革命理论的自由，而在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就要冒着杀头和坐牢的危险。

4. 开展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当时延安青年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发成千上万亩的荒地，横扫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轻视劳动的旧思想。这是一场了不起的革命行动，毛泽东同志对此十分称赞。

毛泽东为延安青年运动总结的这几条，就是延安青年运动的经验。我们要坚持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方法，继承和发扬延安青年运动的革命精神，使青年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和发展。

最后毛泽东在结束自己讲演时，进一步表示他对中国青年的几点要求和希望：（1）希望青年研究中国革命经验，把好的发展起来，把错误的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团结起来，使中国革命由失败转变为胜利。（2）要求每个青年担负起把“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责任。毛泽东指出，“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3）号召每个青年“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团结全国青年，组织全国人民；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一定要变旧中国为新中国。

当年聚集在延安的青年，在听了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以后，心情十分激动，热烈鼓掌和欢呼口号，他们派出代表宣读给毛泽东的致敬信。信中写道：“毛泽东同志！我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用自己一切力量去实行您向我们青年所指示的任务。”同时，向毛泽东赠送了一面写着“新中国的火炬”的锦旗。在这个大会结束之后，立即举行野火晚会，演出文艺节目，直到深夜。

历史证明，延安的青年没有辜负毛泽东及其战友的期望，他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泽东的教导，坚持青年运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郑 洸）

对一二九运动的回顾和总结

——毛泽东等谈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基本经验

1935年的秋天，我国西北的天空格外晴朗，一片金光灿烂。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直罗镇一役“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西北。不久，即12月9日，北平学生首先爆发了抗日爱国运动，随即扩展到全国范围，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经历了19个月时间。这次运动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

(一)

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运动，在延安时期曾多次对它作出评价和总结。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的第二天，党中央在陕北听到消息。毛泽东就兴奋地说：“我们心中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

都是推动抗日战争。”^①

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又赞扬“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并且预见学生运动“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1937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在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都论述到一二九运动，他高度评价说一二九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并且对北方青年寄托殷切的期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年多，一二九运动4周年之际，延安青年隆重地举行了纪念活动。1939年12月9日这一天，上午延安各界青年召开“一二九”座谈会，由几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同志分别介绍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成都等地“一二九”前后学生运动的情况。晚上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纪念大会。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王明、王稼祥等出席了大会并讲话。毛泽东讲演的题目就是“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③。这个讲演评价了一二九运动的意义，精辟地总结了一二九运动的经验。一二九时期民先队总队长、这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组织和者之一的李昌回忆说，纪念大会我们都参加了。“毛主席的讲话深入浅出，很适合于当时的青年，讲得很生动，大家都很兴奋。主席讲完了以后，大家高呼口号，气氛很热烈。”

就在这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

①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50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③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编》第499—50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出版。

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阶级的地位论述了他们在一二九运动中的作用。

1940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地指出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1944年12月9日，延安青年举行了纪念一二九运动的大会，特邀请刘少奇到会讲演。刘少奇是党中央主管白区工作的领导人，1936年在华北直接领导学生运动，为一二九运动的健康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这次纪念大会上，刘少奇以《和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①为题，论述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基本经验。

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全面的军事进攻，党领导的国统区学生运动也蓬勃发展。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高度地评价了包括一二九运动在内的学生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说：“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二）

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环境下发生的？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毛泽东等作了正确的分析评价。

（一）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泽东认为一二九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新时期”。刘少奇分析说：“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来讲，‘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

^① 《中国青年》第53—54期，1950年12月出刊。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反动统治对中国人民实行了两种反革命“围剿”，这就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一方面，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 5 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后来红军长征了，他们在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之中。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他们靠武力镇压革命，辅之以绞杀一切进步思想和革命文化。共产党人、进步文化工作者和革命青年遭屠杀、遭监禁，进步报刊被迫停办。学校中施行反共教育，压制和禁锢革命思想，迫害进步教师和学生。“爱国有罪，抗日犯法”，全国被极其沉闷、阴郁的空气所笼罩。这是中国历史又一个极其黑暗的时期。

实践教育了人民，人民冲破了反革命黑暗统治的压迫，一二九伟大的革命风暴以其历史的必然结果爆发了。正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① 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就在于它冲破和结束了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黑暗统治时期，“在中国历史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702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

是一个划分革命开始重新前进阶段的标志。”

(二) 一二九运动为抗日战争作了动员和准备。

在历史上有些人认为，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伟大。毛泽东说这是不对的。“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然后他进一步分析说：“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他还指出：“要拿出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么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在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妥协下，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继而把魔爪伸进华北。1935年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任务。一二九运动对于实现共产党提出的任务，起着某种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是一二九青年首先传播到全国城乡广大民众中去的。红军斗争与全国抗日运动的汇合，是始于一二九运动才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的。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从1935年12月9日开始的中国革命的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至1937年2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时，告一段落。此阶段的重要事变，是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的救亡运动，红军的进入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工作……西安事变，最后是南京国民党三中全会。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中国和日本

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这一阶段的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一号召是基本实现了，这就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①毛泽东认为一二九运动正是“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三）一二九运动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造就和准备了大批干部。

毛泽东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一二九运动发生在中国革命伟大转变之中，必然担负起造就和培养干部的历史使命。

一二九青年在祖国危难的日子投袂而起，为民族解放而甘愿舍弃个人的私利，进行英勇的斗争，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二九青年在斗争实践中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踏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大家懂得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懂得了顽固派、投降派的阴险狠毒，懂得了民主宪政，而这些民主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他们从民族觉悟而激发起阶级觉悟，学会了一些斗争的本领，开始成长起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二九运动中开始成长起来的青年，怀着兴奋的心情，投入了为全民族解放的战斗。他们有的战斗在华北抗日前线，或参加八路军，或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有的到革命圣地延安，经过学习训练，或参加八路军，或参加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他们有的到南方去撒播革命火种，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总之，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到南方的“一二九”战士，最后都投身到抗日战争的烈火中，锻炼成长为抗日战争的骨干。正如刘少奇在1944年的评价：“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多数青年，现在大部分已经成为敌后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地方行政负责人以及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的指导者了。他们在今天保卫祖国的战争中，站在各方面很重要的岗位上，为他们在‘一二九’的愿望而进行着有效的斗争。相信他们不久的将来会以胜利者和主人的资格，回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骄傲地叫着‘中华民族独立万岁’的口号”。历史正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二九”战士，许多人后来成为了我们党、国家以及各个方面的重要领导人和骨干。一二九运动为造就和培养中国革命大批干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伟大的革命运动必然积累丰富的革命经验。毛泽东、刘少奇科学地总结一二九运动的经验，已经成为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一二九运动胜利发展的根本保证。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关系怎样呢？毛泽东十分肯定地说：“毫无疑问，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作用。没有共产党做骨干，

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1935年，正当人们对民族存亡忧心忡忡，日夜焦虑之时，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这个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不分阶级、党派，共同团结，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十项主张。《八一宣言》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希望，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伟大动力。党通过在巴黎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把《八一宣言》邮寄给国内各阶层人士。北平地下党在北平饭店的法文图书馆买到了刊有《八一宣言》的《救国时报》，他们如获至宝，立即采取各种方法使宣言直接与广大学生见面。清华大学的宣传栏上，有人悄悄贴出了《八一宣言》。师范大学的洗脸间，学生的脸盆里有人放着《八一宣言》。《八一宣言》的影响迅速在学生中传播开来，它不仅使学生们进一步认识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也从宣言中找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使为抗日救国冥思苦索的爱国青年看到了希望和方向。一二九运动就是在《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爆发的，《八一宣言》的主张又为一二九运动所广为传播。

第二，“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毛泽东提醒人们说：“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关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这个消息再一次给青年学生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使他们对抗日救国的前途有了确信的希望。毛泽东分析说道：“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第三，“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1935年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利用赈灾活动联系了一批进步学生，团结了广大同学，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当日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群情激怒之时，北平临委和学联党团因势利导，组织和领导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示威运动。随着斗争的推移，学生运动面临如何深入发展的问题，1936年1月党及时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引导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在斗争中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使之成为全国青年抗日救亡的一支骨干力量。当出现抬棺游行的冒险做法，给北平学生运动造成困境的时候，受党中央委托来天津领导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纠正和克服了“左”的偏差，转变了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在实际斗争中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学生内部，改学联为学生救国联合会，提出“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开展与抗日救亡相结合的各种学术和文艺活动，关心学生生活福利，团结了大多数同学，孤立了少数右派学生。在学生外部，改变“打倒宋哲元”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争取了二十九军官兵；提出“师生合作，共御外侮”的口号，争取了学校当局的同情和进步教师的支持。刘少奇总结说：“在当时反动统治的城市中保持这个新起的革命运动不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但它是保持下去了。这首先便是由于执行了一种谨慎的正确政策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又及时领导学联反对右倾投降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1937年1月，刘少奇写了《论左派》一文，及时教育年轻党员和民先队员，批驳了右倾投降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5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北平学联领导人黄敬、李昌等，对他们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回后方，从奋起拉回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的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的检查和克服。”党领导北方青年通过这场斗争，使他们提高了思想政治水平，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

毛泽东总结说，正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对此，毛泽东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

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有了党的正确领导，青年运动就蓬勃发展，青年就能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做出巨大贡献。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目标需要当今青年一代去实现，青年健康成长、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又需要党的正确领导。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时刻不脱离党的领导，一二九运动的这个光荣传统，也应该成为当今青年的坚定信念。

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必须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毛泽东、刘少奇总结的又一条主要经验。一二九时代的知识青年之所以对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是他们在祖国危亡的关头，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呼声，自觉地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担，掀起了民族自救的巨浪。同时，他们及时地到工农兵中去，到民间去，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抗日洪流。刘少奇赞誉地说：“‘一二九’运动中的革命学生所走过的这种道路，是一个模范。”

知识青年为什么必须同工农相结合？毛泽东总结一二九运动的经验，作了三方面的论述。

第一，“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在民主革命时期，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是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主要社会力量。知识青年只是革命的一个方面军，尽管它是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也必须同工农结合在一块，才有力量，才能实现革命的理想。一二九运动取得了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九一八”事变的学生运动则提供了反面的教训。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广大青年学生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请愿示威斗争，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出面应付，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但是这个斗争很快地就消沉下去了，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没有能坚持下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没有引导青年学生与工农大众相结合，造成了学生孤军奋战的局面。所以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刘少奇也总结说：“单纯的革命学生运动，是不能获得胜利的，而且也不可能在反动统治之下长期坚持。革命的青年学生必须与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

第二，知识青年有一个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他们一般地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但是由于其阶级的局限和学校教育、社会传统的影响，思想感情与工农群众有一定的差距，客观上存在着世界观的转变过程。要完成这个世界观的转变，就必须同工农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毛泽东说：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

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一二九时期南下宣传团的青年学生，多数人从来没到过农村，不了解民众的痛苦，不懂得阶级压迫，对民众抱着怀疑、轻视的心理。他们下乡以后，过着完全不同于城市的生活，环境的艰苦、农民悲惨的遭遇和血泪控诉，震撼了每一个宣传队员的心，冲击着他们的灵魂。有的学生说：“以前对农民抱着怀疑、轻视的心理，以为他们愚笨，到农村去了，才懂得了农民。他们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经济侵略，然而他们受到实际生活的痛苦，生存上致命的迫害。他们所需要解决的不是空洞的爱国，而是切实的土地问题、捐税问题等。”有的同学体会到“民众并不是没有觉醒，只是当局压迫着掩盖着罢了。”一位宣传队员回忆说道：“老实说，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完全起源于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而是同时萌生于那些硬邦邦的、充斥跳蚤和虱子的被窝里。”正是同广大工农相结合，一二九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才完成了由民族觉悟到阶级觉悟、由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

第三，工农革命需要知识青年。结合不是单方面的需要，知识青年需要工农大众，工农大众也需要知识青年。毛泽东说：“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知识青年受过文化科学知识教育，思想敏锐，容易接受和传播新的革命思想，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深恶痛绝，富有历史责任感。另一方面，在反动统治压迫剥削下，工农群众陷于愚昧无知状态，需要把他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把工农群众看作火药桶，而把革命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看成火星，火星一旦同火药桶接触，被粉碎的将是他们的统治地位。工农群

众十分渴望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把它看成是争取解放不可缺少的武器。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工农群众欢迎愿意同他们结合的知识分子，需要知识分子给他们传播革命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这也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历史前进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工农群众仍然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仍然必须坚持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虽然这种结合的性质、内容、途径和方法都不同于一二九时代了，但是一二九的这个革命传统和经验仍然需要发扬光大。江泽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地提出：“我们也诚恳地希望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同社会实践相结合，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不断从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中汲取营养，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罗成全）

转变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

1940年6月3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国民党政府愈来愈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极端压迫学生运动的卑劣行径，及时地作出了《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提出了对国民党统治区学生工作实行根本转变的方针和原则，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得以摆脱艰险处境，渡过了难关，积累了斗争经验，保存和逐步壮大了革命力量，从而奠定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

（一）

自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国民党就更进一步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特别是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文件之后，国民党统治区（当时主要是指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等地而说）从各方面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一切抗日组织和进步团体都遭到猖狂的迫害，而首当其冲的则是爱国

学生和抗日青年。国民党政府不但解散中共领导的民先队和全国学联，而且在各大学、专科学校、中学普遍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采用威胁、欺骗和引诱等办法发展团员，甚至利用集训，强迫学生集体加入，还让一大批国民党特务、三青团骨干进入各级学校学习，夺取校内的学生会、系会、级会的领导权。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修改课程教材，加重学生课程负担，实行会考、总考等制度，迫使学生不能去搞社会活动。同时，封闭进步书店和报馆，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报；普遍推行“军训”和“训导”制度，设专门机构和人员对学生思想进行控制和“督导”。还以“防奸”为名，任意检查学生信件，不许学生会客和随便出校门，对学生思想、言行进行全面控制。有的爱国学生被特务盯梢、追捕、绑架，甚至下狱和杀害。

在这种政治环境极为恶化，三青团大发展（1939年底8.9664万人，1940年为25.9147万人），从组织上加强对学生运动的控制的情况下，学生中虽然对这种社会状况不满和苦闷，但由于国民党反共政策的结果，使他们不少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都发生了极大的不安，而这时共产党和进步学生组织，由于抗战初期过于突出和暴露，当反共逆流一到来；许多党员和负责人便不能立足，迫不得已进行隐蔽疏散或调离，使党员数量减少，质量也下降。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工作，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二）

为了适应国民党统治区形势变化的要求，更好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工作必须实行转变，并在1940年6月3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了

《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①在这个“决定”中，明确地提出了“我们今后在国民党区学生运动的根本方针，应是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这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在这之前，4月22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工作的指示中，就已指出，“湖南党所处的政治环境，必然是现在情况的延续或是向更坏的方向逆转，这样就规定了湖南党的工作总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你们无论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应按照这一方针来一个彻底转变。”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当时对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提出的这个根本方针，是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总方针，在学生运动中的具体体现和落实，是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在组织上和工作上实现彻底转变的正确指针。

为了贯彻这个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的根本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工作的中心应由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转为校内学生工作；各重要的大、中学及地方教育界有地位的学校，应设法建立短小精悍的支部”，并要求在工作中遵守八条原则：

1. 党员应首先注意功课、操行。开会不可每月超过两次，环境恶劣时少开或在一个时期内停开。参加群众组织不可超过一种。加强党员对马列主义学习，但以有领导的个别进行为主。暴露的党员应离校，或停止小组生活，暂时不活动。支部组织不应超过十人；学生在党员多的学校，设平行支部；但必须注意在各年级学生中发展，使每学期能保持有党的支部。

2. 争取大多数的同学，应以思想的启发为主，其有效方法，是提倡尊重人格，研究学术，暴露社会黑暗。介绍文艺作品和不

^①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519—52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出版。

违禁的较进步刊物。但并不放弃适当的共产主义教育。可能时，可组织学术性、生活性、友谊性的团体。

3. 团结积极群众，应指定支干会以外的少数党员与他们个别联系，或形成无定形组织，若组小团体则应防止突出。

4. 关于学生合法团体如同学会、系会、级会、同乡会、青年会、音乐会、球队等，应以环境可能的程度进行组织，多注意学生福利事业及民主作风。这类团体一般不要与学校当局对立，可能时进行各种校外合法活动。

5. 应接近教员，争取好教员对我们的同情，麻痹坏教员对我们的敌视。

6. 经过一定积极分子，参加与领导学生群众的斗争，但不可制造斗争，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斗争中须向高级当局及各种报纸杂志揭露真相，并须注意适时的结束之。在斗争中绝对避免支部及支部负责人的暴露，支部及支部负责人应站在暗中推动、旁边赞助的地位，他们应深深地埋藏在学生群众中间。

7. 毕业出路，党员升学应尽量升入地位高、人数多或出路便于接近群众的学校和院系；就业时应尽量选择教育、实业、行政等机关，并应继续联络校友，参加与组织毕业同学会，扩展我在社会各部门、各阶层的影响和工作。

8. 领导学校支部的各县、区青委，应由详细观察过的并熟悉学校情况的干部组织之，并尽可能入校读书，已暴露的青年干部坚决撤退。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这个“决定”，详细规定了国民党统治区学生工作的根本方针、工作中心和应遵循的原则，特别是提出的八条原则，从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和方法、斗争目的与策略、组织生活与活动、领导系统等，都作了全面周到的部署

和安排，使国民党统治区学生工作，能迅速有效地从组织上工作上实行转变。

(三)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后，接着12月1日以陈云为首的中共中央青委，又发出了《关于国民党区域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①，进一步指出，“根据中央历次指示，今天国民党区域青年工作基本任务，一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一是开展统一战线，扩大政治影响。”并强调“其统一的中心一环，就是党员必须加强社会活动，取得社会地位。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党的力量不受损失，并使挽救时局的努力，得以尽量实现。”就是在这个“指示”中，对学校学生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提出一些具体要求：

首先，在统一战线对象方面，强调的对象有学校当局，包括最大多数的校长教职员；教育、文化界名流与学生家长；各种青年的合法社团，包括青年会、女青年会、学术团体、同乡与同学会；国民党、三青团机关的下级干部和团员等。

其次，在统一战线工作方法方面，指出统战工作的中心，在于广交朋友。要求在学校中的党员及同情分子，尤须注意与国民党、三青团及学校当局交朋友，鼓励其做好人、干好事、走好路。强调必须自己有使人钦佩与亲近的长处；必须重视社会关系与自己的社会地位，纠正孤独清高，轻弃自己社会地位的错误。要求在交朋友过程中，绝对不得暴露自己的政治关系，应以有爱国心、

^①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文件选编》第534—53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出版。

道德心、求知心及同情三民主义、热心学校、社会公益、忠于私人友谊的公正人士的面目出现；对朋友的说服批评，必须注意有一定分寸和适当方式，对于对方正确的批评应虚心诚恳接受，以求保持友谊。

(四)

贯彻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青委的决定和指示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工作有了明显转变和取得新的进展。

1. 工作从校外抗日救亡工作，转为校内学生工作，以校内为主，校外为辅。

2. 党员学生以功课、读书和取得社会地位为主，社会活动为次。

3. 克服孤傲作风，注意广交朋友，团结和联系群众。

4. 从政治活动转向学术性、福利性的活动，并适当地使政治活动与学术性、福利性活动相结合。

5. 转变了不善于搞合法斗争的作风，积极参加国民党一些公开合法的青年团体，并以合法团体的资格和面貌出现，去接近青年群众。

6. 在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的关系上，提出了宣传教育重于组织的原则。在宣传教育内容上，注意了从启发青年考虑人生意义，以确立正确的人生观着手，引导青年追求真理，独立思考；从为谋青年生活的改善与切身问题的解决上着手，而联系到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从帮助青年树立自尊心、自爱心着手，培育青年的良好人格与远大理想。

7. 坚持一切以不暴露、能立足为准则，坚决实行了疏散、隐蔽与撤退已暴露的分子，简化领导关系，避免了敌人的破坏和突

然袭击。

总之，在实行一系列转变之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工作，已由过去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向了隐蔽的分散的小型的活动，工作更深入了，联系群众也更密切，既巩固了组织，保存了骨干，又争取了群众，为后来学生运动的高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郑 洸）

青年运动根本经验的科学总结

——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

1941年6月4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简称“六四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为青年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

自从共青团实行改造以来，青年运动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根据地的广大青年，为坚持抗战、巩固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青年救国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团结各阶层青年抗日，起了很好的作用。

青救会通过青年俱乐部等适合青年特点的形式，向青年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动员和教育训练。组织读报，学习时事，分析抗战形势；配合党的任务，编演各种文艺节目；讲授军事知识和作战常识等。青年俱乐部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成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进行抗战动员和教育的良好阵地。

青救会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武装，组织青年参加各项抗日的支

前工作。除了动员青年积极参加抗日军队之外，还组织青年积极分子参加坚持生产的半军事性的自卫武装——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从1938年到1940年，各根据地都先后建立了青抗先。冀中有10.5万青年参加青抗先。北岳区青救会在村、乡、县的青年班、排、连、营普遍建立的基础上，组建起1600多人的青年支队。山东成立了青抗先的省级临时总队部。青年还积极支前，拥军优抗。1940年4月统计，山东全省青年为部队募捐法币21210元，鸡蛋11.64万个，鞋26820双，有力地支援了前线。鲁西青救会把星期天作为优待抗属的日子，青救会员为抗属代耕、拾柴、担水、洗衣缝补。

青救会协助边区政府开展国民教育和群众文化活动，提高广大青少年的政治和文化水平。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校，从1938年的773所、学生16725人，到1940年增加为1341所、学生43625人。1937年办冬学600处，学生1万余人。1938年识字组已达5834个，组员39983人。

青救会发动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根据地的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青救会员带动家庭，成立变工队、互助组和开荒队，积极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和技能，推动农林牧副业的发展。不少青年被评选为劳动模范。在政权建设上，青救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晋察冀边区1939年，村级干部中90%是工农青年，县级的青年干部有360名左右。

青救会在抗战的前几年所取得的成绩是大的，受到了党和民主政府的欢迎。但是1941年上半年前的1年多时间里，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地方的青救会，曾经出现了脱离党的中心工作和脱离群众的青年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

第一，离开党的中心任务，忽视当时整个斗争的需要和全体

人民的共同要求，片面地强调青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要求，孤立地去解决青年的特殊问题。1939年到1941年，日本侵略军和汉奸伪军疯狂地对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据地人民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面临这种困难的形势，根据地的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坚持抗日，巩固抗日根据地。为此党实行了减租减息、大生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青救会本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更好地把广大青年动员起来，对付敌人和天灾，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可是，当时一些地方的青救会却脱离抗日、生产等中心任务，孤立地去搞青年的组织生活、文化教育、娱乐和体育活动。他们号召建立所谓“民主的青年的活跃的青救会”。有的派工作组下乡，去推动青年工作，硬把正在地里干活的青年，拉出来上操、唱歌、做游戏。

有的地方的青救会提出“保护青年特殊利益，反对家庭压迫”的口号，发动青年向自己家庭进行反封建斗争，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反对公婆打骂。结果造成农村斗争方向的混乱，青年与成老年之间的对立，干扰了抗日这个斗争的主要锋芒。

第二，片面地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孤立地组织青年的独立活动。一些地方的青救会提出，要搞一个“独立自主的全体全面的青年运动”。他们不顾当时当地的条件，单独把青年集中起来，搞青年农场、青年变工队、青年食堂、青年运输站、青年商店等等，公开向党要求尊重这种所谓的“青年运动独立性”。这些地方的青救会处处想把青年突出起来，就产生了与有关部门和组织协调不够的情况。对上同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对左邻右舍如工会、妇联、武委会、文救会等组织，发生矛盾和摩擦，争会员、争成绩、争领导权。

鉴于敌后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鉴于抗战以来青年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了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以便团结最广大的各阶层青年，坚持抗战，并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讨论了青年工作问题。

1941年6月1日，中央青委拟定了《关于党在青年中的工作》^①的材料，提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材料就中国青年在革命和抗战中的作用，中国青年运动20年来的经验，目前阶段中国青年运动的状况、性质、任务、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以及如何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等问题，提出了看法和意见。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作出《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发给各根据地贯彻执行。

二

《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有着丰富和深刻的内容。

（一）目前阶段党在青年运动中的总任务和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

决议在充分肯定抗战以来青年运动的成績的基础上，明确地指出：“党在青年运动中的总任务现在仍然是团结整个青年一代，不但应组织全体工农青年，还应积极争取地主、富农、资本家的青年，仅仅打击与孤立那些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与反共分子。”明确党在青年运动中的总任务，青年工作者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青年运动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和斗争的目标。这时尽管国

^① 见《中国青年运动文献》（二），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编。

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连续发动反共高潮，但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民族矛盾，日寇仍然是全中国人民的大敌。况且日寇大举扫荡敌后根据地，敌后人民异常困难，因此党的方针仍然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只有这样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这个方针落实到青年运动则是团结整个青年一代，为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英勇斗争。

组织形式是为斗争任务服务的。决议进一步指出：“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应与此任务相适合，而青救会就是适合于团结各阶级青年的主要的组织形式。”党中央鉴于内战时期“青年团变成第二党”的历史教训，断然否定了中央青委提出“在根据地内建立先进的骨干的青年团体”的意见。决议说：“在今天抗日时期，如又建立新的青年基干组织，又将发生脱离广大群众、变成狭隘组织的危险，故关于这类提议是决然不能采用的。因此今天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根据统一战线方针，继续发展与充实青救会的组织与工作”。

党中央在肯定青救会仍然是根据地青年组织的总形式的前提下，提出“其个别形式除已有者外，还可组织其他团体”，还应继续发展和充实青年抗日先锋队这样的青年半武装性的组织。为了团结那些希望入党但还不够资格的青年积极分子以及其他共产主义青年同情分子，党中央还提出可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并成为青救会的团体会员。决议强调“对于这部分人的积极性是应该加以重视和实行组织起来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党中央的这个意见各根据地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样的青年组织并没有发展起来，其经验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党中央对党内的青年工作领导机构也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明确地规定了青委的任务和工作职责；决定区

党委的青委只在名义上保存，其工作人员全部加入青救会领导机关工作；决定地委、县委不再设立青委机构，以便减少领导层次，保证党组织直接领导青年组织，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

（二）党的统一领导和青年组织应有的独立性。

决议指出：“党对青年群众运动，应该尊重其独立性，绝对不能以党的命令去强制青年团体执行，而只能依靠在青年团体中工作的党员进行解释说服工作，取得其同意，然后执行。”为什么党委要尊重青年组织的独立性呢？这是因为青救会这样的组织在抗日根据地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它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它的工作方式和活动内容都需要具有青年的特点，它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如果没有组织上的独立性，也就丧失了它存在的价值。党组织尊重青年团体的独立性，就能够使青年团体更充分地发挥它的组织作用，更广泛地团结青年群众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从而也就加强了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反之，如果忽视青年团体应有的独立性，在实际工作中就会造成青年团体没有自身的特点，事事按照党委的模式做，脱离青年群众，组织形同虚设，从而也就不利于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所以党中央决议要求个别地方党委或党员中忽视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和青年组织的独立性的现象，“如尚未纠正，应即纠正。”

青年团体的独立性，是在执行党的总方针和总任务的前提下，开展适合于青年特点的独立的工作和活动，以便充分发挥组织作用，从青年的实际出发，更好地调动青年的积极性，完成党的中心任务，从而切实地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所以党中央决议同时指出，青年团体的这种独立性，“决不是做青年工作的党员的独立性；对一切做青年工作的党员，应该坚持党的统一。党的青委，只是党内工作的分工，其一切活动，应该统一于党委领导之下。”因为

只有服从党的统一领导，青年运动才能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有关部门和团体协调一致地工作，取得较好的社会保障，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信赖和威望。所以党中央也提出要求，“个别做青运工作的党员，在党内强调青委的独立性而不注意党的统一性，也应加以纠正。”

（三）青年运动的一般任务和特殊任务。

1938年7月，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中讲道，中国青年们的任务，可以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两个方面。一般任务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就是党的总任务；特殊任务是争取青年自身的利益，满足青年的特殊要求的任务。应当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呢？

党中央的这个决议指出：“在执行一般任务（抗日、民主、生产等）与青年特殊任务（教育、学习、婚姻、娱乐、改善生活等）时，应善为调节，不可偏废。”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善为调节，不可偏废”，首先就是青年运动必须为着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而奋斗。这是因为，党在各个阶段的总任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抗日战争时期，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中国青年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的一切都谈不到，中国青年的特殊要求也不可能解决。所以，决议提出：“要教导青年，只有在执行一般任务中起模范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青年自己的特殊任务”，这就是说，青年只有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青年的特殊任务才能随之得到解决。

这个时期一些地方的青救会组织，不顾党的总任务的要求，脱

离全民的共同任务，片面强调青年的特殊性，把青年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同整个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对立起来，把青年工作同党的中心工作对立起来，把青年组织同其他组织对立起来，形成同党闹独立性的青年主义倾向。其结果是既不利于全民共同任务的完成，也不能解决青年本身的特殊利益和特殊要求。所以青年运动在处理一般任务和特殊任务的关系时，首先要为着全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围绕、服务、服从于党的总路线总任务而开展青年工作。

青年运动要同全民运动相结合，青年要在同成老年一道干革命中发挥模范作用。党中央根据这个期间青年运动的教训在决议中指出：“应该引导青年的积极性及好胜心理向着青年起模范作用的方面去，而不是引导到过于突出甚至和成年、老年相隔离相对立的方面去。个别地方所犯的先锋主义的错误，应该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

“善为调节，不可偏废”，就是还必须在实现全民共同任务中，协助党关心青年的特殊利益，注意解决青年的特殊要求。决议指出，“只有为青年解决了他们的特殊要求，才能动员一切青年群众更好的执行一般任务。”因为在实现全民的共同任务中，青年组织如果关心青年特殊利益，那么青年就将从中感受到党和整个社会的温暖，也将体验到全民共同任务的完成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从而大大地激发青年的革命积极性，促进全民共同任务的完成。相反，如果青年的特殊利益和要求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正确的引导的时候，青年不但不能成为社会的积极力量，反而会成为社会的消极因素，从而也不利于全民共同任务的完成。所以在动员组织青年完成一般任务的时候，也要关心青年的特殊利益，注意解决他们的特殊要求。

总之，决议提出的“善为调节，不可偏废”的思想，就是要兼顾一般任务和特殊任务的两个方面，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在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时，青年运动首先应该把一般任务置于优先地位，服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不能以特殊任务去冲击、干扰共同任务的完成。要教育青年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同时，在服从整个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党和青年组织又要十分注意关心青年的特殊利益，尽可能地满足青年的合理要求。防止两种可能发生的偏向：一是脱离人民的整体利益片面强调青年的特殊利益和要求；一是漠视青年的特殊要求，不关心青年的实际利益，所以决议强调地指出：“各地如有偏废现象，应即加以纠正。”

（四）党中央分析了一些地方产生青年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部分青年工作干部的城市工作作风。在抗日战争中，广大的城市知识青年转入军队中与农村中，和工农士兵密切结合起来，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一部分人并不认识农村与战争的特点，和工农群众结合得不密切，保存着城市作风，浮在上面，表现苦闷与脱节。这种现象在一部分青年工作干部中也是存在的。这时青救会里搞青年工作的，有一部分就是曾经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学生运动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们比较了解知识青年，对城市工作比较熟悉。到了根据地以后，他们把城市工作的一套搬到农村中来，不顾农村小农经济的特点和战争环境，把青年农民和青年学生一样看待，不了解青年农民的特点和要求，结果就出现了那种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偏向。所以党中央决议提出：“党应转变这些党员的观点，使他们了解实际，眼睛向下，联系群众，以达发展广大群众的青年运动之目的。”

党中央“六四决议”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个决

议总结了抗日战争时期青年运动和内战时期共青团组织的经验教训，为抗日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党中央决议下发以后，一些地方发生的青年主义倾向逐步得到了纠正，党和人民更加重视青年运动的发展，青年运动也注意了同全民运动相结合。

党中央决议中，关于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关于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应与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合、关于正确处理党的统一领导与青年组织应有的独立性的关系、关于正确处理青年运动与全民运动的关系、关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作风等思想，对于今天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罗成全）

在重建青年团的日子

——毛泽东等亲自领导建团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美国政府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又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进入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时期。解决这个矛盾，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延安窑洞里，继续日夜操劳的头等大事。在新的形势下，为着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生产文化建设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需要中国青年有组织有领导地发挥作用，需要一个以青年积极分子组织为核心的青年运动来支持和配合这些斗争，于是毛泽东及其战友，为青年团的重建而呕心沥血。

任弼时的倡导

1946年5月的延安，阳光分外明媚。中央青委和山东解放区的青年工作干部，奉命到枣园去，向任弼时汇报青年工作。

任弼时，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五大领袖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早期领导人，现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书记处日常工作，

并分管中央青委工作。

任弼时在枣园的住处是山脚下一排青灰色的窑洞。汇报就在这里进行。在汇报中谈到，目前不少解放区青年组织涣散，青年工作自流，中央青委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工作，为此而犯愁。任弼时默默地细听着、思考着。最后，他以商量的口气提出：你们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搞青年团。过去在党的七大时，文彬（即冯文彬，中央青委副书记）他们曾经提议要重新建立青年团。那时，中央没有同意。现在你们可以再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建立青年团。^①

任弼时的这一倡议，象一盏明灯，使中央青委的同志眼前豁然开朗。连日来，在中央青委的窑洞里，他们和山东、陕甘宁解放区的青年工作干部，围绕着要不要重新建团、建什么样的团等问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每讨论几天，就向任弼时汇报一次。经过一个多月时间，边讨论，边调查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在解放区建立一个新式的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6月25日，中央青委拟写的《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草案》，报送给了中央书记处，这个建议草案是任弼时倡议的结果。它有着丰富的历史借鉴，又立足于现实的客观实际，为未来的青年团的建立描绘了一个基本轮廓。

朱德说组织青年团是革命的基础

——党中央八月会议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集团完全撕开假和平的面纱，悍然

^① 《青年团的初建》第1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

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并且声言，只须三个月到六个月，他就可以取得胜利。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异常繁忙，要部署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要领导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和生产建设。然而，中央领导人并没有让重建青年团的航船搁浅。

8月26日，中共中央讨论建团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举行了。在延安枣园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议事的小礼堂里，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朱德、任弼时，政治局委员康生，刚调到中央工作的中央委员饶漱石，在书记处负重要责任的胡乔木和任弼时的秘书王发武，以及中央青委、山东、陕甘宁的青年工作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

任弼时主持会议，把是否重建青年团的问题，正式提交会议讨论。青委同志汇报以后，朱德首先讲话。他操着四川乡音，一字一板地讲道：我看可以组织青年团。党要领导政府，领导军队，领导各群众组织。今天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方面分工，要分工合作嘛！所以青年要组织。现在需要青年组织，以后还要青年组织，就是到了社会主义也少不了青年组织。组织青年团，也可以说是革命的基础。接着他分析说，过去的青救会，是每个青年参加，这就不能充分起作用。要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建立起青年积极分子组织，那个力量就大了。

关于青年团的任务，朱德说，青年团的经常工作内容，主要是教育，是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培育出新民主主义的人。对青年的教育，除了学校以外，就是实际行动教育。他还说，青年团的工作，要使青年得到利益，要使青年不断进步。青年团的工作方法，不能千篇一律，不能到处一般模样。要是青年团组织青年参加生产劳动，参加土地改革，参加军队打仗，这样一来，政府、

军队各个方面就高兴，青年也得到进步，受到教育。

朱德是第一个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正式发言赞成重新建立青年团的老革命家，一字一句充满了对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深情。他深刻的思想给与会者以启迪和鼓舞。

朱德发言后，会议讨论气氛热烈，不仅讨论到建团的必要性重要性，还涉及到青年团的名称、性质、任务、工作方法以及青年干部等问题。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解放区有了党，有了政权，是否可以不要青年组织了。说这几年没有青年团，党也没有垮台。有了青年团组织，反而是个麻烦，搞不好闹乱子，还要花钱。与会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说，实际上正好相反，党有了政权以后，群众团体更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党有了政权，就是说成了执政党，容易发生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和官僚主义作风。有了群众组织，就可以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行政上自上而下的推行，和群众团体从下层出发，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去干，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建立青年团，是党通过团去发动青年群众，以便使党的工作从下面去做。

会议开了一整天，任弼时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满怀喜悦的心情说：“看来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同意建立青年团组织。”接着他从历史纵深处开掘，他说：“抗日战争初期，解放区在党的领导下，普遍地建立了青年救国会的组织，大部分青年在抗日战争中是积极的，而且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一般地说，青救会组织是松懈的。”“在抗日战争初期，很多地区还没有党的基层组织，也没有建立政权，那时农会这个组织可以代替一切。有了党组织和政权以后，农会、青救会应转变工作方式，青年组织应适合青年要求和特点，但有些地区未跟上，因而感到工作方向摸不着了。有的解放区，青年组织单搞一套，闹独立性，遇到反对，由此也就

消沉下去了。”

接着他又从现时情况分析，当时全国解放区共有1亿人口，其中有青年2000万人。他说：“现在，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400万左右的青年积极分子，能够吸收入党的是少数，仅四五十万，今后再发展一批，也不过百八十八万人，另外还有300余万青年积极分子，是组织起来建立青年团好，还是不去组织？看来还是组织起来好。组织起来既便于教育提高他们，发挥积极性，又可以通过他们去提高广大一般青年的积极性。我们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还要在战后各项建设中教育他们，提高他们，通过他们去带动广大青年。现在就应该这样去做。”

任弼时进一步总结分析历史经验，他说，过去青年工作“所以会犯先锋主义第二党作风的错误，主要是因为未去研究青年的特点，未去研究适合青年的一套方法。这是个基本问题。”接着他提醒大家说：“今后，这还是基本问题，如不认真改进，还可能重犯以前的错误。现在党的领导强了，青年团不容易犯第二党作风的错误，但如果不预防，也会闹成与党不和。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如果不研究青年的特点，不采用适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发展，就没有前途。”这是多么精辟的分析啊！深邃的思想至今闪烁着光辉。

关于团的基本任务和名称，任弼时说：“按实质，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目前，就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因此，名称可以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如再扩大一点，防止其成为狭隘组织，也可以叫民主青年团。名称问题以后还可以再讨论。实质上是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

关于团的性质，任弼时说：“团的性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在团内要进行些共产主义教育。”“现

在要建的青年团，应当比过去的共青团更广泛些，要包括民主青年，只要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都可以参加；入团后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关于一般青年群众组织，任弼时说：“在团组织之外还需要有各种各样广泛的青年组织。”“青年团要在各种广泛的青年组织中起先锋作用。”

如何开始建立团组织？任弼时说：“先搞一套空架子的办法不好。可以采取示范的办法，先从工作基础好的地区做起，在基层党支部内，划出一部分青年党员，发展团员，即可开始成立团支部，靠党支部去领导。基本上采取由下而上地建立组织，但上面要有一定数量的领导骨干。”“建团的试点工作，现在就开始去做。”^①

这次讨论建团的中央会议，预示着青年团作为一个新的生命正在孕育着。

毛泽东说搞青年团是好的

——党中央九月会议

仅仅过去了半个月的光景，9月13日，任弼时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规模更大，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外，当时在延安的所有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被邀请来了。有参加第一次会议的朱德、任弼时、康生、饶漱石、胡乔木以及王发武，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中央委员陆定一（中宣部部长）、徐特立（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

^① 《任弼时选集》第402—40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中宣部副部长)、蔡畅(中央妇委书记)、习仲勋(西北局书记)、马明方(西北局副书记)、黄敬、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安子文,中央职工委员会负责人刘宁一、李颀伯,还有中央青委、山东、陕甘宁的青年工作干部。在枣园书记处的小会议室里,他们聚集一堂,气氛亲切而热烈。

任弼时宣布开会,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任弼时说:“书记处召开过一次座谈会,大家是赞成建立青年团的。也问过毛主席,他说,搞青年团是好的,可以征求一下各解放区的意见。现在起草了一份电稿,请大家讨论。”^①

这次会议大家又从不同角度充分地阐发了自己的见解,讨论比第一次会议更加深入。会上开始有个别同志担心,在解放区已经有了党组织、有了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如果再建青年团,“组织太多,问题就多了。”也有的同志认为,“要搞青年团,可以在解放区的城市搞。在农村搞青年团,不会有多大作用”。

大家尊敬的已69岁高龄的徐老(特立)就此精辟地分析道:青年是否要一个青年自己的特殊组织,首先要看青年有没有特殊性。青年有学习问题、有工作问题、职业问题、有婚姻问题以及童工问题等。这些都是青年在社会中的特殊问题。青年既有同一般人一样的问题,又有他们特殊的问题。既然有其特殊性,青年团这个特殊组织就一定是需要的。

林老(伯渠)是四位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他用庄重而宏亮的声音讲道“现在再把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青年团,是有这个必要了。有组织就好办事。青年也需要有个组织,推动起工作来,就会便当些。这个组织,还是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好

^① 《任弼时选集》第40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些。这个名称，旗帜鲜明。青年团要在青年中起核心作用，要讲新民主主义一套。接着，林老对于军队里是否建团提出意见说：军队里并不妨碍搞青年团。军队也有一批青年，搞起团来，也有味道。从来军队里是不反对青年团这个组织的。

还有些同志说，农村要不要搞青年团，要从解放区的新任务方面来考虑，现在解放区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展起来，有了新的土地革命。今天的重要任务是打蒋介石，搞土地改革。青年人已经带头转到这方面来了。同时，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区扩大了。可以设想，在东北解放区，会比其他地区青年工作的作用更大。还有在8年抗日战争中，涌现出大批青年先进分子，要承认这个事实。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些先进分子感到对于他们的领导不够，感到青救会这样的广泛青年组织，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要求入党，又不能全部吸收他们。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是，抗日战争胜利了，青年运动的方向是什么，采取什么组织形式，青年工作者感到没有办法了，情绪也不是很高，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研究这些新问题。要建立青年积极分子组织，不是青救会那样的组织，而是政治性的组织，如同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比它要较为广泛。

朱德在会上强调说，搞青年团，这是一个教育后代的大问题。要做好培养后代的工作，没有青年组织，不建立青年团不成。前几年，有些地方取消了青年组织，是有损失的。现在要党的组织来领导建立青年团，就不会搞成第二党。

任弼时总结说：“大家都同意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建立青年团组织。”“决定建立青年团这个组织还是较为容易的，比较困难的是如何去开展工作。”“今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农村如何建立青年团，如何进行活动。比如在解决土地问题，进行

农业生产方面，青年团工作如何作法？过去犯错误，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创造出一套适合青年特点的办法。我们要从工作方针到方法，创造出一套来”。“在农村建立青年团组织，一定要根据农村的需要。”“因此，先作典型试验是很必要的，以便取得经验，青委的同志……可以派人先在延安试验建团”。“过去建立青救会，是个不可免的历史过程。青救会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它的消沉是青年工作发展的结果。现在是到了决定建立青年团的时候了。”

任弼时最后说：“会后先把文电发下去，征求各地的意见，请各地认真总结青年工作的经验，开始进行建团的试验，并把意见提出来，再请中央作决定。”^①

这就是结论，这就是46年前，任弼时代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枣园会议上作出的试建青年团的决定。

党中央发出建团提议， 各地开始试建

延安，这个革命的摇篮，也是青年团的摇篮。根据中共中央建团会议精神，中央青委首先在延安开展了青年团的试建工作，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最早的工厂、农村、学校基层组织。从1946年10月到12月，丰足火柴厂“青年先锋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冯庄支部、行知中学毛泽东青年团先后诞生了。这些组织，名称并不统一，也没有统一的团纲团章，但都是青年团性质的组织，重建青年团的航船，正是从这里启航。党中央、任弼时为青年团的航船，扬起了风帆。

^① 《任弼时选集》第406—40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试建团的实践说明，不论是城镇的工厂、学校，还是远离城镇的农村，建团和不建团大不一样。凡是建团的地方，青年工作很快就打破了青救会后期的涣散的沉闷状态，青年们学习进步，互相教育，积极性空前提高。他们在自卫战争、生产建设、文化活动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团的组织，受到青年们的拥戴，得到成年人的赞赏，说青年团引导他们的子女“走正路”。党和政府多次表扬他们。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称赞冯庄团员“很勇敢”。有的领导同志说，哪里有团员，哪里的事情就好办了。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延安试建团的事实证明，建立青年团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从而也进一步坚定了党中央的建团决心。

中央决定试建青年团后，任弼时十分重视这一工作的开展。他一方面具体指导中央青委干部直接参加的各个试点上的工作；一方面亲自主持拟写中央关于试建青年团的电文。1946年11月5日，这个电文以《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①，发至了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文概括了中央八、九月两次会议研究的意见，扼要地阐明了建立青年团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规定了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提出如何建团的工作步骤和工作方法。

这个电文的标题用的是《提议》，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建团问题的慎重态度。《提议》是任弼时的心血结晶，也是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建团的第一声号令。它使青年团的试建工作，在解放区由点到面普遍开展起来。

这时的解放区，正处在炮火连天的自卫战争和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青年团新的生命，就在这火热的阶级斗争中顽强地萌

^①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63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生、成长。陕甘宁边区，1946年12月7日召开中共西北局常委会，讨论中央建团提议，决定扩大建团试点，并将青年团工作更密切地与军事行动及土地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到1947年5月，延安、绥德、米脂、清涧、吴堡、佳县、子洲等县逐步发展，形成了试建青年团的7个“据点县”。山东解放区，在打退国民党80万军队重点进攻的激烈战争中建立了青年团组织，1946年11月，首先在莒南县开辟试建团的工作，到1947年底，全区团员发展到5万多人。晋绥边区，1946年11月，首先在兴县第一完小试建团组织。1947年2月，中共晋绥分局发出《关于建立青年团的意见》，试建工作在全区普遍展开。晋察冀、晋冀鲁豫和东北等解放区也都在中央建团提议后，先后开展了试建团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刘少奇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建团

——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刘少奇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进入晋察冀解放区，主持中央委托的工作。这年夏天，党中央领导解放区军民，粉碎了蒋介石军队对延安和山东的重点进攻，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的大棚里，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土地改革和整党问题。这是党的历史上著名的重要会议。中共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在会上专题

讲了建立青年团问题，提出“建团工作必须全党来做”。^①会议主持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在做大会结论时，专门讲到青年团问题，他说：“青年团问题，由中央决定后就着手去办。头一步要选择和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在土改中把青年团下层组织形成起来，选择积极分子加以训练。中央局、区党委要选择一批有群众工作作风的、虚心的、能接近群众而没有官僚主义毛病的青年干部去做青年团工作”^②。刘少奇的结论和冯文彬的发言，在全党领导层中引起了重视，对于建团工作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土地会议期间和会议结束后，中央青委召开了解放区青年工作代表会议，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冀热辽、东北和华东各解放区的青年干部代表和中央青委同志参加了会议。各解放区汇报和介绍了试建青年团的情况和经验，决定扩大团的试建工作，强调要在土地改革和各项实际斗争中公开建团。

9月19日上午，天空白云朵朵，微风吹拂，青年工作代表会议的同志，整齐地坐在一个露天场地上，细心地聆听着刘少奇的讲话。在人们耳畔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青年工作好好搞一搞很有必要。现在重建青年团，要有系统地搞青年工作，要在全国内搞。应当制订一个青年工作纲领，使大家能够根据它来进行工作。建团的任务，主要是学习，但也不只限于学习，要在各种运动中起作用。刘少奇反复强调地指出，“青年团除纲领外，特别重要的问题是作风问题。作风的问题很大，作风一形成就成了习惯。一个纲领，一个作风，开始得不好，要解散的。好作风是老

① 《中国青年文献》（二）第60页，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编印。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9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百姓和党欢迎的。在团内要有一种好的精神、态度、作风。团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青年团要咬紧牙关学习好作风，坚持下去，形成好习惯。^①

作为延安时期后期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虽然不曾参加讨论建团的中央会议，但是在这时，当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仍在陕北之际，他在全党的重要会议上，发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青年团”的新的进军号令，无疑地反映了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中国青年真挚火热的感情和对于建立青年团的重视关怀。

重建青年团结出丰硕成果

在国民党胡宗南军队重点进攻陕北彻底失败之际，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向生活战斗了13个年头的陕北告别，东渡黄河。5月，他们转战到河北平山县西北坡，与中共中央工委汇合。此后，党中央在这里领导全国军民，实现了在陕北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从延安开始的重建青年团的工作，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全党的战略任务和工作部署，提出在1949年上半年要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问题。10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也把中央的这个决定，通知了各地。^②

为了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事，周

^① 《中共中央、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青年工作的指示》第三册第5—10页，1963年1月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印。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

周恩来专门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同时，即可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并提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其中央委员会和中国青年联合会的中央机构，“两个团体，恐仍须分别成立，但全国青年联合会，可成为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只以团体资格参加，并起领导作用。”^①周恩来的意见，得到党中央的同意，青年团和全国青联成立以后，两个团体的关系就是按照周恩来的意见执行的。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解放区普遍试建青年团工作的成功，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②。这个决议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根据各解放区试建青年团工作的实践，明确地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建团方针和步骤等问题。关于团的性质决议规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坚决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先进青年们的群众性的组织，是党去团结与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是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的学校。”关于团的任务，决议指出“就是首先要团结和组织先进青年的积极分子，再经过这种积极分子的组织，去团结和教育广大的青年群众，和中国人民一道，为了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并在这种实践奋斗中不断地教育中国的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在于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教育自己的团员和青年群众，同时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

① 《中国共青团简史》第9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

②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707至7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神组织广大青年群众积极地参加我党和人民民主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关于建团方针，决议规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要建立在青年群众的自愿和自觉的基础之上，要在群众运动和各种工作中公开地进行建团。”关于建团步骤，决议指出“应当是有重点地逐步地向前推进，首先从城市、工厂、学校、部队及人口较集中、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的村镇开始，然后再求普遍地发展。”

党中央的建团决议，吹响了在全国普遍建团的号角。全国建团工作进展很快。2月，中共中央便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亲自担任主任，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为副主任。4月，全国团员发展到19万人，召开全国团代大会的时机成熟了。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解放不久的北平举行。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毛泽东为大会亲笔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 领导他们 加强学习 发展生产 ”并接见了到会代表。朱德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并讲话、题词。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部署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繁忙时刻，也抽暇到会做报告。报告第4部份讲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①的重要思想。他说：“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问题，对党来说，就是党与非党人士合作的问题；对青年团来说，就是团员与非团员合作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广大人民中间，大家彼此怎样合作的问题。这是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告诫大家说：“青年人一定要非常谦虚，不要骄傲，应该觉得自己差得很，事情还做得很少；同时，我们还要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孤陋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6—33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寡闻，这样不行，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我们青年人很需要养成这种作风。”周恩来这些思想，对于今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青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重要意义。

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了政治报告。^①他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中国青年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中国青年运动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中国青年运动的指导方针。他指出：“30年来的近代革命史，证明中国青年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青年都曾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列，对人民革命运动作了很光辉的贡献”。他总结历史经验说：“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过去30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如何保证党对青年团的领导，任弼时指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青年团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各级党委要把青年工作放在应有的适当位置上，在加强对青年团领导的同时，又应当注意尊重青年团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他希望青年团正确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说：“带头作用，打先锋，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要去提倡，但不要走到先锋主义。先锋主义是不顾共产党的领导，而企图去代替党的领导，这种偏向我们应当反对。对于青年组织应有的独立性与‘闹独立性’的偏向（青年主义倾向），也应加清楚的区别。闹独立性的偏向应加以反对，但同时应当注意尊重青年组织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任弼时的报

^① 《任弼时选集》第474—49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

告还提出了今后团的任务和工作方针等问题。大会一致通过决议，以任弼时的报告作为今后全团工作总的指导方针。

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表明了党中央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延安播下的重建青年团的种籽，已经在全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罗成全）

推动学生运动的新高涨

——中共中央对第二条战线斗争的领导

1946年6月末到1948年3月，也就是从全面内战爆发，到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一方面领导军民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并使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新阶段；另一方面根据国统区形势的发展，正确地领导了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形成了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争相配合的第二条战线。

加强国统区工作的统一领导

国民党政府凭着他们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又有着美帝国主义的巨大援助，曾经扬言要在3个月到6个月中打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到1947年6月，人民军队在一年的作战中，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共歼敌120万人；自己的总兵力已发展到190多万人。人民军队结束了战略防御阶段，以新姿态跨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的同时，在经济和政

治上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国民党统治集团日益腐败，所作所为完全脱离人民。为了进行内战，换取美国的支援，国民党当局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协定，国统区形同美国殖民地。当时上海百货公司货架上竟有 80% 是美国货。在全部外国在华的投资中，美国资本占 80%。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官僚资本极度膨胀，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民族工商业大批倒闭，农业经济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劳动人民和公教人员生活日益恶化，广大人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美国政府除了直接插手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还派大量军队驻扎于中国境内。由于国民党政府纵容，并规定驻华美军肇事只由美国宪警处理，美军在中国到处横行不法。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 11 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五市发生的美军暴行达 3800 多起，造成中国人民死伤 3300 人以上。这些暴行，激起了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青年和广大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

为了适应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日益发展形势的需要，1946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刚从国统区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随后，中共中央确定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管理党在国统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解放区的各中央局、分局和有关党委均设立城工部；在国统区，以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和平、津、青岛、台湾地区的工作，香港分局管辖华南地区的工作。这就大大加强了党对国统区工作的统一领导。

揭开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东单操场，发生两名美国军人强奸一名中国女大学生事件，以此为导火线，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2月30日，北大、中法、朝阳、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学生5000余人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随后，到东单广场举行抗议大会，向万余观众发表演讲。这次示威，掀起了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统区学生反美蒋斗争的怒潮。

北平学生反对美军暴行的斗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极为重视。北平示威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电文^①，指示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各大城市群众及海外华侨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并坚持下去，努力在运动中“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

各地党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1947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响应北平学生反美蒋运动的指示》^②指出，“对于这一事变的重大意义必须充分估计。这个运动可能取得胜利……并使群众斗争继续高涨。”指示还要求“在解放区进行广泛的运动，来响应北平和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把抗暴斗争引向广泛

① 《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63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②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64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和深入。上海、天津、南京、杭州、重庆、成都、广州、台北等地学生也都相继举行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参加这次抗暴斗争的学生达数十万人，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侵华政策。美国军事法庭不得不对东单肇事美军判刑，美国政府“陆续撤退其驻在北平、青岛各地的美军，并停止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美蒋之间“亲善无间的友谊，留下了暗淡悲惨的一页。”^①

在反美抗暴斗争中，各地学生相继成立了“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等组织。1947年1月28日，平津学生抗暴联合会成立，在它的推动下，全国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总会也于3月8日在上海成立，为国统区学生运动进一步高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对于这场抗暴斗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利用平津京沪学运成绩扩大我党活动的指示》中指出：“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影响甚大”。要求党在蒋管区的工作“应尽量利用这次学运的成果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动。”^②接着，2月1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中指出，抗暴斗争“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③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4章第25页。

②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64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1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成功地开辟第二条战线

随着全面内战的持续，国民党政府的军费支出猛增，达到财政支出的80%。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使通货膨胀象脱了缰的野马一样。恶性的通货膨胀引起了物价暴涨。美联社电讯有过这样的描写：法币^①100元可购买的物品，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个鸡蛋，1947年为1/3盒火柴。仅在1947年2月至5月的三个月中，物价就上涨了4倍。国民党政府由于打内战而引起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了。民族工商业日益走向破产。从1946年10月至1947年2月，上海、武汉、广州等20个城市工厂商店倒闭的达2.7万家。农业经济急剧衰退，农作物产量1946年比1936年减少8—12%；1947年更减少33—40%。广大工人、市民、公教人员和学生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1947年2月新学期开始，北平大学竟有五六百名学生因付不起学费而失学。工商业倒闭，几百万失业大军，使毕业学生更难于找到就业的机会。即使还能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也因飞涨的物价而挣扎在饥饿之中。1947年5月，每个公费学生每天的菜金800元，只够买两根半油条或一块豆腐。没有公费的学生情况更惨。学生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坏，许多学生长期营养不良。1947年5月，上海医学院学生体格检查，约有15%的学生因营养不良得了肺病。因贫病交迫，失学失业而自杀的学生也日益增多。

根据国统区的形势，1947年2月28日和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

^① 即国民党政府的纸币。

指示^①。2月指示说：“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5月指示说：“在蒋管区统治尚严的地方尤其是蒋管区大城市中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

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采取以下方针：“从生活斗争入手，进行突破并使之不断发展，逐步和政治斗争相结合。”上海局认为，解决生活问题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符合群众切身利益的口号，发动群众进行合法的生活斗争，可以抓住敌人的弱点，成为全面开展运动的突破口。对运动的具体部署，上海局决定首先在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突破，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由上海、北平、天津、杭州等地配合响应。随即上海局分别同南京市委、上海学委、北平南系^②和西南方面学生工作负责人，研究布置如何发动斗争，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地下党组织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北系是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后来是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的，是原北平地下党组织。南系是原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地下党组织，抗战后迁回北平，仍由南方局（后为上海局）领导。

确定通过纪念红五月活动，开展结合各校情况的分散斗争，逐步汇合，在红五月中形成高潮。

5月10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贴出布告，宣布伙食办不下去。经学生桌长会议决议，先按营养标准吃饭，吃完了伙食费再说，此项决议称之为“吃光运动”。12日，各系学生代表会决定罢课，要求按物价指数增加公费。15日，中央大学又联合金陵大学、音专、剧专、药专等高等学校学生三四千人，打着“我们饿，上不得课”、“向炮口要饭吃”等标语旗帜，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16日，金陵大学在游行中提出“要生存，反内战”的口号。17和18日，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连续举行会议，决议成立南京学生联合会，20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与此同时，上海学生的斗争也迅速发展。12日，交通大学罢课。14日，上海医学院罢课。从15日开始，上海各大学相继罢课，提出“提高公费，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17日，上海国立学校联合会成立，决定把“吃光运动”改名为“抢救教育危机”运动，以争取社会更多的同情。

北平、天津的学生也遥相呼应。5月16日，北大、清华等校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并从17日起相继罢课。18日晚，北平、天津、唐山三地12所大专院校在北大成立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决定5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参政会这一天，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抢救教育危机”的游行示威。

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5月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要对违犯者“作有效之制裁”，企图扼杀学生运动。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因此屈服，学生运动逐步由分散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

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月20日，宁（南京）、沪（上海）、苏（苏州）、杭（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冲破警宪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面对暴行，学生仍挽手奋勇前进。但国民党军警组成5道防线迫使游行队伍停住。双方对峙到下午时，在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答应学生代表提出的释放被捕学生等4项要求后，才胜利返校。

同一天，北平各大、中学7000余名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游行持续5个多小时。天津学生也进行了斗争，遭到反动当局镇压，60余人受伤，20多人被捕。

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激起了广大学生更加强烈的反抗。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除了京、沪、苏、杭和平、津、唐之外，还席卷长沙、昆明、重庆、广州、福州、南昌、桂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5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复电，要他们坚持从生活斗争突破、逐步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并指示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①

5月24日，上海局再次向中央报告请示斗争的部署和打算：

^① 《中央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1947年5月23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65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为着巩固战果，争取社会更大同情，教育中间分子，避开敌人攻势，避免过早与敌人决战，以便集中力量在决定关头使用，主动决定暂时停止罢课，一面上课，一面斗争，采取上课、罢课带弹性的斗争策略。

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学运口号不要生硬对叶罗^①报告作了批示：“此次学潮一般的是从学生本身要求发动起来的，但一经发动，便马上联系到政治口号，于是要饭吃要和平，反饥饿反内战，均成为不可分离的斗争口号。现在在五月二十惨案的激动下，连取消蒋介石的紧急治安法令的口号都提出来了，更难使各地学运只局限在经济口号上。应该说，要使此次学运的政治经济斗争口号成为有机的联系，不要生硬加上，不要脱离中间分子，更依其觉悟程度提出各种部分的辅助的口号以推动其向总的斗争口号前进。”^②

6月3日，中共中央又给上海局复电，认为上海局“领导斗争向前发展的方针是对的”。指示学生运动“应抓紧社会上对此暴行的共同愤慨及统治阶级中的某些矛盾（如立法院设调查委员会），坚持放人反暴行的要求，以团结内部，扩大同情。学生的组织形式也应与此形势相适应，例如现有华北区学联、京沪苏浙豫五区学联以及各地学生反暴行委员会，均可不拘名称形式，设法联合，以达到成立全国学联的目的。”^③

“五二〇”以后党中央的多次指示，正确地指导了斗争向前发

① 叶，即叶剑英；罗，即罗迈（李维汉）。

② 《中共中央关于学运口号不要生硬对叶罗报告的批示》（1947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66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③ 《中央关于学运方针给上海局的指示》（1947年6月3日），同①，第661—662页。

展。华北学生“反饥联”曾经决定，把6月2日定为全国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各地举行总罢课、罢工、罢市。这个决定宣布后，北平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认为这样的决定是不策略的，不能硬碰硬使学生运动受损失。经耐心说服，华北“反饥联”决定撤销6月2日“总罢”游行，各校学生不上街，只在校内活动。北大学生当天在校内民主广场集合，举行“反内战死难烈士和内战中死难的无辜军民追悼大会”。会上，正式将华北“反饥联”改为华北学生联合会。因为敌人已经做了大打出手的准备，学生没有上街游行，没有去硬碰硬，因此北平学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青岛、沈阳、武汉等地则因进步力量比较弱，又响应“总罢”号召，在敌人的镇压下，学生运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

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使一些无限期罢课的学校，进入复课、罢课有弹性的斗争。当正在转入停止罢课时，5月30日，上海等地国民党当局又大批逮捕进步学生。为形势所迫，又继续罢课进行反迫害、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各地各校党组织都积极联合各界以及被捕学生的家长做营救工作。6月7日，上海被捕学生家长会成立，积极派代表向当局交涉、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进行探监等活动。在群众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了以学生为主体的“五二〇”运动的伟大作用。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①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

^①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24页。

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事实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样，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统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1947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主要工业城市，有120万工人参加反对内战，反对美帝国主义暴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次数达3000次。反对蒋介石暴政的农民武装遍及国统区川、陕、滇、黔、粤、桂、闽、湘、鄂、苏、浙、皖等省区，总数达数十万人。城市贫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3月至7月的5个月中，国统区上海、南京和江苏、安徽、四川等9省的38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参加的城市贫民达17万人。

学生运动的高潮，还为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创造了一个方面的条件。在“五二〇”运动之前，解放区军民的基本口号是“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人民自卫战争的胜利和“五二〇”学生运动高潮，表明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的时机到来了。正如周恩来1947年9月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①所说：“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到处示威，反对美军强奸中国妇女，反对美军打死中国人，有的直接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出席参政会议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到礼堂闹起来，使蒋介石下不了台。蒋介石遭到人民反对，政治上破了产，所以我们应当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因为这

^① 《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1947年9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72页。

时一方面“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不要蒋介石”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

巩固第二条战线斗争成果 迎接全国解放

1947年6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各个学校提前放暑假，以分散学生力量。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研究了今后学生斗争的部署。上海局向中央作了请示报告。

6月19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文^①同意上海局学运方针。电文说：“完全同意你们关于学运的复课休整以巩固和扩大校内校外的同情运动和阵容并准备新的更大斗争的方针。”“各校组织的整顿和发展，平行组织和单线领导的坚持，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是暑期工作与下学期工作的布置与干部的配备和调整，都要有适当的指示发给各地，以准备新的斗争领导。”

6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蒋管区学生暑期下乡中心任务的指示》^②。指示说：“暑期学生下乡，其中心任务应是宣传群众，锻炼自己。当其与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并取得群众信任后，则可组织群众，发动斗争。学生下乡，要依环境决定其组织形式”，“工作方式要避免暴露孤立”，“总之，学生暑期下乡，主要是播散反蒋斗争种子，学习与接近群众，而不是一下子就希望开花结果。”

国统区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转入领导分散斗争，团结群众，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情和支持。他们积极地在

^① 《中央关于同意上海局学运方针的复示》（1947年6月19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66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②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66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2月版。

职工、教师、教授、某些学校当局者、社会知名人士、男女青年会上层以及外国友好人士中开展工作，并取得成效。1948年4月开始，学生的反迫害斗争便同教职员工反饥饿斗争结合在一起。4月5日，清华讲师助教联合会、北大讲师助教联合会、北平研究院助研人员联合会、清华职员工会、工警联合会、北大职员会、工警工会等团体发表《告社会人士书》，要求改善待遇，调整工资、宣布罢教、罢研、罢工、罢职。在北师院“四九”事件^①时，师院全体教授和教务长、训导长以及许多教师，还有北大、清华、燕京、中法等校许多教师，也随本校学生请愿大队到来，北大、清华的训导长、教务长也来参加请愿，支持学生行动。“八一九”大逮捕^②时，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发表演说，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侵犯学府尊严，尽力保护学生的安全。

国民党政府公布“特种刑事检举法”之后，8月19日，开始在各报刊登传讯、拘捕学生一批批的黑名单（北平三批总共463人，天津164人，南京147人，上海150余人），一场精心策划的大逮捕开始了。面对这种的形势，中共为了巩固和发展学生运动的成果，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一方面对全体党员和民青、民联、新青社成员进行形势和气节教育，作好思想准备，应付最坏局面，一方面作出相应部署：确定将已暴露的党员、民青、民联等和进步分子有计划地疏散，或离校、或回家乡、或撤退到解放区或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另一部分人则暂时隐蔽起来，停止活动，以待

^① 1948年4月9日凌晨国民党武装特务60余人闯入师院行凶，绑架8名学生。

^②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北平各报上刊登要“传讯”和“拘捕”的第一批250名学生的黑名单，同日，北平特刑庭发出传票和拘票要这250名学生于8月20日到庭受审，与此同时，大批军警包围和封锁各校校门，有的闯入校园抓人。

时机；有条件坚持下来的同志，留下来继续斗争。

为了巩固和发展学生运动的成果，地下党还组织学生积极分子总结红五月斗争的经验教训。一些地区的学联，在新学期开展了助学运动，帮助贫苦学生解决就学问题，进一步团结了广大学生。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学生积极分子，紧紧地把他们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及时地介绍他们参加党领导的各种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如北平的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和民主青年联盟（民联）；南京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社）；上海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新青联）等等。党通过这些组织教育提高他们，并通过他们去联系更广大的青年群众。因此党在学校的阵地日益壮大巩固，尤其是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半数以上的学生、教职工都分别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各种社团和教工组织，党在学校的力量越来越占了优势。1948年时，北大学生总数约3000人，而地下党员有400人，民青、民联成员有300多人，党组织的影响在北大是强大的。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党的指示和采取的措施是及时正确的，为开展新的更大的斗争准备了条件。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军事上的惨重失败，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濒临崩溃，广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因而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旗帜下展开斗争。到了1948年底，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配合解放军解放城市，地下党组织重点转到领导群众护厂护校，保护城市资财、设施、文物档案等工作上，这也就是战斗在第二条线的最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罗成全）

青年运动胜利发展的指针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对青年与青年运动的论述及其后来的丰富与发展

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的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达到成熟的时期。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正确地分析青年特点及其社会地位与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青年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培养教育青年的目标、内容、原则和方法，规定了青年与青年运动的任务、青年组织的形式、党与青年团体的关系。指导中国青年沿着正确方向锻炼成长和发挥积极作用，指导中国青年运动蓬勃发展和做出应有贡献。

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指导青年运动发展和青年成长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坚持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地位和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共青团的指导思想。对于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发挥青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特别重视青年和青年运动，从五四运动开始，经过建党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指导青年运动的具体实践，逐步从青年献身革命斗争的伟大作用中认识和把握了青年最本质的特点，提出了对待青年的基本原则和政策。

正确地分析青年优点和弱点，是按照党的事业需要引导青年健康成长、正确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指出，青年“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所以“是可宝贵的”，但同时又指出青年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他坚持全面地分析青年，把握青年的特点。^①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既是革命斗争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常常发挥着先锋、桥梁、生力军作用；又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后备队，担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从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对青年的特点作了最本质的分析。他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广大青年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压迫下，常常受到失学、失业、破产、流浪、死亡的威胁，精神和肉体遭到奴役和摧残，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因而青年富于政治感觉，有很大的反帝反封建反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性。

同时，毛泽东又指出青年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和阶层，不可一概而论，从政治态度上有革命，不革命，反革命之分。他把知

^① 见《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的题词》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8页。

识青年划分为有共产主义觉悟、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三类。与工农结合的知识青年能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未下决心为人民服务之前，往往带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空虚、行动动摇等倾向；而反对工农的青年则是青年中的败类，青年运动中的逆流。进而提出了著名的划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政治标准。

知识青年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因而马列主义能首先在知识青年中传播和接受，在革命运动中常常起着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是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要方面军。毛泽东曾反复指出，中国青年自五四以来就一直是首先觉悟的成份，始终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起了先锋带头作用；青年是一支重要方面军，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青年就不能成功，中国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

对待青年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由于我们党及其领导人能够正确认识青年特点，所以党对待青年的原则和政策更为成熟，开创了我党有史以来关心、爱护、吸收、培养、使用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的最好时期。

党对青年寄予了深切厚望，充分信任只要青年参战，中国就不会亡；只要培养并尽量发展青年的才能，青年就会成为国家民族的主人翁；只要青年团结、进步、奋战，就一定能把抗战引导到胜利的坦途。而青年中的败类、反革命总是极少数，即使国民党的青年骨干分子，也不是个个都坚决反革命。因此党把“革命青年”、“来者不拒”、“大量吸收”作为培养、训练、造就千百万新干部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把“广泛地组织青年”作为青年运动的基本方针。

对待知识青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批评、纠正了

一些地方不重视、恐惧、排斥知识青年的现象和错误；而且制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政策，要求“大量吸收”、“多方吸收”、“尽量招收”、“大批收容”、“大批招收”、“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学校、政府和社会工作。不仅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养训练党、政、军、工、青、妇、文、教、卫、科技等各类各方面的干部；而且特别重视发展知识青年入党，提出了“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①

受教育与起作用相结合。青年运动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党，青年只有在今天事业中开花，才能成明天事业中结果；只有今天的生力军，才能成为明天的接班人；只有在斗争实践中受教育、起作用，才能培养一代新人。因此党和毛泽东既提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有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作风的革命先锋队的培养目标，又向青年指出了到实践中学习、与工农结合的锻炼成长道路；既规定了青年教育必须为抗战服务、理论联系实际、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又提出了必须与资产阶级政党和帝国主义争夺青年，团结教育青年一代跟共产党走的方针；既给青年规定了学习的基本任务，为青年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又要求青年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为民族解放和青年解放英勇奋斗，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全面关心，积极引导。党中央不仅要求青年一代为民族解放和全体人民的解放而奋斗，而且提出了为争取青年特殊利益而斗争的任务，要求党和青年组织全面关心青年的成长。毛泽东在与

^① 《六大以来》（下）第150页。

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中指出，青年的特殊利益主要包括学习、改良教育、参加救亡运动、参加青年组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1941年6月《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明确提出青年的特殊任务就是“教育、学习、婚姻、娱乐、改善生活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再次表明了中共对青年的基本政策是，保护青年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帮助青年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各项工作，保证学习、婚姻自由。

在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广大青年获得了政治权利，青年抗日团体有了合法地位。经党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普及国民教育，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尊重知识分子，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校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而对国民党摧残、奴役、杀害、侮辱青年的罪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则屡次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保护青年。

二

中共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和青年运动的实践中，逐步认识了青年运动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规定了青年运动的性质、方向、方针和任务，从而使青年运动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健康发展。

1. 青年运动的性质必须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相一致，必须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

中共为了发挥青年运动的伟大作用，及时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帮助青年运动实现转变，迅速担负起时代赋予青年运动的新使命。正如在民族危机最严重关头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后，中共及时提出了改造共青团，把无产阶级青年运

动转变为民族解放性质的抗日青年运动。1937年4月召开的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这样的转变，专门向青年们作了阐述，指出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要求青年团结起来，宣传新的口号，巩固国共合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中，又论述了建立青年统一战线、实现青年运动统一和团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号召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抗战到底。”随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42年2月再次强调现阶段青年运动必须“更适合于非党的、广大群众的、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性质”。

抗战胜利前夕，新形势需要民族解放性质的青年运动转入争取和平民主、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国家而奋斗的青年运动，党的领导人又及时向中国青年指明了新的历史时期青年运动的性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号召青年积极投身实现民族团结、建立新中国的和平民主运动。党中央在1946年秋试建青年核心组织——青年团的提议中，明确规定了青年团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把“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作为团员的政治条件。

2. 青年运动是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青年运动必须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正确处理青年运动与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的关系，关系到青年运动的根本方向。

青年运动的方向，是青年运动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系统论述青年运动方向的是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和《五四运动》两篇文章，他在回顾了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在整个人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后指出，青年运动是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但“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工农大众；因为工农是革命的根本力量，所以单靠方面军是不

能取得反帝反封建胜利的，只有方面军和主力军“结合在一块”、“变为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才能攻破敌人坚固阵地和最后堡垒。青年运动必须与党领导的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这就是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一条根本的历史经验，它科学地反映了党领导青年运动胜利发展的规律，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也是毛泽东要求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唤起民众”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教训的主旨。

3.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青年运动的统一，团结教育组织全体青年参加抗战的青年运动方针。

统一战线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青年统一战线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12月党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后，就向青年运动提出了团结全国各阶层爱国青年参加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要求。

为了与三青团发展统一战线，党中央通过西北青救会于1939年5月发表了《致三青团书》，公开表明了建立青年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具体意见。时隔一月，毛泽东就在《反投降提纲》中肯定和强调了“坚持青年统一战线，继续采取五四《致三青团书》的态度，用以争取青年的多数，在继续抗战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之下”的青年运动方针^①。1941年6月，党中央在《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中高度赞扬了青年运动采取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方针后“得到广大的发展”，为了实现党在青年运动中“团结教育整个青年一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第一次印刷。

代”的总任务，要求今后青年运动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

4. 青年运动有一般任务、特殊任务、组织任务之分，团结教育青年为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而奋斗是青年运动的一般任务，争取青年的特殊利益是青年运动的特殊任务，建立适合形势任务和青年特点的青年组织是青年运动的组织任务。

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是青年运动同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结合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要求青年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任务和前途，为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而努力；并在与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中把青年运动任务分为一般任务与特殊任务，一般任务就是不分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的人民之共同任务，即党的总路线总任务。青年运动只有把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放在第一位，才能与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才能和整个人民革命运动保持一致的政治方向。毛泽东 1940 年 5 月为《中国青年》题词就写了“目前中国青年的唯一任务是打胜日本帝国主义”。

争取青年的特殊利益，是青年运动的特殊任务。青年运动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形式，关键在于有它的特殊本质，这就是作为青年运动主体的青年有着不同于成老年的特点。从青年特点出发，对青年运动规定了争取青年特殊利益的特殊任务。党中央强调指出，“只有在执行一般任务中起模范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青年自己的特殊任务”；“只有为青年解决了他们的特殊要求，才能动员一切青年群众更好地执行一般任务”。为了更好地实现青年特殊任务，党又把“训练教育青年”定为青年团体的基本任务，把组织和发动青年参加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为广大青年特殊利益服务、青年的学习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作为试建中的青年团的三项基本工作。

怎样实现青年运动的一般任务和特殊任务呢？毛泽东认为，民众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力量的。因为国民党长期压制、摧残、捕杀青年的恶果，致使中国绝大多数青年处于无组织状态。所以党要发挥青年运动的作用，就首先于1936年11月初向青年运动提出了在抗日救国、民主自由的目标下，因地制宜地利用各种方式建立各种各样的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的组织任务。在抗战初期和中期，党通过青救会、民先队等进步青年团体和党的青年工作者，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的力量，在广泛动员组织各阶层青年参加救亡工作中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青年抗日团体，真正把数百万青年团结和组织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了，形成了中国青年运动有史以来组织阵容最强大最有力量的历史时期。

三

中共深知自己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奋斗和延绵不断的交替和合作，才能最终完成，因此在延安时期极为重视青年的培养教育问题，党中央及其领导人以马列主义教育观为指导，对青年的培养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全面论述和伟大实践，形成和发展了一整套青年教育理论。

1. 造就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强健的体魄的革命先锋队，是青年教育事业的目标。

中共在延安时期逐步总结和提出了符合党的事业需要的培养目标，这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一代。毛泽东1937年10月为陕北公学成立和开学纪念的题词，提出了造就革命的先锋队的政治标准：他们应该是具有政治远见，充满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襟怀坦白，忠诚、积极、正直；不谋私利，不怕困难，脚踏实地，富

有实际精神。接着又在陕公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赠给青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两件礼物。以后又勉励青年“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2. 青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青年组织的基本责任在教育”。党和青年组织要引导青年在实际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一切本领，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坚定地走共产主义道路。

党的领导人认为，青年时期是学习时期，所以反复强调了青年的学习和青年组织的教育问题。毛泽东向青年提出了“努力学习，切实学习，不学不好放手”的“首要任务”，既要求青年解决好政治方向、工作作风和抗战本领问题，又要求青年“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党中央在改造共青团的决定中指出，虽然把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改为青年统一战线组织，但仍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每一具体环境的认识来教育青年群众”，“提高青年群众的觉悟程度，引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3. 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在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中学习，到实际工作和斗争中学习，到生产劳动中学习。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列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延安时期党对青年学习、教育的基本要求，就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毛泽东反复教导青年，“对马列主义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向斗争中学习”；“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学习之后就要工作，工作之中还要学习”；书本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在“劳动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毛泽东对青年学习途径的论述，充分体现了马列主义关于人的教育改造离不开社会实践的基本原理，体现了党关于青年起作用 and 受教育相结合

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要求青年在学习中必须联系思想实际，不断清除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锻炼坚强不屈、坚定不移、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和作风；要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党和青年组织必须有针对性的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帮助青年端正政治方向。毛泽东在延安不仅给青年指明了锻炼的方向和要求，而且亲自到青年学生中帮助解决思想问题，为全党树起了一面光辉旗帜。他要求青年转变思想感情，克服虚荣心和骄傲自满情绪，养成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求知识青年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思想空虚和行动动摇的弱点。1938年7月，毛泽东为了帮助抗大部分知识青年克服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思想倾向，亲自到校作了《关于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给知识青年摆事实，讲道理，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观点，引导学生正确运用民主，收到了显著效果。

4. 与工农结合，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是青年锻炼成长的根本道路和方向。

延安时期，毛泽东反复阐述和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把它作为青年运动和青年成长的基本思想，把实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为青年革命化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先后在为抗大毕业生题词、《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多次提出，辨别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青年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个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青年必须与广大工农结合的实质，而且指明了青年革命化的唯一正确道路和方向。毛泽东强调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其实质就要要求青年与人民群众立场一致，感情相通，命运与共，融

为一体，向人民学习，从人民中吸取营养和智慧，为人民的事业和利益而奋斗，最终完成向社会实践主体转化的过程。

加强青年同成老年的团结，不仅是与工农结合、向人民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还是社会延续发展与共产主义事业代代相继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共十分重视青年同成老年的团结合作。毛泽东曾满怀信心地认为，“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告诫青年人不要因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也不要因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党中央针对陕甘宁边区个别地方青年工作脱离群众的偏向，在《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中提醒党和青年组织，“应该引导青年的积极性及好胜心理向着青年起模范作用的方面去，而不是引导到过于突出、甚至和成年老年相隔离相对立的方面去”，强调青年要在成老年的支持、指导、同意下和同成老年一道干中发挥积极作用。

四

中共为了团结教育青年一代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在延安时期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及时改造、变更青年组织的性质、形式和工作方法，及时地选拔、训练新的青年干部，从而最大限度地把一切爱国青年团结和组织到党的统一战线中，较好地发挥了重要方面军的作用。

1. 青年组织必须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而变更，必须因地因人制宜地建立各种各样的青年团体，才能更好地团结教育青年一代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中共对其助手共青团的改造，实现了先进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向非党的统一战线组织的转变，实现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向民族

解放的抗日青年运动的转变，实现了“非法组织”、秘密活动向公开合法方面的转变。此后党中央反复强调用青年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和组织青年，多次批评和否定了一些青年干部要求建立全国统一青年组织和重建青年团的思想。

1941年6月党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明确指出，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应与团结教育青年一代的任务相适合，现阶段“青救会就是适合于团结各阶级青年的主要组织形式”；同时提出应重视建立青年积极分子组织，继续发展青年半武装组织，而建立新的统一的基于青年组织的提议暂时是不能采用的。

抗战胜利前夕，国内主要矛盾即将发生变化，青年队伍的分化更加明显，青救会等青年抗日组织的历史使命也即将完成。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及时指导根据地青年成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帮助国统区进步青年秘密成立了民主青年协会、民主青年联盟、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党的外围组织，以促进民主联合政府的实现和全国青年的团结统一。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后，为了有组织发挥青年在解放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奋斗，党中央在8月和9月两次开会讨论青年组织问题，认为应该建立青年积极分子组织，以此带动广大青年，决定试建比过去共青团更群众化青年化、比青年统一战线组织更先进的青年核心组织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毛泽东赞成建立青年团。他说：搞青年团是好的，可以征求一下各解放区的意见。

2. 坚持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联合与斗争的策略，不断加强青年团体的自身建设，才能推动青年统一战线的发展。

青年统一战线是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界青年组成的统一整体，是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多层次结构。中共为了推动中国青年的团结和统一，不但提出了青年统一战线方针，而

且为青年组织规定了一系列策略原则。

党在指导青年组织时，针对青年没有政治权利、进步青年组织没有合法地位的情况，在组织和工作方式上提出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要求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法律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争取进步青年组织的合法地位，建立各种合法青年团体，动员青年参加各种公开合法的青年组织。

1938年夏，国民党在西安、武汉等地解散了青救会、民先队、青年救国团等进步青年团体，我党在与之开展斗争中，及时通过中央青委指导陕西国统区青救会、民先队首先转入秘密隐蔽，同时在青年中建立各种学术的、生活的、友谊的、体育的小型团体，避免了青年运动的损失。

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于1940年6月发出《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6字方针，提出了“长期的 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的青年组织方针，要求根据环境组织合法的小团体或无定型的组织。从而使国统区青年组织迅速实现了转变，顺利渡过了低潮时期。

3. 青年工作干部是带领青年实现其历史使命、巩固发展青年组织、完成团结教育青年一代任务的决定因素，必须选拔和培养大批德才兼备、密切联系群众、有一技之长的青年工作干部。

中共中央不但创办了鲁迅青年学校、安吴青训班、泽东青干校等专门训练青年干部的学校，在中央党校、各地区党校、各有关干部学校设立了青年干部班，大量从青年学生、工农青年、青年军人中吸收、训练青年工作干部；而且向青年工作干部提出了必须具有马列主义素养、党性观念、事业心、责任感、革命品德、业务知识、工作能力、优良作风的全面要求。

党根据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首先规定了一个青年工作者的

基本条件。1936年11月党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青年干部，必须“是那些忠实于民族革命事业的青年，与群众有联系的、不怕负责的、活泼的、有学习精神的、有一艺之长的青年。”

在对青年干部的具体要求上，党首先要求“党的青年工作干部应该认识青年工作是党的主要工作之一，安心于自己的工作”。一个青年工作干部，必须认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党的重托，是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革命事业，自觉地在青年工作岗位上作出贡献。

一个青年工作干部必须是毛泽东的优秀学生。中共中央第一次用毛泽东名字命名青年干部学校，它的深刻寓意就是要求青年干部努力学习毛泽东的伟大生平事业和毛泽东思想，象毛泽东那样忠于革命，勤于学习，勇于创造，长于工作，善于团结；就是要求青年干部坚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毛泽东则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能不能中断的战略高度，强调了青年干部与老干部“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

对于青年工作干部的作风，是党中央和党的领导人反复重点强调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要求青年干部的思想必须适合所处的各种工作环境，不要带着城市观点主观地处理农村问题，从实际出发，才能对青年运动处理得适当。

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关于青年与青年运动的理论，指导中国青年运动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迅速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不同历史使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伟大成绩，还引导革命青年按照祖国需要和党的要求健康成长，培养了一代新人。

（赵有奇）

五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青年和青年运动的思想，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普遍建立和发展，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新形势和任务，从新一代青年的实际出发，又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了。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青年和青年团工作的论述，主要是：

（一）青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一贯重视青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进一步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① 并说：“无论工厂、农村、军队、学校的革命事业，没有青年就不能胜利。”^②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不仅要求我们应“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③ 而且对青年寄殷切期望。他说：“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还说：“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④ 他多次强调并希望青年要把老一辈开创的革命事业坚持到最后胜利，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二）青年的教育和成长。毛泽东十分关怀青年的全面发展。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7页。

②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8页。

③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7页。

④ 《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实习生时的谈话》（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第14—15页。

他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① 他要求青年团帮助青年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他认为这样做，“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② 为了更好地帮助青年成长，毛泽东特别强调需要加强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指出，“不少青年人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和 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③ 他强调，青年“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④ 他希望青年做到又红又专。对于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提出，“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⑤

(3) 青年的特殊利益和要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要关心青年的特殊利益和要求。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针对有些地方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不注意青年的休息娱乐睡眠，以致青年的学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0—781页。

②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0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1页。

④ 同上，第780页。

⑤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0页。

习和工作的负担过重，过于疲劳，损害身心健康，明确地提出，“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①他强调，“青年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他要求我们要充分兼顾青年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②青年的特殊利益和要求，还有就业、升学、婚姻等，也是需要和应当照顾和解决的。但我国人口多，又是发展中的国家，困难问题还很多，所以毛泽东提出我们解决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而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③

（4）青年团的工作。早在1952年毛泽东在同团中央的领导同志谈话时，就提出了团如何做工作的问题（还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要团中央研究。在1953年6月30日，他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亲自详细地阐述了这个问题。^④他说，“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他希望青年团“学会领导青年，和成年一道，在农村把农业搞好，在城市把工业搞好，在学校把学习搞好，

①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1953年6月3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0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2—783页。

③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1953年6月3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8—703页。

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军队把国防军练好，成为现代化军队。”他强调在执行全国人民总任务时，青年团“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他认为，“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工作，同地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他说，“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他还指出，“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此外，毛泽东还有关于团的组织要“学习马列主义”，要“巩固地向前发展”，要“团结各界青年”等等论述。

除毛泽东外，党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对社会主义时期青年与青年团工作，也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周恩来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青年团“要搞大圈子”，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刘少奇关于“青年团除纲领外，特别重要的问题是作风问题”，“青年团是教育青年的组织，青年团的负责人要做青年的表率”，“青年团在斗争中当党的助手，在斗争中教育青年”，“青年团要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朱德关于青年团“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青年”，“必须有很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青年中要特别加强劳动和勤俭的教育”，要“发动青年勤俭建国，勤俭持家”……；邓小平关于“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的根本”，“要教育青年永远跟党走”，“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同级党委的领导”，“把团的系统领导和党的统一领导结合起来”，“青年团要代表和反映青年的要求”，“要有一套适合青年特点的组织形式”，“最大限度地把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要向全体青少年宣传高尚的道德”，“做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对青年人一定要注意引导”，“对闹事的学生要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以及要求青年团既要生动活泼，轰轰烈烈，又要踏踏实实，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等等。所有这些都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中国青年和共青团的宝贵的思想财富，是我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共青团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生动、深入、扎实地开展青年工作，充分发挥共青团作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可靠后备军的作用，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郑 洗）

附 录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及其战友 与青年运动纪事

(1935. 10~1948. 3)

1935 年

10 月 19 日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西北苏区青年运动即在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等领导人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蓬勃发展起来。

11 月上旬 在长征期间停止了工作的共青团中央，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恢复了工作。

12 月 27 日 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对国统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极大发展予以充分肯定，并预见说“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毛泽东又及时地强调指出，“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

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

1936 年

1 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共青团工作。遵义会议被推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要求共青团要在青年中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应该去掉一切框框，在抗日的口号下吸收青年入团。会后团中央发出《目前形势与团的任务》的文件，号召全国青年参加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要求苏区共青团扩大青年运动范围，扩大和巩固苏区，发展和巩固团的组织。

4 月 5 日 刘少奇发表《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及时指出北平部分学生中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倾向，帮助学生运动总结经验教训，指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应该采取统一战线的公开合法的争取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同情支持的方式。

4 月 16 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决定“五一”举行西北苏区赤卫军、少年先锋队总检阅。

5 月 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团中央领导班子，任命冯文彬为团中央书记。

7 月 30 日 中共中央讨论白区工作，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建议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帮助团的工作和扩大团的组织，张闻天指示共青团工作，还是应当用民族解放先锋队或民族解放青年团等名义公开活动。

8 月 5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要求，“党要帮助团成立单独的组织”，“不用 C·Y 的名字去开

展青年的工作，而用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的名字，以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存在。以便吸收各阶层各党派所影响下的广大群众，实现 C·Y 是青年群众组织的任务”。

8月9日 张闻天在《给刘少奇同志的信》中指出，“根据国际的意见及我们的经验，团是应该取消的。象团现在这样的组织，结果会变成秘密的狭隘的第二党的组织。我们现在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名称组织青年群众。

10月12日 中共中央开会讨论红军政治工作，陆定一等人提议应当改变红军中青年团的工作与组织，名称叫朱（德）毛（泽东）团或红军青年团。毛泽东讲话赞成陆定一关于红军共青团的意见，认为应当有根本的改变，但暂不作具体结论，不必叫朱毛团。

10月18日 张闻天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中强调，应把共青团等先进分子的秘密组织改变为公开的抗日救国团体，叠床架屋的狭小秘密组织只能给敌人无数破坏的机会。

11月1日 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改造共青团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凯丰及团中央主要干部冯文彬、陆定一、刘英、胡耀邦、赖大超等出席。会议一致认为，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的需要，共青团必须在组织上性质上来一个大的转变，克服关门主义、第二党倾向，成为非党的广泛的青年群众组织。张闻天在总结中指出，共青团现在应用大的力量来迅速地改造，一切组织形式与方式都应当改变。要取消白区共青团组织，可根据各地形势与条件建立各种各样的青年群众组织；改变苏区团的性质与名称，在自下而上建立青年救国会的基础上逐步取消团组织；取消红军中共青团组织，在青年俱乐部下开展青年工作；在党内设青年部，但它不能代替青年群

众组织；在青年群众组织中建立党团，现有的团员大部分可加入共产党。会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对团的改造作了具体规定。

秋 团中央机关干部过冬棉衣无法解决，周恩来指示中央军委三局被服厂帮助团中央解决困难。

12月5日 中央机关共青团组织在改造中建立了中央机关青年俱乐部（青救会的基层组织）。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领导人是日下午4时出席青年俱乐部开幕典礼并讲话，他对青年和青年工作提出具体希望和要求：1. 开展新文字运动，消灭文盲；2. 青年是革命的主力军，应努力学习；3. 青年俱乐部应成为抗日救国的青年组织；4. 积极开展体育运动，锻炼强壮的身体；5. 苏区青年要做全国青年的模范；6. 努力参加军事训练。

1937年

1月20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将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个重要任务。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并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抗大象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造新社会，去打倒日本。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抗大教育工作，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经常到校讲课。

3月中旬 毛泽东、朱德、徐特立等领导人同延安千余名青少年参加延安市卫生大扫除，并分别向青少年发表讲演。

4月12~17日 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徐特立等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共产党的团结抗敌政策，说

明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停止土地革命，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的必要和意义；指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是今日的中心任务；号召中国青年团结起来，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抗战而奋斗。张闻天希望西北青年团结起来，成为全国青年的模范。周恩来要求认真想一想青年抗日救亡中的5件事，然后定出全国青年的共同奋斗纲领。朱德希望中国青年在抗日中组织起来，实现西北青年和全国青年的大联合。大会根据党的领导人的指示，制定了《关于救亡运动的决议案》、《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确定青救会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而斗争”。大会期间，毛泽东、朱德还挤时间参加了大会代表的会餐和联欢晚会；毛泽东单独接见并宴请了西安青年代表团；周恩来专门与红军青年代青团进行了座谈。

5月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广泛地组织青年，要求白区党组织帮助民先队克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残余，成为广泛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青年群众组织；帮助青年特别是工农青年组织起来，促成各种青年团体在抗日救国目标下联合起来；积极帮助学生运动，扩大它的群众基础，加强他们的组织，并为青年学生利益而斗争；要有系统地经常地进行青年文化、教育、娱乐、体育工作；要为儿童幸福与教育而斗争，吸引他们参加抗战宣传活动。

毛泽东接见出席白区党代表会议的北平学生运动领导人黄敬、李昌、扬学诚、林一山等代表时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北方青年应该同这

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检查和完全克服。

6月6日 张闻天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强调，党组织要帮助教育犯急性病的幼稚的青年同志，懂得革命是艰巨的工作，克服困难，不怕挫折，耐心地做争取群众的工作，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

8月 毛泽东为抗大二期学员毕业证书上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9月7日 毛泽东针对知识青年思想实际，为抗大《思想教育》刊物撰写了题为《反对自由主义》的发刊词。

10月16日 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阐述抗日民主政府对群众团体和群众运动的关系：保障群众团体和群众运动的自由，确立其在法律上的权利与合法地位，在物质上协助，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强调政府只有允许群众运动自由，尊重群众团体，才能取得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的忠诚帮助，

10月18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民先队工作的决定》，要求民先队成为争取公开的广大青年抗日群众团体，民先队员应成为各种公开青年组织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应吸收优秀民先队员入党。

10月23日 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

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10月 刘少奇在《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中，要求设立军事政治学校，大批吸收青年学生，为党训练干部。

11月1日 毛泽东出席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作《目前的时局》的演讲。此后要求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都到陕北公学讲课。

11月14日 抗大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中共中央特地赠送了毛泽东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横匾。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写信鼓励说：“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情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11月13日 周恩来在《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中，指示各军区组织训练队，收容各地青年学生参加训练。

12月15日 毛泽东致信抗大九队学员，祝贺九队成立救亡室，勉励认真学习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法。

12月17日 周恩来赴延安途中路过西安，在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召开的西安各青年团体代表和中共陕西省委、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表《目前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演讲，严厉批评了国民党陕西当局压制青年运动的错误。

12月31日 周恩来应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邀请，到校为师生作《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的报告，希望青年既要在救亡中复兴民族，又要肩负将来建国责任，号召青年到军队中去，到乡村中去，到战区去，到敌占区去，努力争取抗战的胜利。

年底 毛泽东电召中央青年部长、西北青救会主任冯文彬从泾阳县回延安汇报青训班工作。毛泽东在肯定了青训班的作法之

后，指示扩大青训班规模，敞开大门，来者不拒，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战；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在干部力量和经济方面给予支持。

1938 年

1 月 10 日 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中指出，要保障军队政治工作任务的完成，必须不断地培养全国前进的青年干部。

2 月 28 日 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要求，党组织要用很大的注意力来具体研究工、农、青年运动，把更大的力量放到民众运动上去。

3 月 5 日 抗大同学会成立，毛泽东为之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3 月 15 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革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开门。

3 月 25 日 周恩来在武汉出席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并题词勉励青年学生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军营里、群众中学习。

4 月 1 日 陕公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陈云、李富春等出席。毛泽东在讲话中送给学员“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两件礼物，师生齐呼“接受毛泽东的礼物！”“学习艰苦奋斗！”

4 月 12 日 张闻天在陕北公学发表《论青年的修养》的演讲，教导青年要有坚定的高尚的理想，要学习实现理想的方法。

4月15日 《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张闻天为纪念西北青救会成立一周年的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青年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目前青年团体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一切阶层的青年男女，大批的走上抗日战争的战场去，充实正规军的战斗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后方的青年人，也是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而工作。中国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张闻天的题词是：“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

4月29日 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青年工作，认为青救会、民先队、青救团、青抗先就是共青团的具体组织形式，强调必须用各种形式建立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为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会议决定在党内建立全国统一的有系统青年工作的领导机关，县以上各级组织设立青年工作委员会。会后，中共中央于5月5日发出建立青委的决定。

5月4日 《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为纪念五四运动的题词：“希望全中国学生保持发扬五四光荣传统，贯彻抗战到底，成为文化先锋。”

5月17日 任弼时在代表中共中央递交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说明与补充中指出，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抗战中表现了很大作用，中共准备与国民党领导的三青团建立统一战线，正努力争取被国民党下令解散的青年团体合法存在。

5月12日 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刘少奇根据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关于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对待国民党建立三青团的态度的电文，复电指示应承认国民党建立三青团，中共应促使其成为各党派各阶级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组织，通过三青团改造国民党，提议三青团以教育、组织青年参加抗战建国为宗旨，团

员分个人与团体两类，团内实行民主集中制。

5月21日 毛泽东为抗大四期学员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同年8月又为四期毕业学员题词：“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

5月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

6月30日——7月4日 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延安，受到延安党政军学等机关热烈欢迎。7月1日下午中共中央为之举行欢迎大会并设宴招待，毛泽东、王明分别致词，毛泽东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愿望带给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和全世界人民。7月20日毛泽东接见代表团成员并接受采访，在回答了陕甘宁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中共的主张、持久战、抗战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等问题后，介绍了中国青年的一般任务（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的人民的共同任务）和特殊任务（争取自身的特殊利益），希望世界学联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世界人民和学生帮助中国抗战。

7月 毛泽东针对抗大少数知识青年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到校作《抗大民主问题》报告，阐述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和如何正确运用民主等问题。

8月中旬 朱德从前线返延安途中经过西安，受到西安各青年抗日团体欢迎和慰问，在接受青年代表赠送的“为国干城”锦旗时，勉励西安青年在挫折中鼓起信心，争取抗战胜利。18日，《青年战线》主编刘光采访朱德，朱德回答了战区青年工作任务和

青年参战、后方青年如何工作、青年统一战线、青年修养等问题，强调到群众中去是青年的主要任务，青年组织应扩大到每个青年，青年必须在互相帮助和广泛民主基础上形成统一运动。采访结束时，朱德给《青年战线》杂志题了词。

8月下旬 朱德回延安途中亲临安吴青训班视察，检阅了学员队伍，分别在干部会议和全体学工人员大会上讲话，接受青训班的请求担任了青训班名誉主任，给学员题词勉励“学好本领上前线”。

9月初 周恩来回延安途径西安，得知国民党陕西当局逮捕了青救会、民先队等团体负责人李连璧、陈宇、蔺克义、于志远、何志诚（史称“西安五青年”），即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交涉释放，迫使国民党陕西当局恢复了西安五青年的自由。

9月4日 延安各界青年在南门外体育场集会庆祝国际青年节，朱德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向朱德敬献了“我们的领袖”的锦旗。

10月10日 西北青年第二次救国代表大会在陕北公学礼堂开幕，全国各地代表314人参加大会，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朱德、王明、陈云、林伯渠等领导人出席大会并分别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赞扬中国青年在抗战中已有相当社会地位，八路军是全国青年的好学校；号召全国青年一致团结，驱逐日寇出中国，担起建国责任；强调要重视青年在抗战中的作用，培养青年，帮助青年学习，发展青年才能，使青年成为国家民族的主人翁。大会按照党的领导人的要求，提出了全国不同地区青年工作的不同方针和工作形式，通过了《抗日少年先锋队章程》、《儿童团组织章程》，选举成立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为全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机关。

10月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10月15日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提纲中指出，要建立统一的全国的青年组织，必须巩固扩大各地统一战线的青年组织，继续用各种各样名称在各地组织青年团体，加强和统一党对全国青运的领导，与国民党领导的三青团进行合作。陈云在10月31日《关于青年问题》的报告中要求，战区青年运动从城市转变到农村；大后方要运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开展学生工作；在暂时不能建立全国统一的青年组织时，可建立各青年团体的联合办事处加强联络；党的各级青委应比其他部门独立些，但不要变成第二党；青年工作干部必须加强团结。

1939年

1月 西北青救会组织6个战地工作团，到华北战区开展抗日宣传，慰问前线将士和青年工作，受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领导人亲切接见。朱德在前线接见战工团时，作《青年要学会打仗》的讲话，勉励大家学好作战本领，宣传组织群众参加抗战，做好战时经济工作。

3月 周恩来为绍兴青年题词：“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青年是学习时代，从课堂中学习，从服务中学习，从师友中学习。要认识学无止境。”

3月 抗大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开展生产运动，毛泽东为抗大师生题词勉励，“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4月19日 毛泽东为抗大毕业生题词：“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5月1日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李富春、林伯渠、

谢觉哉、王明等在《中国青年》第一卷第二期分别撰文，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的成分，希望青年和知识分子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张闻天希望青年认识中华民族解放与中国青年解放是分不开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就是为青年自身解放而斗争。陈云希望青年团结一致，站在抗战最前线，完成五四运动未完成的战斗任务。

5 月 4 日 延安万余名青少年在北门外操场集会，隆重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和庆祝首届青年节。毛泽东到会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给青年指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和动力，总结中国革命和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高度赞扬“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起了先锋带头作用，延安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和方向；号召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旧中国改造成新中国。大会向毛泽东献旗、致词，并向全国青年发表宣言，决心把全国青年的意志和力量集中于最后的胜利。

5 月 10 日 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出席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并分别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刘少奇的题词是：“为大众文艺的创作而努力。”

5 月 马列学院在延安创办，张闻天兼任院长。毛泽东先后在该院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刘少奇、陈云分别在该院作《论共产党员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演讲。

5 月 安吴青训班致信名誉主任朱德，表示要努力的学习和工作，配合抗战，为前线输送更多的青年干部。

6 月 1 日 抗大举行成立了三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张闻

天、刘少奇、王稼祥、陈云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抗大三周年纪念》的演讲，强调坚持抗大的教育方针。朱德从前线寄来题词，“号召千万青年，走上革命战场，高举抗大旗帜，插遍整个中国。”世界学联秘书长也发来了贺电。

6月6日 西北青救会在延安召开模范青年颁奖大会，毛泽东为模范青年授奖并讲话，指示青年应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模范青年是代表中国老百姓的，要一生代表他们，要长期斗争，永远奋斗。

6月10日 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称赞在陕甘宁边区创办抗大、陕公、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号召把全国青年团结在抗战和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下，要求好好保护与教育青年学生，动员大批学生及工作人员上前线，提出在华北扩大办学。

6月20日 西北青救会、民先全国总队部代表全体会员、队员和全国爱国青年，向朱德、彭德怀致电，谴责汪精卫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坚决拥护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的主张。

6月28日 鲁艺举行“欢迎周恩来、秦邦宪回延晚会”，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周恩来观看后，于7月8日为该歌曲作者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7月 陕北公学、鲁艺、安吴青训班、工人学校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抽调部分师生组建成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延安奔赴华北敌后时，毛泽东7日向师生作报告，赠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3件宝。周恩来10日给师生报告抗战形势，指挥学生合唱抗战歌曲。11日，中共中央在陕公举行欢送晚会，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晚会，周恩来途中因马惊摔伤右臂。

7月20日 中国女子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出席。毛泽东在演讲中指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周恩来希望女大尽快培养造就大批干部，组织领导妇女运动。女大学员代表向到会的毛泽东、八路军代表邓小平、新四军代表张鼎丞敬献了锦旗。

8月13日 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召开首届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只有民主团结，才能打败日寇。学生代表向毛泽东献了“让我们永远跟着您”的锦旗。

10月5日 毛泽东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阐述没有青年，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希望青年从最下层工作做起，积累经验，克服自然缺点。10日，安吴青训班举行二周年纪念大会，全体学员致信毛泽东和朱德，表示坚决执行“学好本领上前线”的方针。

11月5日 《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一期发表朱德《中国青年当前的任务》，指示青年担负起团结和组织全国青年统一战线，团结抗战到底，到军队和敌后去，参加民主政治运动、文化运动和生产建设、教育训练等任务；发表张闻天《对〈中国青年〉的希望》，希望《中国青年》成为全国青年干部学习的刊物和探讨、追求真理的园地，富有实在内容和青年特点，培养出新一代青年。

12月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批评了党内不敢放手吸收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入学入党的现象，要求党组织和军队，大量吸收他们加入军队、学校和政府工作，使他们为军队、政府和群众服务。

12月9日 延安万余名青年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王明出席会议并讲话。毛泽东高度评价一二九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号召知识青年发

扬”一二九”光荣传统，同共产党、工农群众、革命武装结合。王稼祥希望青年确立革命的科学的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

12月10日 陈云在《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中要求各群众团体，既要做好一般工作，又要做好各自的单独工作，还要联合起来统一做好共同的工作。提出来一个民主运动，真正选出群众团体的领袖人物。

12月27日 中华青联办事处冯文彬、李昌、胡乔木、刘光、黄华、高朗山、刘玉堂等负责人，联名致信祝贺朱德55寿辰，赞颂朱德是一部活的中国历史，是青年一代最好的榜样。

12月 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赞扬中国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但必须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克服自身弱点，才能革命到底。

1940年

1月4日—12日 陕甘宁边区文协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报告中，阐述新文化运动基本队伍——青年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问题，指出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在新文化运动中才能求得自己的发展与进步，新文化运动鼓舞青年知识分子为光明、自由、平等、幸福的理想的实现而奋斗，中华民族的将来是属于青年的。

1月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2月1日 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批评国民党在西安设立集中营拘押

青年，要求国民党政府保护青年，严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强调青年乃国家民族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

2月19日 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吴玉章到会讲话。毛泽东指出，青年是宪政运动的先锋，国民大会中要有青年才好。延安青年开的会，是全国青年的正确方向，延安青年要推动全国青年起来为促进宪政运动而奋斗。

4月10日 毛泽东为鲁艺二周年纪念题写校名；并题词“紧张、严肃、刻苦、虚心”，作为校训。

春 中华青联办事处主办的中山图书馆新址落成，毛泽东为之题馆名。此后，毛泽东、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人之为之捐书捐款，周恩来在重庆指定专人为该馆征购图书，林伯渠兼任中山图书馆馆长。

5月3日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延安中央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王明、邓发、吴玉章等到会祝贺。毛泽东因病只能向欢呼的学员招手致意，周恩来带领学员高呼“学习毛泽东”，“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万岁”等口号，王明代表党中央在讲话中要求学员，要努力学习毛泽东忠于革命、勤于学习、勇于创造、长于工作、善于团结的精神和作风。

5月4日 中央青委组织万余青年集会庆祝第二届青年节，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王明等出席大会并检阅了八路军、自卫军、少先队的战斗力量。毛泽东题词指示“目前中国青年的唯一任务就是打胜日本帝国主义。”

5月 朱德在《中国青年》第2卷第7期发表《五四运动与青年》的纪念文章，希望全国青年站在时代前列，坚定地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6月2日 延安模范青年第二届给奖大会在中央礼堂举行，

朱德、吴玉章出席大会并为 86 名模范青年授奖。

6月3日—7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相继发出《并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要求国统区学生运动以“长期地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为根本方针，中心工作由校外救亡工作转为校内学生工作。要求战区青年把建立青年武装组织、文化政治教育、改进青年生活、瓦解敌伪军作为中心工作。

7月 毛泽东发表《论政策》，强调吸收、训练一切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青年参加军队、政府和社会工作，并且放手地吸收、任用和提拔他们。

9月1日 陇东分区创办陇东中学，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分别为该校题词祝贺。

9月7日 陕甘宁边区学联举行第二届代表大会，朱德、张闻天出席大会分别讲话，号召全边区学生克服困难，积极发展边区经济，重视克服自身的弱点。

9月19日 朱德、张闻天、吴玉章等出席陕北公学三周年纪念大会。

10月12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陈毅等人指示大规模办学，来者不拒，大量吸收和收容知识青年，为建设根据地之用。

秋 毛泽东为八路军医科大学第 14 期即将毕业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朱德为之题词“埋头苦干”。

11月5日 张闻天、朱德、吴玉章、李富春、徐特立、叶剑英等在《中国青年》第 3 卷第 1 期上撰文，指出中国青年努力的方向。张闻天在《对〈中国青年〉的希望》中希望《中国青年》培养出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灵活的革命的实际主义，前进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的新青年一代。朱德在《中

国青年当前的任务》中号召青年坚持团结抗战，坚持青年统一战线，参加民主政治运动，开展抗战宣传与文化，参军参战参加经济建设，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信仰。

12月5日 任弼时在《中国青年》第3卷第2期发表《中国青年与当前时局》，号召青年在制止投降内战，坚持抗战胜利中成为先锋力量。

12月 陕甘宁边区青救会聘请朱德担任边区经济建设顾问。

1941年

1月18日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张闻天在报告中要求学员学好多方面知识，从多方面学习，方法上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习同民族的敌人、民众的敌人、自然界和自身的弱点斗争的本领。

1月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师生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拜年。毛泽东向干部学员题词“青学又肯干，又是革命的，必定是有益的，必定是有前途的”。

1月31日 毛泽东写信给在苏联学习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将来可以倒置过来。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5月4日 延安青年集会庆祝第三届“五四”青年节。朱德到会并讲话，指出延安是新青年的中心地区，延安青年要好好学习，加紧锻炼，做全国青年的模范，成为参加抗战的模范。

5月15日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到会讲话，希望日本工农学校学生回国后，组织“八路军”与中国的八路军携手，共同为争取中日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6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青年工作，研究青年运

动的经验、组织形式、性质和基本原则，会后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决定：1. 以青救会为主要组织形式团结全国青年，继续发展充实青救会的组织与工作，以青救会为青年组织总形式，发展其他青年团体，2. 在区以上的党委中设立青年工作委员会领导青运；3.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尊重青年运动相对独立性，一般任务与青年特殊任务，青年与成老年的关系；4. 青年干部要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

6月10日 延安“五四”中国青年节奖金征文活动揭晓，23篇文艺、戏剧、美术、音乐、科普作品获奖。毛泽东为该活动赞助300元。周恩来、王稼祥各赞助200元，吴玉章赞助100元，董必武赞助50元。

7月 延安马列学院改名马列研究院，毛泽东到该院作《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

7月25日 延安青年俱乐部登报鸣谢为整修该俱乐部捐助钱物的个人和集体。主要为：毛泽东捐400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捐200元，朱德捐100元。捐物集体为中央财政部、组织部、后勤部、青委和延安市青联。

7月25日—8月25日 7月25日，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135人到延安。8月1日，延安女大开会欢迎该团参观本校，毛泽东、王明出席欢迎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大家建立青年统一战线，为团结抗战而奋斗。8月14日，毛泽东在边区政府接见该团代表，指出：我们共产党想把中国干好，这和你们的希望是一样的，你们回去后，把这个意思告诉父老姊妹，并努力学习，帮助当地改进工作。代表们向毛泽东献旗：“你是我们的光辉旗帜！”8月25日，该团离开延安，朱德向该团送行，希望全体成员继续努

力，并加强与延安青年的联系。

12月 陈云在《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中指出，知识分子是党深入各阶层的桥梁，党必须争取他们，帮助他们用各种方法与工农群众建立联系，并领导民众的各种斗争。

1942年

1月4日—6日 为配合世界各国青年反法西斯运动和促进中国青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央青委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来自边区、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香港、南洋、日本及少数民族 108 个青年团体 228 名代表参加会议。朱德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国青年积极参加军队，努力生产，积蓄经济力量，学习军事及技术，加强团结，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时委员会，聘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各界 31 人为顾问，还通过了大会章程和誓词。

1月9日 毛泽东接见绥德警备区出席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代表，逐一解答了绥德师范、米脂中学等校三青团员代表提出的 20 多个问题。有人问共产党对三青团的态度，毛泽东回答说，是尊重他们，帮助他们。结束后，毛泽东手执灯烛为告别的学生照亮送行。

2月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指出培养名符其实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办法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强调青年干部和老年干部要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

2月6日 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央青委提出的《关于根

根据地各级青委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规定青委是党领导青年运动的专门部门，以研究了解青年运动情况，掌握青年运动方针政策，调剂青运干部，学习提高自己为总的任务，以组织教育青年一代参加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为工作范围。各级青委实行同级党委领导和系统领导。

3月24日 陈云撰文《到什么地方学习》，告诫青年干部不能只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因为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的领会，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

5月4日 延安青年集会，纪念五四青年节，贺龙向大会报告了晋西北地区敌后青年运动的情况，号召延安青年到前线去，欢迎青年作家、艺术家、歌咏家到实际斗争中创作。希望延安青年努力学习，积极生产，锻炼身体，从精神上与物质上作好抗日准备。

5月30日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向师生作报告，继续阐述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基本观点，即创作与生活、提高与普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等问题，号召师生走出“小鲁艺”，到“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个大鲁艺去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立足点转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

7月6日 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抗战五年来殉难校友追悼会，朱德为会议写来挽联“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光”。

7月14日 任弼时在《反对宗派主义》一文中强调，党是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政府、军队、合作社和工青妇群众团体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绝不允许强调自己的特殊工作而向党闹独立性。

7月20日 刘少奇在《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

中国创造条件》中，要求各级政府、群众团体和地方党组织要加强青年、儿童的教育与学习工作，必须使根据地数百万基本群众与数十万儿童、青年都受到深入的教育。

8月9日 延安俄文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到会讲话，指出做学问是永远没有毕业日子的，学习不能好高骛远，不能掺杂不好的个人欲望。

8月 陇东学生参观团一行40余人到延安参观学习，受到边区党、政机关和边区青救、延安市青联等团体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分别接见全体团员，解答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9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组织最高形式，在根据地实行统一的一元化领导，上级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决定下级党、政、军、群众团体都必须无条件执行，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必须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党政军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政府应给民众团体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登记，应号召民众拥护政府，帮助政府工作。

9月2日 朱德应邀向由中央青委承办的陕甘宁边区运动会题写祝词：“今天的中国青年们应与老一辈人不同，不但要以近代科学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而且要培养成健全、强壮的体魄，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坚实的一代，来担负抗战建国的艰巨任务”。

10月7日 陈云发表《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指出新知识分子的弱点是自由散漫，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不相符；想做政治工作，不愿做经济、技术事务工作；自认“大材小用”，“没有前途”。但他们愿意克服自己的弱点，党组织也能把他们教育好。

12月9日 刘少奇在《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论述党政军与群众团体的关系，强调党、政、军要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不要代替、干涉群众团体，不要过多地集中青年干部突击中心工作而放弃本身的任务。党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去领导群众团体，政府与群众团体应互相协助。

1943年

1月7日 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长篇讲演，报告中提到党的一元化领导时，任弼时指出，党有责任领导一切革命组织，党必须研究讨论和决定这些革命组织所进行的工作，使党的主张和政策通过各革命组织来实现。各组织的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的决定。青年团体要尊重同级党组织的领导。

3月10日 陈云在《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中指出，青年文艺工作者有不求进步、不求旁人帮助、不愿听人批评的缺点，号召青年文艺工作者提倡同志式的自我批评。

3月19日 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党必须根据学生运动来潮时的具体情况，提出国统区学生运动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把对国民党的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

3月29日 延安各界青年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纪念黄花岗烈士大会，大会选举朱德、吴玉章、凯丰、邓发、蔡畅等为会议主席团。朱德在讲话中号召青年象烈士那样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指出中国青年的任务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月30日—5月7日 4月30日抗大附中的1300多名师生从冀西抗日前线突破层层封锁到延安，奉中央命令去陇东创造抗

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贺龙出席欢迎会并题词：温室里的花木经不住风吹雨打，不进火热的炼钢炉，就炼不出好钢。5月5日，朱德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向师生作报告，提出在全体师生即将离开延安时，送给大家三件宝，即一把镢头，一支枪，一支笔。代表党中央要求学员拿起镢头开荒地，打窑洞，建校舍；拿起枪杆子带兵打仗，保卫边区；拿起笔学习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5月7日，全体师生带着三件宝开赴陇东。

9月5日 延安各界青年代表千余人集会纪念国际青年节，朱德、吴玉章、邓发、林伯渠、谢觉哉等出席大会并讲话，指出中国青年的唯一出路，就是对中国和世界的法西斯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唯一的前途，就是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紧紧靠在一起。大会发出《给世界青年的通电》和《致国民党电》，呼吁各国青年团结起来为消灭法西斯英勇奋斗，要求蒋介石收回毒害青年的《中国之命运》，取消特务机关，解散集中营，恢复抗日团体和进步组织。

10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要求“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一部分种粮”。此后边区各校参加大生产运动再次形成高潮。

1944年

4月12日 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批评青年干部和老干部互以自己优点而看不起对方的骄傲思想，要求互相学习，不要把优点当成包袱。

5月24日 延安大学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吴玉章出席典礼并讲话。毛泽东称延大是一所政治、经济、文化大

学，要学习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等党的各项政策，学习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及运输业等经济理论，要帮助 35 万户边区农民富裕起来，并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秃山都植上树。帮助农民学习文化。毛泽东嘱咐师生要为人民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朱德在讲话中号召学生要学用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9 月 8 日 中央警备团千余人集会，追悼青年烈士张思德同志。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向与会官兵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

12 月 7 日 周恩来为纪念“一二九”运动给《新华日报》题词：由于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潮，现在正面战场正是处于极为严重的关头，需要大后方青年更加切实而坚韧地发扬一二九精神，才能推进民主，争取抗日胜利。

12 月 9 日 延安各界青年 2000 余人在杨家岭礼堂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九周年。朱德、刘少奇、邓发、吴玉章、彭真等出席会议并被选举为大会主席团。周恩来从大后方归来参加了会议。朱德在会上讲话，号召解放区青年加紧学习，准备反攻；沦陷区青年与八路军里应外合，打败日寇。刘少奇做了题为《和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的讲演，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标志，一二九时期的青年所走的道路——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机中争取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周恩来向与会青年报告了大后方的青年运动，要求全后方 30 万青年参加敌后斗争，为人民服务。

1945 年

2 月 毛泽东对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延安的毛岸英说，你从苏联大学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中国的农

民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要作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向农民学习，懂得中国农村的现状。之后把毛岸英送到延安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并一再嘱咐岸英到农村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

4月6日 中共中央为加强对解放区青年运动的指导和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筹备成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由西北青救会、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和学联发起倡议，号召各解放区青年团体响应参加。

4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他们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从任何小事做起，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报告还提出要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

4月—5月 任弼时在党的“七大”期间撰写的《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强调，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也要从工农青年中培养可靠的技术干部作中坚骨干。

5月4日 延安各界青年千余人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庆祝“五四”青年节大会，任弼时、徐特立出席会议并讲话。**5月10日**根据周恩来、林伯渠指示，由边区政府和学生救济会拨款修建的延安第二学生疗养院正式落成。

8月22日 中央青委委员刘光追悼会在延安杨家岭会议厅举行，中共中央送来的挽词“刘光是青年工人与学生的良友，是努力向群众学习，忠实为群众服务的模范共产党员，他对于中国青年运动的贡献，永不熄灭”

10月11日 周恩来为张一纯题词：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

11月 延安大学部分师生根据中央指示，去华北、东北创办新大学。毛泽东在接见师生时指出，创办大学一半是困难，一半是光明，要克服困难，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和团结青年。周恩来在给师生送行时，告诫大家到了新地方后，不要照搬延安的经验，要根据当地的实际让新大学生根发芽开花。

12月9日 延安各界青年二千余人集合，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周恩来在会上揭露了国民党扩大内战阴谋，谴责了国民党制造的昆明血案，回顾了五四以来全国青年为民族事业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指出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谁有青年，谁将有将来。陆定一在讲话中号召青年发扬一二九精神，与广大人民和一切反对内战的人团结起来，为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1946年

1月8日 延安第一保育小学学生会及全体同学向毛泽东、朱德写信汇报身体、学习及参加社会服务活动情况，并向毛泽东、朱德拜年。

2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培养党的技术干部，抽掉知识青年去东北的指示》，决定从华北、华中抽掉一千个知识青年到东北铁路合资企业和技术干部学校学习工作。

5月3日—7日 延安县青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政治处电影团在延安大学举办图书展览，展出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先驱者和领袖们工作、活动图片。

5月4日 延安各大、中学校及各界青年代表千余人在边区

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纪念五四运动 27 周年大会。任弼时在会上号召解放区青年“提高文化，学习技术，加紧生产”，联合民主力量同反动派斗争。同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为纪念五四运动 27 周年的题词，号召“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发扬五四的传统，坚决与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群众站在一起，为实现民主作不屈不挠的奋斗，胜利必然是属于青年与人民的”。

5 月 任弼时指示中央青委，组织山东解放区青联和陕甘宁边区青联共同就是否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怎样建团等问题进行讨论。

6 月 1 日 西北医疗专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勉励师生“努力奋斗，光明在前。”

8 月 26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建团问题。任弼时、朱德等先后讲话，支持重建青年团。任弼时指出：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就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团的性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在团内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求建团的试点工作“现在就可以去做”。

9 月 11 日 毛泽东听取任弼时关于建团问题的讨论情况汇报，肯定说：搞青年团是好的，可以征求一下各解放区的意见。

9 月 13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开会讨论建团问题。任弼时主持会议，朱德、徐特立、林伯渠、陆定一、蔡畅、习仲勋、马明方、胡乔木等出席会议。朱德在讲话中，强调团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任弼时总结会议时指出，过去我们建立青救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现在到了我们决定建立青年团的时候了。

10—12 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工厂、学校的第一批组织相继成立。各支部在自己的创建过程中，都纷纷以团员心目中的楷模的姓名命名自己的组织，如毛泽东青年团、朱德青

年团等。

1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由任弼时拟写的建团文件《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要求在解放区建立“党团结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组织青年团。“提议”规定了团的性质、任务、组织原则、活动内容等，要求建团工作暂以解放区为限，首先在巩固的地区作起，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

11月11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号召边区60万青壮年紧急动员起来，参加自卫战争。

1947年

1月5日 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城市党组织发出《关于响应北平学生反美蒋运动的指示》，要求在群众斗争高涨的基础上，争取美军全部撤退，废除中美商约及群众民主、经济要求，在各解放区广泛响应和声援北平及全国学生爱国运动。

1月12日 任弼时向毛泽东介绍17岁的青年共产党员刘胡兰的英勇事迹，毛泽东亲笔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各解放区掀起了学习刘胡兰热潮。

3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蒋管区民主爱国运动方针的指示》，指出蒋管区党组在国民党恐怖镇压下，采取暂时退守的策略和防御性的合法形式，使民主爱国运动保持平静状态，保全力量。

4月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间隙，为延安行知中学女学生任远志题词“光明在前”。

5月 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指出，在解放战争中已出现了第二条战线，即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6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管区学生暑期下乡中心任务的指示》，要求中央青委和国统区组织学生在暑期，利用社会和家庭关系，通过各种适合环境的形式，下乡宣传组织群众，播散反蒋斗争种子，学习与群众接近。

8月28日—9月13日 8月28日，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冯文彬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向会议作关于建团工作的报告，朱德、刘少奇对建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9月13日，刘少奇在代表中央做大会总结时，专门讲了关于建团的问题，指出建团首先要选择和训练一批干部，要选择有群众工作作风的，虚心的，能接近群众而没有官僚主义毛病的青年干部去做青年团工作。

9月19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青委召开的全国青年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建立青年团不要追求数量，首先要求质量，要从一开始就培养一种好的作风。建团的任务，主要是学习，但也不只限制于学习，要在各种运动中起作用。

10月8日 毛泽东写信给河北平山县参加土改的长子毛岸英，教导他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的个人主义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1948年

1月12日 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分析，国统区学生绝大部分是不满蒋介石反动统治，要求民主的，学生中的反动分子是绝对的少数，三青团员也不是个个都坚决反革命。因此中共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应帮助他们进步，吸引他们参加反帝争民主

的斗争。

(赵有奇 魏鹏程)

二、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关于青年运动的重要文献

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①

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剧烈的变动，最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到救亡运动与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来，在中国共产党前面提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去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把建立为发扬文化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广大的青年运动，当做自己为民主共和国的斗争的最中心任务。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央特有下列决定：

(一) 国民党区域内原有第二党式的共产青年团团员，都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环境与需要，去参加一切现在青年群众的，合法的公分的组织，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去建立包括不仅青年工人，而且包括广大青年农民、学生及失业青年的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组织，在青年群众各种需要与要求的基础上，创立

^① 时间是根据《中央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团龄及转党问题的指示》(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判定的。《六大以来》将此件列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各种各样的工人的、农民的、妇女的、文化的、教育的、体育的与军事的青年群众组织，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况，使各种青年组织在抗日救国、民主自由共同目标之下，实行合作联合与统一。

（二）苏区与红军中的青年团，必须把教育、训练青年成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使全苏区的青年，成为全中国广大青年的模范。青年团的组织，必须全部改造，以适合于这一任务，使之成为全苏区青年的各种文化教育、体育、军事等团体的联合组织，在组织内实行广泛的民主，并用一切方法同国民党区域内的青年团体取得联系。

（三）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每一具体环境的认识来教育青年群众，这在目前的阶段上，即是以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忠实于本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教育来教育他们。要善于根据青年群众自身的经验，要善于采取一切适合于青年心理的方法，来提高青年群众的觉悟程度，引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在苏区与红军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应该公开的进行。

（四）必须大批的吸收过去的青年团团员加入共产党，特别在国民党区域内，这些青年团团员的工作与生活都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区别。但他们一般的仍应负担青年运动的工作，在一切青年组织内必须组织共产党支部或党团，有系统的发展共产党员。没有加入党的过去的青年团员，应当成为党的支部的周围的积极分子，不要组织团的支部或团组。在共产党各级组织应该有青年部或青年委员会及青年干事，在各级党部总的领导之下，担任青年运动的工作，共产党应该是青年运动的唯一领导者。

（五）应该彻底改变在青年运动中的工作方式，抛弃一切第二党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采取青年的、群众的、民主的、公开的工作方式。国民党区域的青年群众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应该清

楚了解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分别与联系。应该培养大批青年的积极分子，担负青年运动的各方面工作，特别是那些忠实于民族革命事业的青年，与群众有联系的、不怕负责的、活泼的、有学习精神的、有一艺之长的青年。

中央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

为了发展全国青年运动与集中统一党领导下各青年团体的领导，特决定：

(一) 县委以上地方党部直至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委内至少有一个不兼别的工作而专作青年工作的人。同时，吸收在青年团中的负责党员参加青委，隶属于同级党部领导之下。上级青委对下级青委应给以经常的指导，下级青委应对上级党委及青委做工作报告。

(二) 党的委员会不应随便调走青年工作的干部，必须调动时，应该不使青年工作受损失。同时，应顾及青年群众团体组织上的独立性。

(三) 各地党部应该把青年工作当做自己主要工作之一，实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

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 工作的几个决定

(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

虽然青年学生对政治现状继续不满与苦闷，但国民党对学生运动，采取极端压迫的反动政策；因此，我们今后在国民党区学生运动的根本方针，应是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故工作中心应由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转为校内学生工作；各重要的大、中学及地方教育界有地位的学校，应设法建立短小精悍的支部；并应在工作中遵守以下的原则：

(一) 党员应首先注意功课、操行。开会不可每月超过两次，环境恶劣时少开或在一个时期内停开。参加群众组织不可超过一种。加强党员对马列主义学习，但以有领导的个别进行为主。暴露的党员应离校，或停止小组生活，暂时不活动。支部组织不应超过十人；学生党员多的学校，设平行支部；但必须注意在各年级学生中发展，使每学期能保持有党的支部。

(二) 争取大多数的同学，应以思想的启发为主，其有效方法，是提倡尊重人格，研究学术，暴露社会黑暗，介绍文艺作品和不违禁的较进步的刊物。但并不放弃适当的共产主义教育。可能时，可组织学术性、生活性、友谊性的团体。

(三) 团结积极群众，应指定支干会以外的少数党员与他们个别联系，或形成无定形组织，若组小团体则应防止突出。

(四) 关于学生合法团体如同学会、女同学会、系会、级会、

同乡会、青年会、音乐会、球队等，应以环境可能的程度进行组织，多注意学生福利事业及民主作风。这类团体一般不要与学校当局对立，可能时进行各种校外合法活动。

（五）应接近教员，争取好教员对我们的同情，麻痹坏教员对我们的敌视。

（六）经过一定积极分子，参与领导学生群众的斗争，但不可制造斗争，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斗争中须向高级当局及各种报纸杂志揭露真相，并须注意适时的结束之。在斗争中绝对避免支部及支部负责人的暴露，支部及支部负责人应站在暗中推动、旁边赞助的地位，他们应深深的埋藏在学生群众中间。

（七）毕业出路，党员升学应尽量升入地位高、人数多或出路便于接近群众的学校和院系；就业时应尽量选择教育、实业、行政等机关，并应继续联络校友，参加与组织毕业同学会，扩展我在社会各部门、各阶层的影响和工作。

（八）领导学校支部的各县、区青委，应由详细考察过的并熟悉学校情形的干部组织之，并尽可能入校读书，已暴露的青年干部坚决撤退。

中央书记处

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

(一九四一年六月四日)

(一) 自从对青年运动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方针，并改变共产主义青年团为青年救国会的组织以后，青年运动得到广大的发展，青运工作是有成绩的。党在青年运动中的总任务现在仍然是团结整个青年一代，不但应组织全体工农青年，还应极力争取地主、富农、资本家的青年，仅仅打击与孤立那些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与反共分子。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应与此任务相适合，而青救会就是适合于团结各阶级青年的主要的组织形式。

(二) 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以前及大革命初期，的确发生了很大作用，这是因为团比党成立为早，和当时党尚属薄弱的原故。但在以后，特别是在内战时期，青年团变成第二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团，完全失去了群众性，这一经验乃是失败的经验，而决非成功的经验。虽然还应该估计到青年团在这时期内在苏区中按其组织上工作上说来，基本上是成功的，曾经起过许多积极作用；但是即在当时苏区的青年团依然存在着第二党的作风，组织的不广泛，也应当引为严重的鉴戒。在今天抗日时期，如又建立新的青年基干组织，又将发生脱离广大群众，变成狭隘组织的危险，故关于这类提议是决然不能采用的。因此今天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根据统一战线方针，继续发展与充实青救会的组织与工作，青救会是还有很大发展前途的。

(三) 青救会为青年组织的总形式；其个别形式除已有者外，还可组织其他团体，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成为青救会的团

体会员，以便团结那些希望入党还不够资格的青年积极分子以及其他共产主义青年同情分子等，对于这部分人的积极性是应该加以重视与实行组织起来的。在根据地内青年抗日先锋队是青年半武装性的组织，在抗战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应继续发展，充实其组织，改善其工作。

（四）在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设立青委，掌管青运政策，总结青运经验，调节青运干部（协同组织部）。区党委以下不设青委，原来青委的工作人员加入青救会领导机关，各级党部经过青救会内的党团去领导青运。区党委之青委工作人员应全部加入当地青救会领导机关工作，使青委与青救党团的实际工作合一，但尚有保存青委名义以便指导之必要，地委以下则无此必要。各级青委对下级之青委或青救党团，经过各级党委同意，指导和检查青年工作，遇必要时可召集青年工作者的会议。各级党委遇必要时应尽可能吸收青委或青救党团负责人参加党的经常会议。

（五）党对青年群众运动，应该尊重其独立性，绝对不能以党的命令去强制青年团体执行，而只能依靠在青年团体中工作的党员进行解释说服工作，取得其同意，然后执行。但这决不是做青年工作的党员的独立性；对一切做青年工作的党员，应该坚持党的统一。党的青委，只是党内工作的分工，其一切活动，应该统一于党委领导之下。

（六）在执行一般任务（抗日、民主、生产等）与青年特殊任务（教育、学习、婚姻、娱乐、改善生活等）时，应善为调节，不可偏废。要教导青年，只有在执行一般任务中起模范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青年自己的特殊任务，同时应教导一般人民，也应教导青年，只有为青年解决了他们的特殊要求，才能动员一切青年

群众更好的执行一般任务。各地如有偏废现象，应即加以纠正。

（七）应该引导青年的积极性及好胜心理向着青年起模范作用的方面去，而不是引导到过于突出甚至和成年、老年相隔离相对立的方面去。个别地方所犯的先锋主义错误，应该引为鉴戒，不要重犯。

（八）在抗日战争中，广大的城市知识青年转入军队中与农村中，和工农士兵群众密切结合起来，起了很大的与很好的积极作用。但尚有一部分人不认识农村与战争的特点，和工农群众结合得不密切，保存城市作风，浮在上面，表现苦闷与脱节，这种现象，即在从事青年工作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的。党应转变这些党员的观点，使他们了解实际，眼睛向下，联系群众，以达发展广大群众的青年运动之目的。

（九）个别地方党委委员或党员中，过去曾经存在着对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性与对青年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加以忽视的现象，如尚未纠正，应即纠正。个别做青运工作的党员，在党内强调青委的独立性而不注意党的统一性，也应加以纠正。

（十）此决议发给各根据地应用之。

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一、九年来全国的青年工作是有成绩的，解放区的青救会、青抗先、青联会等组织在参战参军、文化教育和其他建设根据地工作中，都起了伟大的作用。在党政军民各方长期努力下，解放区青年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其中并涌现了大批优秀的积极分子，青救会式的组织与活动已经不能满足于这些积极分子的要求，而青年工作也因为缺少积极分子有组织的推动，逐渐松懈，不能发挥应有的力量。这些经验说明青年积极分子需要有一个单独的组织以满足其工作与学习的要求，并成为党团结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历史的经验也证明，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虽有过若干缺点，但他对于党与军队曾是一个有价值的后备军；在协助党与政府的工作尤其是动员性与改革性的工作中，具有突击作用；在贯彻由下而上的群众工作方法以配合由上而下的行政方法方面，具有加强民主的作用；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是英勇的支持力量。鉴于这些经验，并鉴于过去共产青年团曾有过的狭隘与第二党作风的错误，和抗战中期青年工作中闹独立性的错误，中央认为，今天应该成立新的青年积极分子组织，此组织应比过去共产青年团更群众化、青年化，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其名称拟定为民主青年团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二、新的青年团吸收一切坚决拥护民主并愿为民主事业积极

奋斗的男女青年，其年龄约为十五岁至二十三岁。在组织上实行民主集中制，接受共产党与民主政府的政治领导，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党和政府不能直接命令青年团，但青年团必须遵守政府的法令，实行政府对全体人民的命令和号召，而青年团内的党员，则必须服从党的领导。青年团应该是解放区党政军民工作的忠实助手，而不允许成为他们的对立者和妨碍者。青年团应该在为青年和全体人民而服务的基础上，努力创造适合环境特点与青年兴趣的各种方式方法，灵活而有效的团结广大青年进行下列三项基本工作：

第一，在党和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中事业中组织和发动广大青年参加并发挥青年的积极作用，估计到今天的战斗情况，军事和半军事的工作应该是主要项目之一。

第二，为广大青年的特殊福利和切身需要服务。

第三，除实际斗争和事业的锻炼与学习外，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

三、青年团的组织暂以解放区为限，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在解放区的军队中是否需要组织，均望各地提出意见，在解放区亦应视各种环境分别研究组织方法，着重在城市学校与人口较集中的村镇中求得发展，首先在较巩固的中心区作起，取得经验去逐步推广。在进行此项工作中并应注意下列几点：（1）党应指定青联干部及一批青年党员作为建团的组织基础；（2）先从建立下层组织和工作作起，防止搭架子的铺张形式主义；（3）各级领导机关完全由群众采取民主的方法依次选举产生，在领导机关内部完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废止委派制；（4）工作尽可能的集中于下层，各级干部做到最大限度的不脱离生产。

在青年团普遍成立后，现有的青联会拟转化为各种青年团体

的联合大会性质，仍为各地全体青年的代表机构。

四、各局各分局接到此项提议后，望召集会议讨论（吸收青年工作干部参加），总结过去经验，研究此项提议是否可行，有无其他办法，并望择地试验，将研究与试验结果报告中央，以便作最后决定。

中 央
十一月五日

后 记

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我们在延安精神研究会和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委会的直接指导下，编写了《毛泽东及其战友与延安时期青年运动》这本书。

本书主要围绕青年运动历史发展的进程，有重点地记述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有关青年运动的重要决策、基本思想和领导活动，以及他们对青年的关怀、爱护、教诲和殷切期望。

为了实现这个主旨，我们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按专题和纪实的方法，一事一议，夹叙夹议，力求实事求是地再现历史的面貌和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的革命风采，再次重温他们的光辉思想和教诲，以便使今天广大的共青团干部和团员青年，从中受到激励、启迪和教益，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青年运动光荣的传统，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郑洸（主编）、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所罗成全（副主编）、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柳清群、赵有奇、魏鹏程等。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采纳了一些同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延安精神研究会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同志的指导、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吴木教授和原中共中央群众工作组组长王愈

明同志，认真审定书稿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的编写难免有不足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写者

1992. 11.